

第四章

教育生涯



五四健將羅家倫傳



羅家倫自北伐戰爭加入國民黨以後，便沒有離開過民國的政壇。但從這時一直到四十五歲，他主要是在文教方面任職，尤其是出掌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這兩所重要學府。作為大學校長的羅家倫具有長於建設，勇於擔當的特點，無論在清華還是在中央大學，均能盡職盡責，有所建樹。

羅氏在中央大學任校長的十年，正是中國抗日御侮，生死存亡的震難歲月。羅氏於風雨飄搖中苦苦支撐，臥薪嘗膽、勵精圖治，對中央大學的保存和建設居功厥偉。對其感佩稱譽，眾口一詞。對他執掌清華，多因有涉黨派意識形態，曾招致許多尖銳對立的評價。唯歲月沉澱，對其功過是非也在慢慢廓清，還其公正。終其一生來看，還是北大學生的他以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五四健將的形象在中國近現代歷史舞臺上閃亮登場，博得他最響亮最為世人熟知的稱譽。但羅氏一生最大的事功，當是他為民國大學教育所投注的激情、所付出的心血。

儒將風流

一九二六年八月，返國後的羅家倫受聘到東南大學歷史系做教授，當時廈門大學亦向他發出邀請，但羅家倫因東南大學鄰近上海，可常利用東方圖書館和亞洲文會之故，選擇了東南大學。開有「西洋近百年史」和「中國近百年史」，並曾組織一門叫「近代西洋學術概觀」的課程，擬邀請十二位教授合教，分科十七種，有近代歷史，近代科學（分數理、生物、化學等），近代政治思想及制度，近代經濟思想及制度，近代哲學，近代美術等，頗可以見出羅家倫擅做大構想的風格。

此年九月，羅家倫致函任教於廈門大學的顧頡剛，對清華未能實現的搜求近代史料計劃，希望廈門大學能予支持，並進而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之寶藏及策源地。他設想可先籌一筆固定獨立的經

費，委定一個固定的人或固定的委員會，專門先從搜集圖書著手。所收種類及收輯方法是：

- 一、可以設法購得的原本史料；
- 二、不可購得而可照相或抄寫的；
- 三、尚可得到的絕版西文書籍關於中國史料者；
- 四、隨時購買新出的西文書籍關於中國史料者；
- 五、尚可得到，但是已經絕版的中文書籍，關於中國史料者；
- 六、隨時購買新出的中國文的史料。¹

羅家倫請顧頡剛和廈門大學商議，請廈門大學先撥一萬元，託陳寅恪迅速將清故宮所藏軍機處檔案照相或抄寫副本；如果廈大能夠提供經濟援助，羅家倫願往北京專門研究清宮文件；設法購買曾氏家藏忠王李秀成供詞原稿。然而，因為時局關係，這一計劃再次落空。

這一年九月，羅家倫從上海回到南昌安頓家人。當時正值北伐戰爭時期。國民革命軍曾一度占領南昌，而又為孫傳芳部奪回，南昌隨即處北伐軍包圍之中。戰事激烈，交通斷絕，環城炮如春雷，彈如急雨，飛震屋漏間。羅家倫幾次意欲離開而毫無辦法，以後無日不在愁雲慘霧之中。而羅家倫家中竟遭兵劫，錢物被洗劫不說，羅家倫並遭兵匪刺刀捅傷，雖無大礙，但其內心淒苦憤懣之情無以言表。他寫信給張元濟說：「以絕對無抵抗而遭此，難哉其為中華民國國民也！一切令人悲憤萬

1 參見劉維開：《羅家倫先生年譜》，第五八—五九頁。

態。以十餘年作有意識之力學，設竟死於此，心何以甘！」羅氏從國外學成歸來，躊躇滿志，但遭逢如此時勢，遇到這樣的劫難，內心激蕩可想而知。直到月底，羅家倫才得以離開南昌，先隨同父親到杭州，再返回南京。十二月，南昌家中來信告以贛票作廢，家用無著。而此時東南大學的薪水羅家倫尚未領到，也是一籌莫展，無奈之下又請託張元濟借濟。張當即通過商務印書館南昌、南京兩分館，匯去五百元，並在附信中說：「朋友有通財之義，況當患難之時。來書過於謙抑，能令人局蹐難安也。」²

羅家倫在東南大學的時間非常短。他回國之時，大約仍把自己的人生寄望於學術生活。可是在回國之後的現實面前，他的學術夢不久即告結束。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幾乎無論他們自願或者被迫都將捲入政治。羅久芳這樣說道：「此時『不談政治』已不可能，但羅家倫仍希望『在國家有大問題時，發表演論，苟與主體無妨，亦復無害』，不至影響他的學術生活。」³前面已經看到，從五四以來，羅家倫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學術與政治間徘徊，他總在行動上傾向政治，在反省中又將自己拉回學術，而最終，他把自己認定為「天性與為學較近」，或許受他當時身邊一幫友朋的影響，他努力同政治保持距離，但其自我認同不免有些錯覺。他的女兒羅久芳亦指出此點：「可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和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期間，他在不同地點、不同情況，

1 柳和城：《張元濟與羅家倫》，臺灣，《中外雜誌》。

2 柳和城：《張元濟與羅家倫》，臺灣，《中外雜誌》。

3 羅久芳：《胡適與羅家倫》，臺灣，《華美族研究集刊》第六期，二〇〇三年。

總不甘站在旁觀者的地位而盡了最大的努力，無論在國內或國外均發揮了他文筆上的功能。」¹於是，羅氏在北伐戰爭期間之「投筆從戎」，亦無甚難解，表面上是機緣巧合，但事實上這恐怕才回復了他真正的本性罷。「一九二七年初羅氏在南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防友時，獲得一個與蔣中正司令會晤的機會，一席談話之後，他毫不猶豫地參加了國民黨北伐的隊伍，擔任起編輯委員會委員長、參議及法制委員等職務。沒想到那次的對話，竟影響了他一生的事業。」²這一次的轉向政治，對其人生的影響是根本性的。之後他儘管長久從事過文教工作，但根本上不曾再脫離政黨政治，更因為這一選擇，他以行動見長的本色始得以完全展開，而昔日有志於學的那些思考和識見則貫注到他行動的意旨中，於成就他的事功善莫大焉。他八月受聘東南大學，幾個月後即由蔣介石任命為總司令部參議，隨即又任總司令部政治部編輯委員會委員長，授少將軍銜，世有「儒將」之稱，自此追隨蔣參加北伐。這時候，許多與北大有關的人士，包括蔡元培、蔣夢麟、王世杰、周炳琳、段錫朋這些同羅家倫關係甚密的師友諸人都先後加入了南京政府文教、政法方面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二月羅家倫應邀到南昌見到蔣介石，和蔣談過兩次話，他說蔣當時總是問他：「國民黨之出路在哪裡？」「言詞之間，隱有反共之意，然始終沒有說出來。」³蔣介石當時已有反共決心，只待打下南京後就將實行。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革命軍攻下了南京。時當國共衝突日益激烈之際，國民黨極須加強其黨化教育。為了配合北伐和「清黨」，培養「黨務」人才，決定創辦中

1 羅久芳：《胡適與羅家倫》，臺灣，《華美族研究集刊》第六期，二〇〇三年。

2 羅久芳：《胡適與羅家倫》，臺灣，《華美族研究集刊》第六期，二〇〇三年。

3 劉維開：《羅家倫先生年譜》，第六一頁。

央黨務學校。其師生同時負有從事黨務，協助北伐，和參與國家建設的多重使命。其設立有特殊宗旨，屬於國民黨的教育訓練機構，性質不同於一般學校。建立之初，蔣介石任校長，戴季陶任教務主任，羅家倫任副主任。學校事務主要由戴季陶決定，羅家倫即協助戴季陶，共同商定各方事務。戴公務繁忙，學校許多實際事務多由羅家倫負擔。學校最早是向停辦的東南大學商借一部分校舍，作為上課及辦公之用。羅家倫運用他的關係，將東南大學的一千教授們，如方東美、趙蘭坪、韋潤珊，北京大學的段錫朋、王世杰、周鯁生，金陵大學的唐啟宇、趙叔愚，復旦大學的趙隸華、王世穎、余井塘等人羅織到中央黨務學校去任教。

學校開學不到一個月，為促成寧漢合流，蔣介石通電下野，離開南京前，任命羅家倫代理校務會議主席。羅家倫於是在危局中受命主持學校一應事務。羅家倫後在《政大的誕生與成長》中講了當時的情形：「正在一次錄取學生入學之後，第二次招生未舉辦之前，國家出了一件大事情，就是因為寧漢分裂致徐州軍事因此受到挫折的結果，逼到蔣總司令為求團結而辭職。我記得還很清楚，就在下野那天，民國十六年八月十二日的早上，我還到他丁園辦公室裡商討校訓問題，他最後決定用『親愛忠誠』四字。我雖然知道時局的緊張，但是沒有想到就會下野。正值下午六點鐘左右，陳布雷先生……要我到他房裡去商量一個文告。我一看乃是下野通電，吃了一驚。我和他斟酌了幾處文字，即回黨務學校，略加部署，中夜回到所住的丁園，那時候蔣先生已上火車離京了。……當蔣校長離開南京的時候，留下一個便函給我，要我代理黨務校務會議主席，那時候戴、丁、陳各位先生也一起離開南京了，在校負責的人只有我和谷正綱、吳挹峰兩位先生，但是我決定方針，使已入校的學生照常上課，第二次招生考試仍繼續舉行。居然在緊張混亂的期間，這個學校仍做到弦歌不

絕。其實我們雖有最後的決心，但也有相當的布置。就在京滬鐵路交通斷絕的前一日，我去上海與陳果夫先生商量，籌了一萬三千元，於當晚趁夜車離滬，次晨回到南京，交吳挹峰先生保管，那天晚上京滬鐵路已被切斷。以後我幾乎每晚都到何應欽總指揮在城內門雞鴨的公館裡，參與軍事會報，準備萬一南京在不得已情況之下而撤退時，我們帶領全校學生編成一個大隊，隨軍隊開拔。在圍城中招來的學生，革命性都是很強的，這一點，我們可以互相信賴。」¹

就在這個多事之秋，羅家倫於十一月在上海同張維楨結為夫妻，由蔡元培為他們主婚。張維楨是上海人，畢業於滬江大學政治系。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期，羅家倫代表北京學生到上海出席全國學生聯合會時與張維楨結識，那時候張維楨還是上海私立勤業女子師範學校的教員。一九二〇年羅家倫出國之後，一直與張維楨書信往來。張維楨自滬江大學畢業後，入美國密歇根大學深造，次年獲政治學碩士後返國。

對於羅張的結合，一直流傳著其貌不揚，甚至有點「醜」的羅家倫靠著百餘封情書追到北大校花的浪漫傳說，還說得有鼻子有眼。但根據國民黨的史料與羅家倫的情書，卻證明這個逸聞純屬虛構，因為張維楨根本未曾念過北大，自然也沒有所謂下嫁三條件——留洋博士、大學校長、夫妻同行須保持相當距離之事。羅家倫女兒羅久芳在所著《羅家倫與張維楨》一書中也記述，她自小便已聽聞「北大校花」的說法，因此向母親詢問，張維楨則輕描淡寫地說，哪裡有這些事？都是那些大學男生追求女生太辛苦，才編出來互相鼓勵的。原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後，大出風頭的羅家倫前

1 劉維開：《羅家倫先生年譜》，第六五—六六頁。

往上海展開學生團體串聯，另一方面也為了逃避北洋軍閥搜捕，當時他在「全國學生聯合會」集會中認識張維楨並一見鍾情。之後羅家倫周遊歐美，張維楨緊接著前往美國密歇根大學留學，因此兩人是靠頻繁的魚雁往返聯絡感情，一直到張維楨取得碩士學位返國，長跑九年、雙方年近三十，才在上海共結白首。

一九二八年，蔣介石復職，繼續北伐。國民黨任命羅家倫為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兼任教育處主任。戰地政務委員會實際即為配合前線軍事行動的國民黨中央政府的縮影，每一個處代表中央一部，在戰地行使相應的職權。軍隊一旦攻克某地，則由該委員會接管地方政府。羅家倫乃代表大學部（教育部）處理戰地教育事務。於四月間隨同北伐軍由南京出發，一路向北。五月一日，北伐軍攻克濟南，次日晚羅家倫進入濟南城。五月三日早上，羅家倫到山東教育廳視察，正當他發表講話時，忽然槍聲大作。據報告，日軍和國民革命軍在濟南城外已經打起來了。羅家倫急忙回到總司令部，蔣介石的意思，衝突是意料中的事情，但為了完成北伐，當時國民黨仍設法盡力避免與日軍事衝突擴大。同一天，外交部長黃郛在交涉員公署被日軍劫持到軍部裡。硬說中國軍隊在某處打死一名日軍，要求黃郛在一個報告上簽字確認，黃堅絕不簽，糾纏不下，於是簽下一個「閱」字，日軍才將其送回。到了深夜，卻發生了一「濟南五三慘案」：日軍包圍了交涉員公署，戰地政務外交處主任蔡公時用日語抗議，日軍對其侮辱，要其下跪，蔡拒絕下跪，遂遭日軍殺害，並毀屍滅跡。羅家倫奉蔣介石命草擬抗議文稿。之後，國民黨計劃退出濟南。五日，羅家倫奉命與曾養甫帶著蔣介石致英美總領事的函件，通告國軍退出濟南，僅留極少數維持治安的部隊，濟南遂為不設防城市，此後一切外僑的生命財產如因戰事受損，應由日本負完全責任。但為領事館人員安全計，可以提供他

們一切應有的保護。羅家倫他們帶了三個衛兵坐總司令部的一部小車出發，經過許多流彈亂飛的街道，通告完畢之後，晚間一點多才迂迴到總司令部。羅家倫說自己曾問過蔣介石：「我們就這樣退出濟南嗎？」蔣介石回答他說：「等我把軍事擺開以後，才同他們說話！」

日軍未曾料到國民黨軍離開濟南。五月七日，國軍總部開赴泰安。一行人隨蔣上了泰山。當晚，山下緊急來報，送來日軍司令官福田彥助限十二小時以內答覆的急件。其內容直把中國當成一個戰敗國看待，蠻橫無理。擬定答覆之後，羅家倫奉命與熊式輝作為蔣的「軍使」，赴日軍司令部與福田交涉。五月八日上午，早飯都來不及吃，羅家倫只在總司令部桌上拿了兩小顆巧克力糖放在口袋裡，就和熊式輝一起出發了。在日軍總司令部和福田談判的經過，羅家倫自述說：「福田態度顯出驕傲蠻橫，在談判的過程中，他尤其堅持要將陳調元、方振武、王均的部隊在日本軍前繳械。我們是絕不肯，也斷不能屈服的。他們滿臉凶煞之氣，以怒目惡聲相向。我們始終沉住氣來，以堅定的態度，據理力爭。當然在這個場合之下要求得到任何理性的結果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要求他以書面答覆，讓我們可以覆命。同時我們也希望他再寫一個蠻橫的文件，將來可以公諸世界。」¹為了福田這個回覆，熊、羅兩人在福田辦公室外間等了兩個小時，日本衛兵為他們開了兩瓶啤酒，這就是他們從天亮到下午兩點享用的唯一食物。等他們拿到答覆離開濟南，在距國軍防地黨家莊不過三四里時，兩面的軍隊的炮火已經開始猛烈攻擊。兩人只得後退，遇到一輛日軍裝甲炮車，車上跳下一名日軍，用手槍對著兩人的胸口，兩人昂然面對。日軍又以炮口對著熊式輝的頭，並出言威

1 轉引自陳春生：《新文化的旗手——羅家倫傳》，第八二—八三頁。

嚇。兩人毫不畏懼，告以所負軍使命，日軍乃讓兩人通行。他們迂迴了很多路，又飢又渴，總算在五月九日早上回到總司令部覆命。由於羅家倫與熊式輝兩人遲遲未返回總司令部，南京方面甚至傳出兩人可能已死，可見當時情形的確險惡萬分。據黃季陸回憶，他曾同羅家倫談到此事。黃說：「你這個膽小鬼怎麼有膽子身入虎口呢？」羅家倫回答他說：「赫！在那個軍事的時代，長官的命令下來，哪有不去的道理！」以羅家倫這一介書生，初入政壇而臨危受命，不辱氣節，勇氣可嘉！關於濟南慘案後這段經歷，當年六月十四日羅家倫在南京大學院有過一個題為《在濟南事變中之經歷》的報告，詳述了事情始末。

打造清華

在羅家倫的教育生涯中，其執掌清華的短短兩年，最受爭議。正如蘇雲峰在《羅家倫與清華大學》中開篇即說道：「羅家倫是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所任命的第一位清華大學校長。他自上任到辭職，不及二年，但他勇猛精進，不畏艱難，改革整頓，頗有貢獻。然而他的事跡多為人們所忽視，或遭貶抑。在臺灣，因梅貽琦的聲望太高，所以談清華的人，不太注意他；在大陸，則因為羅氏與國民黨的關係，而遭到侮辱性的攻擊。這都是不太公平的。」直至近年，大陸才出現一些文章，發掘羅家倫執掌清華期間的功績，並給予公允評價。

清華的前身是「清華學校」。一九〇八年，美國政府和清朝政府商定，由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中

1 蘇雲峰：《羅家倫與清華大學》，《文存》第十二冊，附錄，第九三三頁。

的多餘部分。清政府決定將此款用於派遣學生到美國留學。於是在一九〇九年設了一個「遊美學務處」，主管選派留美學生的事務。學務處除了辦理考選留學生事務以外，還附設了一個「肄業館」，其目的是讓選取的學生在出國以前，先在這裡補習一些功課。這個肄業館，即是清華學校的前身。一九一一年成立清華學堂，成為正式的留美預備學校。

一九二八年夏天，北伐軍逼近北平，瓦解了張作霖的軍政府。蔣介石躊躇滿志，進入北平。北洋政府倒臺後，其控制的清華學校轉由南京國民政府接管。在國民政府掌管清華後，清華的名稱發生了變更，由清華學校改名為清華大學；管轄權也發生了變更，由原來的外交部單獨管轄變為外交部和大學院共同管轄。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和外交部，會同致電原清華學校教務長梅貽琦，委派他「暫代校務」，聽候接管。兩個月後，即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南京國民政府在取得美國公使同意後，正式任命羅家倫為清華大學校長。對於羅家倫之出掌清華，據羅家倫之女羅久芳的說法，乃是蔡元培的意思：父親受命北上時，遊學回國才兩年。在此之前他與清華沒有任何淵源，任命發表前也毫不知情。提名的人是大學院（後改稱教育部）院長蔡元培——知悉他最深的老校長；交付他的任務是加速推行清華的改制，在一個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設立的留美預備學校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國立大學。剛過而立之年的父親，在接受這個充滿挑戰性的任命時，心情的複雜和沉重是可以想見的。郭廷以亦認為是時任大學院院長的蔡元培推薦，而羅氏又得蔣介石器重。羅家倫自己在《我和清華大學》中對這件事情的內幕如是披露：「北平收復，華北大局粗定以後，國民政府自然想到整理北平的高等教育。當時王正廷任外交部長，他以前在北平政府時代，亦曾擔任過這個職務，深知道清華是外交部部長的一個財源，也是外交部的禁臠，哪裡肯放

鬆，仍舊要清華歸外交部主管。政府裡面有人不贊成，他不得已，而提出一個由外交部會同大學院共管的辦法。他要外交部參加的理由，是因為清華是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辦的，似乎外交部不參加，美國就不答應的樣子。這種拿洋人來嚇中國人的手段，是當年辦洋務的人挾外力以自重的慣伎。他突如其來的問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先生提出他荷包裡的清華大學校長人選，他誤以為蔡先生是老好先生，不會持任何異議的。那知道蔡先生對於大學校長問題看得特別鄭重，立刻拒絕，並且說人選問題，他已經決定了，要去找我去。這是對王正廷一個晴天霹靂，是他想不到的。其實這件事我事前也不知道。那時候王正廷還是新投到國民政府方面來，而蔡先生是……元老，他不敢違抗，也就忍下去了。」¹

羅家倫時年三十二歲，以其資歷、聲望，更不用說學術成就，都不足以服眾。而且，清華當年一向喜用系出清華自己的校友為校長，所謂「清華人治清華」，羅家倫與清華之間素無淵源，又加之此前清華多年來一直校長更迭，風波不斷，羅之出掌清華，自然也少不了曲折。中間頗有傳言，說羅氏主清華，乃有以北大代清華之虞。尤以清華同學會中許多人，對羅家倫表示排斥，語多攻擊。而一向在校長更迭風波中最有勢力的學生會，當時倒沒有理會同學會的反對，明確表示：「清華同學會係清華畢業同學之團體，自不能代表在校之清華學生。現在代表清華全體學生之機關為清華大學學生會。根據學生會之議決案，不但對羅先生毫無反對之意，且對羅先生之來執掌清華，深抱革除積弊及建設學術化的清華之希望。……故對於清華同學會所云『為校長者必須與該校夙有關係深

1 羅家倫：《我和清華大學》，《文存》第八冊，回憶，第三九八頁。

知其歷史者』之主張，未敢苟同。至以『外交關係』為藉口，反對羅先生，是何異借外人勢力，干涉中國教育主權。當今革命思潮澎湃之秋，斷不宜有此落伍思想。」¹學生會對羅家倫表示了相當的歡迎態度。代理校務的清華大學教務長梅貽琦及全體學生迭電南京，催促新校長到校視事。並曾專程派人同羅接洽，就各方面問題進行了事前的溝通和商談，一切還頗順利。

對於國民政府接管北平後清華持續三年的動蕩，蘇雲峰在《羅家倫與清華大學》一文中分析說：「不安的基本原因可能有三：一為師生的心理矛盾：一方面對北洋政府及清華受外交部管轄的不滿，希望借南方的革命勢力去改革。另一方面又覺得這個新來的政治勢力，有如泰山壓頂，因而產生排斥作用。二因教授原享有的治校權力，遭到削弱；學生原享有的自由與獨立，也受到約束。這兩種不滿情緒如果結合起來，校長必定難為。三因非清華的勢力，侵入清華園地，引起恐懼和反感。羅家倫是擾亂這池春水的第一人。」²想來當時清華學生在矛盾態度中對羅表示的信任和歡迎，與羅氏留給人們「五四健將」的印象頗有關係，這一身分對學生來說必定有特別的共通感和親和力，而對北伐力量帶來新氣象的期望則是時勢所造的最重因素。馮友蘭在其自述中也稱羅家倫當年接管乃是靠著北伐軍的餘威進入清華的。他寫道：「一九二八年，蔣介石又聯合閻錫山、馮玉祥，繼續北伐，趕走了張作霖，勢力一直達到北京。羅家倫不知在什麼時候當上蔣介石的秘書，一九二八年暑假中，南京的國民政府任命羅家倫為清華校長，到北京來接收清華。他來的時候，只帶了一個秘

1 蕭仁樹、傅任敢、鍾一帆：《南下代表報告書》，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清華周刊》三十卷二期，收入《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二卷（上册）。轉引自蔡仲德：《也談清華三十年代的「三超校長」》，《中華讀書報》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五日。

2 蘇雲峰：《羅家倫與清華大學》，《文存》第十二冊，附錄，第九三四頁。

書，差不多是單槍匹馬來的。到北京才開始組織班子。在紐約常同羅家倫和我在一起的北大同學楊振聲，這時候也在燕京。羅家倫把我們兩個從燕京『挖』出來，列入他的班子之中。那時候，北方久處於軍閥統治的水深火熱之中，凡是南邊來的人，都非常受歡迎。司徒雷登也看到燕京將來是要和南京國民政府打交道的，北大、清華又是鄰居，不敢得罪羅家倫，而且要特別表示好意，就答應放楊振聲和我離開燕京。……在清華那邊，教授和學生們也都震於北伐的聲威，表示歡迎。我們這個班子就順利地把清華接收了。羅家倫聘請楊振聲為教務長，我為哲學系教授兼秘書長。我們是靠著北伐軍的餘威進入清華的。開始作了一些重要改革……」這一特殊的時代背景，的確是羅家倫當時得以相對順利地接手清華的主要原因，但等他接手之後，則有更大的考驗等待著他。

羅家倫本人在《我和清華大學》的自述中談到當時的清華：「那時候的清華還是留美預備學校的性質，分中等與高等科兩級，每級四年，一共八年畢業。學生向例由各省分別考試，學校訓練不免偏重英文，而忽視國學和科學，其程度大約等於美國二年制的前期大學（Junior College）。其畢業生學文法的，大都能夠插入美國大學三年級，而學理工的，就只能進一年級。凡是高等科畢業生，都全部派赴美國留學，每年至少有五十人以上。校址在西直門外清華園，校舍和環境都很好，學風也好，可是圖書儀器等等，至多不過普通美國小型大學一年級的設備。在民國十年左右，因為外面的批評太厲害，於是該校接受胡適之先生的建議，設了一個國學研究所，又在民國十四年招了一班大學本科生。雖然說是預備改大學，可是留美預備制的中等和高等科，仍然照常辦理。當時這個隸

屬的系統，不是歸教育部，而是歸外交部。在當時外交部積習甚深，而且在不懂得教育的官僚控制之下，改革是困難的，發展也是畸形的。」¹

羅家倫入主清華之時，的確是抱持著宏大的理想，加之北伐聲威，挾持強有力的政治背景和革命理想，年輕氣盛，激昂自信，勇猛精進，進入清華後即大刀闊斧展開他改革校政的計劃。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羅家倫在清華宣誓就職。他鄭重宣誓：「余誓以至誠，謹守中華民國教育宗旨，謀造就成國立清華大學學術獨立發展之一主要基礎，以完成建設新中國之使命，必遵廉潔，務去浮濫，如或有違，願受黨國嚴重之制裁。謹誓。」²他正式代表政府宣布國立清華大學成立。他說：「從今天起，清華以往留美預備學校的生命，轉變成而為國家完整大學的生命。」說來，羅家倫實乃國立清華大學的第一任校長。他向清華師生做了〈學術獨立與新清華〉的演講，特別強調了學術獨立的意義。把發展學術研究，爭取中華民族學術獨立，作為他治校的宗旨。表達了他將為建設清華，以至於為實現中國學術獨立而努力奮鬥的決心。其中說：「要國家在國際間有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須中國的學術在國際間也有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我今天在就職宣誓的誓詞中特別提出『學術獨立』四個字，也正是認清這個深意。……我們要共同努力，為國家民族樹立一個學術獨立的基础。」隨即他提出了改造清華的教育計劃，稱為四化政策：「廉潔化、學術化、平民化、紀律化。」廉潔化，要消除浮濫，做到財政公開，受大家監督；學術化，不分派別，集中本國學者，延聘外國專家，與清華師生共同研究，創造佳績；平民化，要努力矯正過去師生的「享樂主義」，

1 羅家倫：《我和清華大學》，《文存》第八冊，回憶，第三九七頁。

2 羅家倫：《就任清華大學校長誓詞》，《文存》第一冊，論著，第四五〇頁。

及被視為貴族學校的生活態度；紀律化，要推行軍事管理，養成有秩序、有組織，能受命令，急公好義的精神。事實上，後來對羅評價的褒貶也就從這四化政策實施的成敗不一而來。而主要集中在羅氏學術化和紀律化（軍事化）上一成一敗，對比鮮明，時人對其評價一褒一貶，幾乎眾口一詞，沒有餘地。

所謂「軍事化」，是羅家倫到校後，對學生實行軍訓，從「軍事化」的統一管理。這是當年五月大學院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所通過的議案，亦是政府教育的方針，羅家倫本人亦積極支持，在他到任前和清華學生代表亦就此溝通過，因此他說「同時又是清華學生和家倫個人的主張。」但實際實施時，卻成了一出十足的鬧劇。羅家倫本人和教務長楊振聲在校時，常穿著軍事制服和馬靴，以為表率。又將全校學生分為四隊，各設隊長一人。隊長與學生共同生活，早晚點名，按時作息。男生平時一律穿制服，女生亦另著規定的制服。男生敬禮、起居、休假均有一定的規則。開始學生還有點新鮮感，不過半年後，北方的冬季天寒地凍，這規定便難以為繼，羅家倫於是厲行懲處，遭學生消極抵制，最後以失敗告終。軍事化的實行，不僅一敗塗地，最後狼狽收場，不了了之，而且招致學生怨聲載道，羅亦因此落下無數惡名，與後來「驅羅」風潮關係不小。

清華大學的史料中還留著不少當年學生嘲諷的記述：「羅家倫前年宣誓就職的那天……宣布了四大化的演辭。當時我聽著還覺得有點意思，雖然有一點誇大和吹法螺的語氣，不過出了大禮堂就聽到了許多譏笑的言談。羅氏就職之後好像使我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他要從軍事訓練上，實行他的

1 參見羅家倫：《學術獨立與新清華》，《文存》第五冊，演講（上），第一八一—二四頁。

紀律化（四大化之一）的政策。於是馬大隊長也請來了，制服也做好了，組織大綱也宣布了，在初次下操的那天，羅先生好不耀武揚威地，掛著武裝帶，登著大皮靴，『達、達』地在操場走來走去，檢閱我們這一段毫無興趣的小兵。這個時候，大家以為羅家倫真正想要把清華大學改成一個兵士訓練學校了。並且在宣布軍事訓練規章時，同時宣布了很多的規章，什麼『立正』、『小過』、『大過』……罰規很多。這些嚴厲的罰規，並不能使我們這幾百個學生貼耳順服，反而使我們對於他發生了很深的厭惡心，因此羅家倫來校不久，就得了不少不名譽的綽號。」就是羅家倫「班子」裡的馮友蘭也這樣說：「先說軍事化，這個化的具體表現，是每天早上上早操，校長和教務長都穿軍服，腳蹬馬靴，腳後跟還有馬刺子。當時的教務長是楊振聲。有一次張彭春到清華作臨時講演，講戲劇。張彭春在講臺上說：『你們的教務長寫信叫我來講，並且說：『你必定得答應，你若是不答應我，我就要不答應你了。』我一看信，可把我嚇壞了，因為他是穿著軍裝的，若是一個穿軍裝的人不答應我，我可受不了！我沒有辦法，只有答應他了。』每天早晨六點鐘上早操，學生們在開始的時候還有一點興趣，可是，夏天過後，白天越來越短，天氣越來越冷，學生們來上操的就越來越少了。羅家倫下了一個命令，說是早操無故缺席，記小過一次。照校規：三次小過為一次大過，三次大過就開除學籍。下了這道命令，學生們還是消極抵制。後來連他自己也覺得行不通，就不了了之，早操於無形中取消了。這中間發生過兩件事情。當時的學生沈有鼎向來生活很隨便，他經常不上早操，也不請假，積累下來，被記了八次小過，如果再有一次小過，他就要被開除學籍了，可是

就在這個時候，早操無形取消了，他才得幸免，保留學籍，一直到畢業。還有一位學生張岱年，原來來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一九二八年附中畢業，因為成績優異，可以免試直接升入師範大學。可是他慕清華之名，報考了清華，也被錄取了。他就到清華報到入學，過了一兩個星期，覺得早操受不了，幸而師範大學的入學期限還沒有過，他就退出清華上師範大學去了。他不知道清華的早操終究是要廢止的，一直等到他在師範大學畢業以後才又到清華當助教。」¹這裡的評語還只是以鬧劇一場譏之，後面的評價就越來越嚴重了。因為羅家倫的政治色彩很濃，此舉頗有「黨化」清華的嫌疑。現在的清華大學學生會網站上還這樣寫道：「一九二八年八月，南京國民黨政府在取得美國公使同意後，命靠清共起家的反共政客、蔣介石秘書羅家倫為清華校長。羅一上任即大刀闊斧，實行一系列『黨化』教育措施，對同學進行『紀律化』和『軍事化』管理，並加緊破壞中共清華支部，迫害進步學生。由於他『治校有方』深得蔣介石嘉許。但羅的專橫引起了全體同學和教授的公憤。一年後，他就贏得了『惡跡大彰、醜態百出、鉗制言論、束縛同學、濫用私人』諸名聲。不久，清華學生自治會成立了一個『校務改進委員會』，在教授的支持和幫助下，提出了一個『改進清華意見書』，派三人南下請願，要求解羅的職。在全校師生的共同努力下，加上國民黨內部矛盾激化，馮閻聯合倒蔣，羅終於被逐回南京。」²

事實上，羅家倫的軍事化也的確和國民黨「黨化」教育脫不開關係。清黨之後，國民黨推行「一

1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二八一頁。

2 參見 www.unionthu.net。

黨專政」，「以黨治國」。蔣介石公開宣稱：以後各社會團體一定要養成黨化、軍隊化的習慣。但為何羅家倫作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健將，以「自由主義者」面目示人，且口口聲聲提倡「學術獨立」，卻會附和這樣一種今人看起來頗為矛盾的理念。大概許多人都覺得詫異，但其中不無線索可循。早在一九二六年，傅斯年便說，希望中國出現一位有能力的「獨裁者」，「他將把秩序與文明強加給我們」。遲至一九三六年，羅家倫選定希特勒著的《我之奮鬥》為商務印書館的「星期標準書」。他們兩人這些同新文化運動時候那種「自由知識分子」定位大相逕庭的言行，表面上殊為難解，但其時並非特例，確是知識分子思想潮流之一種。軍事化之舉不能視同是羅家倫的一種「黨棍」式的盲目效忠，而同樣是五四一代改造國民精神、塑造民族之魂理想中的一部分。被羅家倫視為楷模，而且直接授意羅出掌和變革清華的蔡元培，也早有軍事化的思想底蘊。「然而，我們卻驚異地發現，羅家倫在清華厲行軍訓的做法，與蔡元培的思想主張有著清晰的內在聯繫。且不說蔡先生在北大組建『學生軍』的壯舉，即在『北京大學的改革』實際上已經落幕，蔡遠走歐洲的一九二四年冬，他在寫給羅家倫等人的信中談到『救國問題的根本解決之計』時，明確主張：『此事非普及平民教育，於普通簡易教育中參入軍事教育，不能收效。入手辦法，只能先從在校學生訓練起。若在校之教員、學生均了解此義而實行之，則由學校而推及商工農社會，十年二十年以後，或可達到目的。』在此，人們看到了蔡元培自清末以來一以貫之的軍國民教育思想的底蘊。」²面

1 詳見林賢治《五四之云》中更多的例證和分析，《書屋》第六期，一九九九年。

2 張曉唯：《羅家倫時代的清華大學》，《人民政協報·春秋周刊》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對清末以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挨打被侮的民族命運，對於如何重鑄民族精神，塑造一個強健勇武的民族共同體，是晚清到民國知識分子耿耿於懷的期望。而這種民族主義的情懷在政治場域中不斷同各種理念媾和。對於羅家倫等出遊過德國，並對德國民族精神特別推崇的一千人來說，這種情懷同德國式國家主義之間找到了共同理想，軍事化的理想亦出此間。與其說羅家倫是推行「黨化」，不如說「黨化」之於他，與其固有之塑造民族精神的理想合流了。我們可看十一月羅家倫在清華大學對學生們發表的演講《軍事訓練的意義與使命》中說的話：「軍事訓練不僅是體魄的訓練，乃是精神的訓練，是習慣的訓練，當現在的中國，更是一種民族求生存的训练！……我們中國民族到現在不但體魄衰落，而且精神頹唐不振，習慣浪漫不羈；沒有自衛的能力，以致失去自尊的勇氣。這種民族的墮落，若是不趕快由大家覺醒轉來，設法挽救，那我們的民族，是不久將沒有生存餘地的！」

「我來辦國立清華大學的時候，清華學生會代表屢次向我要求：『實行軍事訓練』，我覺得是青年健康的表現，是民族復興的徵兆。……我們要認定經軍事訓練的生活，是有紀律的生活，守規則，重秩序，能令、能受命，整齊嚴肅，務須鏟除浪漫的習慣！」「況且我們處在現在的中國，軍事訓練更有其它的重要意義。……須知澈底的體魄鍛煉，相當的軍事實習及軍事課程，……實為健全國民必備的知識。」他期望「清華學生能從軍事訓練上表現自己是中國民族時代的青年」。

但軍事化之舉同蔣介石當日整體意圖之間的聯繫昭然若揭，實難避免「黨化」的批評。除了軍訓之外，還有諸如「黨義」課、「總理紀念週」之類。姑且不論羅家倫個人態度，毋庸諱言，國民

1 羅家倫：《軍事訓練的意義與使命》，《文存》第五冊，演講（上），第二七—三一頁。

黨當然希望藉著自己的人把力量滲入清華。而中國近現代黨派政治和大學的關係，一直牽連不斷，足以成為一項大的議題。只是羅氏個人的資歷在這當中有些特別，作為五四一代堅定的自由主義者，跟隨蔡元培堅持大學獨立理念的他到以國民黨人身份來出掌清華，其內心秉持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尺度呢？我想這裡決計不是一個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選擇，而是有種種折衷、妥協、補充和混合。而成為中國現代大學獨立理念之典範的蔡元培，之所以在這個時候推舉羅氏來掌清華，是否也正因為羅氏身上這種折衷呢？所以，羅家倫藉助政治力量重整清華，其成敗得失實應分別看待。事實上，他在清華實行的一系列成功或不成功的改革，都帶有這種藉助政治強力以實現目標的霸氣。不過成則為人褒之以「魄力」，敗則被人貶之為「獨斷專行」。軍事化這一敗筆，連羅家倫自己在後來《我和清華大學》的回憶中亦避而不談。不知他是否有引以為戒之意。但鑄造民族精神仍是其大學理念的根本，這在他後來出掌中央大學極為人稱道的功業中表露無遺。中大九年，適逢艱難抗擊日軍侵略、民族生死存亡的歲月，羅家倫這種大學理念彰顯了格外深遠的意義和光輝。

與軍事化的敗筆形成鮮明對比的，就要說到羅家倫對清華最大的貢獻，也就是他在為清華學術獨立而革除種種積弊，建立種種基礎的改革。對於昔日清華的特殊及各種弊病，羅家倫入主清華時招為「班子」的馮友蘭體會很深，他在日後自述中寫到這樣幾點：

一、清華受當時政府的外交部管轄，不受當時政府的教育部管轄。在清朝末年遊美學務處在表面上還是由當時政府的外務部（外交部）和學部（教育部）會同管轄，但是實際上實權是在外務部，學部不過是掛名。到了民國北洋政府時期，教育部連名也掛了，成為外交部的一個附屬機關。清華

學校成立後，它並不屬於中國的教育系統之內。當時外國人所辦的教會學校，名義上也還是中國教育系統以內的一個學校。清華學校則不然，它是一個不屬於中國教育系統之內的教育機關。

二、在清華學校的校長之上，還有一個太上校長，叫董事會。美國駐中國的公使也是董事之一，實際上就是董事長。

三、在學校內部教職員中，職員的地位高於教員；在國籍上說，外國教員高於中國教員；按學科說，洋文高於中文，洋課程高於土課程。這三項差別中，第二、第三項的差別，本來都是當時外國人所辦的教會學校的一般情況；第一項差別則是清華所特有的。因為清華學校當時的職員有許多本來是外交部的官僚，他們的來頭本來是比一般的教職員的來頭大一點，他們掌握學校的實權，所以他們的地位也就高了。教職員的地位高低，表現在工資和生活待遇的高低上。清華遠處北京郊外，當時還沒有公共汽車等交通工具，所以教職員都住在清華園內。學校有教職員住宅出租。當時有四個住宅區：第一個住宅區叫「三所」（甲所、乙所、丙所），這是學校的三個巨頭住的，校長住甲所，教務長住乙所，秘書長住丙所。這三所也就是他們的官邸，學校不向他們收房租（在我到清華的時候，只有甲所不收房租）。第二個住宅區是北院，住宅都是洋式，是外國教師的住宅，當時稱為「美國地」（在我到清華的時候，還有這個稱呼）。第三個住宅區是南院，有一部分是洋式，有一部分是中國式。第四個住宅是西院，完全是中國式的房子。當時的習慣是，外國的教師住洋房，中國的教師住中國房。擔任中文和中國學問的課程的教師，以及比較低級的職員，都住中國式的房子。學生們也輕視中文和中國學問的課程，上課時搞小動作，不聽教師講課。聞一多告訴我說，他那一班有一次上中文課，先生講《項羽本紀》，有個學生不用心聽講，這本來是常事，可是這一次先生惱了，

使行職權，罰這位同學出去。這個學生不服處分，靠在牆上不肯出去。先生更加惱怒，喝問：「你在那裡幹什麼！」那位學生說：「我在這裡作『壁上觀』。」搞得先生啼笑皆非。

四、因為有這些不正常的情況，學校中有許多本來不難解決的事情，也解絕不了，一直在拖著。例如，把清華從留美預備學校改為正規大學，在校內早已決定，已經開始照正規大學的體制辦了，學生已經分為舊制和新制兩種。舊制的學生還是照留美預備學校的辦法繼續辦下去，畢業後還是到美國留學；新制的學生上的是正規大學的課，畢業後不再送到美國留學，就稱為清華大學畢業。可是這個改制，當時的外交部不予批准。清華還只能稱為清華學校，新制的學生如果畢業，就成了沒有清華大學的清華大學畢業生了。清華經過十幾年的發展，校舍和設備都不夠用。美國退還的賠款每年都用不完。餘款由基金會保管，學校不能動用。於是出現一種現象，一方面是急需用錢，一方面是有錢不能用。¹

馮友蘭總結這些問題，有大有小，但無一不是清華發展的障礙。其中最大最首要的一個就是清華由外交部管轄所導致和遺留的一系列弊病，羅家倫在任期中最為人稱道的就是鏟除了這一障礙。他入主清華之後，藉助政治力量，漂亮地打了一場陣地戰，為清華奪得重要權益，打開發展途途。然而，羅家倫的政治背景，在清華那種自由主義氛圍濃厚的環境中，自始至終遭人垢病。

早在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清華的歸屬問題就曾提上議事日程。當時國民政府想讓

1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二八一—二八三頁。

清華大學隸屬於大學院（相當於教育部），但是外交部卻以歷史關係為由不願放手。事實上，羅家倫八月二十一日捧到的任命狀上清華大學還沒有國立兩個字，羅家倫執意要在清華前加上國立二字，大學院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可是外交部用種種藉口反對，一開口就說怕傷和美國的感情。羅家倫當時嚴正地駁斥外交部說：美國把賠款退還中國是用來辦學校的，這個錢本來就是國庫的錢，現在美國把賠款退還國庫，我們為什麼不能用「國立」二字？這樣才把國立清華大學這個名字稱謂定了。動身赴任的前一天，他請當時民國政府主席譚延闓寫了一塊「國立清華大學」的大字帶往北平。這僅僅是一系列問題最初的展開。羅家倫擬定的章程雖然把清華定為「國立清華大學」，但在隸屬上，清華仍沒能並入其他國立大學的系統，為了將就外交部，清華仍由外交部和大學院共管。據羅家倫在《我的清華大學》中說，這件事乃是當時外交部部長王正廷力圖把持清華不放，既然王提名的清華校長被蔡元培斷然拒絕，於是他又出個花樣，說是「既由大學院和外交部共同管理，就應該設一個董事會，代表兩部行使職權。他就從這個董事會裡來做翻案文章，所以，我到校以後，第一年許多障礙就從此而生。」¹清華有這樣一個由外交部和大學院共管的董事會，而且基金的管理也不納入規程，因為羅家倫的政治地位，他深知外交部的積弊，甚至了解一些清華基金會管理的內幕，對此強烈不滿。在北洋政府時代，有一個「清華基金保管委員會」，由外交部長、外交次長及美國公使三人組成。民國政府接管後新組織的保管委員會中，減去外交次長而加入大學院院長，仍是三個委員。這種保管方式，羅家倫認為依舊是把持在外交部手中。由於羅時任戰地政務委員，可以代

1 羅家倫：《我和清華大學》，《文存》第八冊，回憶，第三九八頁。

表國民黨中央接收機關，調閱檔案，所以他對清華基金的問題，了解一些內幕。四百萬元的存款，實際上不過二百萬元，而且有第一天把基金存入某銀行，第二天某銀行就倒閉的事情。羅氏對此痛心疾首。他在一九二八年校長就職演說中已經對此問題提了一提，暗下決心：「我當沉著進行，務必使他（指基金——著者按）達到安全的地步。」¹

依大學院和外交部對清華大學管轄問題所達成的協議，決定由兩機構合派董事九人，組成新的董事會。在九月的清華大學條例中，董事會幾乎已經取代清華「評議會」的職能，其權限包括制定教育方針、規章制度、預算決算、留學、財政、基金保管及推舉校長候選人等權力。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羅家倫在南京出席清華大學董事會第一次會議。會前，羅家倫將各種規程條例及建議報告分送各董事。建議報告書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陳述羅到校經過。第二部分是對學校進行的考察報告。他考察的結果，認為清華存在八大問題：一是駢枝機關太多，甚至為人設事，冗員充斥；二是職員人數過多，地位權力太大；三是浪費太大；四是學術上之設備不足；五是教員待遇重資格不重學識；六是缺乏濃厚的研究風氣；七是學生人數太少；八是有名無實的學系太多。第三部分即陳述了他到校後進行的整頓。一是改良組織，裁並駢枝的機關和冗員；二是節省浪費，一面設法節省電力，一面改良購煤辦法；三是重發教授聘書，無論中外教授，均暫以一年為期；四是辦理第二次招生，增收女生；五是辦理舊生補考，將上學期末曾考試各科，盡行考畢；六是限定學生在註冊以前，一律照章繳納學費；七是改善教授待遇；八是增加良好教授；九是整頓各學系，凡有名無實

1 羅家倫：《逝者如斯集》，轉引自陳春生：《新文化的旗手——羅家倫傳》，第九二頁。詳細經過見羅家倫：《我和清華大學》，《文存》第八冊，回憶。

的學系，一律取消；十是各學系的辦理，確立一定的方針；十一是復位各系課程表；十二是實行軍事訓練；十三是經濟公開；十四是整理留學經費；十五是校刊季刊的出版與籌備；十六是教授會與評議會的成立與建議；十七是改善校工待遇；十八是美國公使館的了解與同情。第四部分是關於將來的主要計劃。一是增置設備和動用基金：增加學校設備，包括建築男女生宿舍、自然歷史館、化學實驗室、辦公室，擴充圖書館、圖書儀器等，為達成此項目標，則需動用基金，提出一部分基金作為建築設備之用；二是加聘良好教授；三是節省留美經費，發展大學本部；四是基金問題；清理已有基金，改良保管方法，並確定將來基金運用的方法；五是設置獎學金；六是創設各系研究院。

事實上，自羅家倫到校以後，立刻著手調查研究，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對各種弊端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整頓，並且見出成效。除了軍訓課程及早操、補考、硬性規定一律繳納學費等數事外，絕大多數事項都與學生會的建議一致，受到師生們的歡迎。他借提基金興建館舍的計劃，教授會和評議會都表支持。但很明顯，他在此次報告中諸多針對董事會的議項，直接尖銳，且有挑戰董事會權責的架勢。借提基金就不說了，他在報告中大談基金管理問題，直言不諱地批評說：「清華基金向來是一個啞謎，很少人能夠明白其實情」，「大家都知道清華有八百餘萬的基金，算一算表面價值，似乎沒有什麼錯誤；但是如果合一合實價，就不免使人氣短。大家或者也知道清華基金已有虧折，但是為什麼虧折，尚實存若干，所存放的銀行是否可靠，均很難明確的解答。」所以，「必須澈底清查，嚴究以前的損失」。¹他又批評過去由保管委員會少數書記操縱的不當，要求清華教授派人

1 《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二卷（上冊），第十九頁。

參與。然後提出一個非常樂觀的估計，說如依他的辦法去整頓管理，基金實數會大為增加。意即他從基金中借提興建館舍的款項不會對基金產生影響。他這些大膽的批評和建議，無異已經超越他的權限，對董事會表示了不信任，甚至是相當的大挑戰。董事會的決議自然全力護衛自己的權威，守住基金，規定學校基金無論何時不得動用，要求「量入為出」，全不理會羅家倫的擴張政策和個人英雄主義的作風。薪俸標準，亦應由董事會決定。羅家倫不得不按照董事會的要求，重新縮編預算。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董事會第二次會議上，羅氏再度堅持動用基金添建生物館、學生宿舍，擴充圖書館及設立研究院，並呼籲改革基金。羅家倫認為添設館舍於學校需要萬不可少，如恐一時不能籌措資金，擬先建設生物館、學生宿舍及擴建圖書館，款項可由基金利息撥付。清華教授會的意見，認為董事會雖不允許動用基金，但動用基金利息與此則並無衝突。在這次會議上，羅家倫和馮友蘭列席，但董事會態度頗為倨傲，馮等了一天，才准與會，但被限制發言時間，席間羅、馮兩人發言都很客氣，但竟有兩董事盛氣凌人，甚至以手擊案。最後的決議，又是核減預算。而最讓羅家倫感到不滿的，是董事會仍不同意他以逐年編列預算的方式進行館舍擴建計劃。羅家倫抱著十二分的熱情，想要展開他打造清華的宏大計劃，而董事會則處處掣肘，予以限制。這更加劇了羅早就鬱積的對兩部共管和董事會制度的不滿。羅家倫至為失望，並且憤怒。於是在四月十一日，為辦學政策不能實行，設施諸感困難，請辭校長職務。這是羅氏的第一次請辭。政府未准其辭。此後又接連兩次請辭，政府則一再慰留。

在這次事件中，羅家倫抱了全力爭勝的決心。在整個過程中，羅家倫實際已經多方展開活動，要和董事會鬥爭到底，他已下定決心要以他的辭職，換取清華基金的安全與獨立，和清華隸屬關係

的正規化。此前，羅家倫以他上任後一系列改革整頓計劃，扭轉了美國使館對他的看法，亦博得輿論的支持。在廢董鬥爭中，他亦運動了這些力量的支持。他離開北平前往南京前，曾去訪問過美國公使馬慕瑞，把詳細內幕直言相告。並擬定一個辦法，要把清華基金交給中美人士合組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代管。主權屬於清華，支配權屬於教育部（當時大學院已改稱教育部），保管權則屬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託管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乃是為了避免蜚短流長，以為他力爭解決基金問題是想將基金的管理權置於校長掌控之下。馬慕瑞對此表示贊同，在遭董事會杯葛，打算提出辭呈前，羅家倫親自擬好一篇一萬多字的談話，根據湯姆生會計師事務所查帳的報告，把清華基金的積弊，以及清華在共管制度下的困難，寄給上海各種報紙，在他辭職那天一氣見報。葉楚傖主持的《民國日報》甚至讓這篇談話占了一版。十六日，羅家倫在上海會見記者，申述他辭職的理由。他把矛頭集中在董事會，措辭強烈，直言除董事會能變更決議或國府變更制度外，恐亦難征服而謀建清華為一完善之學府。

與此同時，四月初董事會第二次會議後，馮友蘭返校後即向同仁報告了在董事會受辱等經過，引起清華師生的憤慨，於是引起了對清華發展意義重大的「專轄廢董」運動。羅家倫的鬥爭得到了清華全體師生的配合。四月六日，全體評議員向教授會辭職。八日，教授會召開全體會議，立即通過決議，向南京政府要求：一是撤銷清華董事會和基金會；二是將清華納入教育系統，歸教育部管轄，外交部不得干預清華事務；三是批准動用基金四十萬元；四是批准清華改制，正式成立清華大學。學生會也在四月七日召開全體大會，決議要求政府修改《清華大學組織條例》，廢除董事會、改舊教育部、整頓基金與教授會一致外，還請撤銷董事會第一、二次的有關決議，並推派代表向南

京政府遞上呈文，謂「半年以來，外、教兩部會管之流弊與董事會之應根本取消，已事實昭然，不容隱諱」。然後就提出請願。羅家倫亦在四月二十二日的校刊上刊出〈對清華大學董事會校務報告〉。學生會的呈文，幾乎與羅家倫的意願完全一致。不久，清華全體學生又電致蔣介石，重申清華之不能發展，乃由外交部「把持校政」，「校務政出多門，基金黑幕重重」所致。

黑幕爆出，朝野震驚，在多方壓力之下，政府急忙作出反應。羅家倫亦多方運用其政治背景，在當局高層中跟外交部周旋。先是要求教育部長請求外交部長和美國公使召開清華基金董事會，商量基金處置事項。為了這件事，他親自到北平去找了美國公使馬慕瑞，明白告訴他裡面的積弊，勸其報告美國政府，既然退還了中國賠款，應該完全交由中國自己管理，以專責任，美方犯不著也不必要參與管理。馬慕瑞是個與學術有關的人，竟答應了羅家倫。董事會是在南京召開的，馬慕瑞在北平不能去參加，於是派了駐南京的總領事 Price 做代表，恰巧，北伐軍在濟南受日軍攻擊時，蔣介石派羅家倫和曾養甫兩人去見過英美兩國的領事，答應保護其安全，Price 當時就是美國駐濟南的總領事，因此，不但認識羅家倫，還對其有相當的好感。羅於是也去同 Price 談了兩個小時，Price 完全同意羅的主張，並且也電告公使堅定此主張。羅還擔心王正廷臨時玩別的花樣，而蔣夢麟同王正廷是行政院的同僚，恐怕不願意發生正面衝突。所以羅巧妙地繞開行政院，在基金董事會開會之前，請戴季陶、陳果夫在國民政府會議中提出一個議案，將清華改隸教育部，自然董事會也就跟著取消了。羅家倫在開會之前，分別拜訪了譚延闓、孫科，請求他們為教育保存元氣。這個國民政府會議，是政府的最高會議，由國民政府委員組成，所以行政院部長都不在內，裡面自然可以避免教育、外交兩部間的正面接觸。第二天，這個議案通過了。於是得以廢除董事會，改舊教育部，並整

頓基金。結果不能不說是大獲全勝，一舉為清華的發展掃清了絕大障礙。對此，羅家倫亦說自己所採取的辦法，有點非常，或者可以說是帶點霸氣。不過，熟悉政府內部事務的人大概都要嘀咕，或許竟因為這樣，這件事才能如此迅速而乾脆利落地解決。時人馮友蘭就一再強調羅家倫的政治背景，他且是這件事前前後後的知情人。他的評價也耐人尋味：「羅家倫到清華後所辦的主要事情，就是加緊實現和推動清華學校辦大學這一階段，這是在清華所做的貢獻，羅家倫到清華來完全是依靠政治關係。那時候羅家倫和我們還都是中青年，在學術界沒有聲望、也沒有地位。羅家倫是蔣介石的秘書，蔣介石叫他來當清華校長，羅家倫受命到北京來，當時他只帶了一個秘書，並沒有帶一個什麼班子。他和秘書兩人來後就在北京組織班子，包括他、他的秘書、楊振聲和我，這四個人就算是他進清華的班子。羅家倫憑藉南京政府的政治力量來到清華，到清華後發表了一個講演，提出『四化』：學術化、民主化、紀律化和軍事化。頭一條是學術化，他提出要動用基金擴建圖書館、建造生物館，這個計劃得到校內多數教授的擁護，但遭到當時外交部和基金會美國董事的反對。教授會支持羅家倫的計劃，幫助羅家倫跟基金會和當時的外交部鬥爭。羅家倫憑他當時的政治地位，他能跟蔣介石直接說話，要南京國民政府下令撤消董事會，將清華從外交部管改到由教育部管，這在清華當時是大快人心的事。」¹

不過，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羅家倫與清華的恩怨，他的來去，似乎也全由這政治背景所致。但羅家倫此舉可謂勇猛精進、任事擔當，這無論如何不可抹殺。其運動外交力量也好，運作政治高

1 馮友蘭：《清華發展的過程是中國近代學術走向獨立的過程》，《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第二〇九頁。

層也好，爆料輿論也好，甚而與教授會、學生會的配合也好，頗可見出羅家倫特別的一種「才幹」，竟是直率中有細緻，魯莽中有周全，而且事在人為，志在必得。「對於自己所採取的這種『非常手段』，後來羅家倫曾有一番自白：『老於人情世故的人，開始就絕不這樣做。但是我不知道什麼顧忌，人家對我的仇恨我不管，我為的是清華的前途，學術的前途。』不難看出，這是一個有擔當、勇於任事的人所說出的話。難怪教育部長蔣夢麟在挽留羅氏請辭的訓令中稱『似此實心任事之員，實屬不易多見』。就是後來執意反羅的清華學生在公開發表的文件中也不得不承認：羅氏『想要辦一個完善的清華的誠心，我們不能說他沒有』。」¹羅氏長女羅久芳提及羅家倫在南京的奮鬥告一段落後，寫給在北平妻子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清華事總算圓滿解決，此係公理勝利。我去固光榮，我回亦不失面子……但外交部董事會卻是恨死我了。將來有機會自亦拼命。但是世上的事，總是鬥爭的，不過我與彼有公私之別耳。」又說：「為個人精神安慰計，我視回校為畏途。但為始終貫徹政策計，我亦可犧牲個人安逸。」²由此可以看出他一旦負起認為有意義的任務，必定全力以赴，不計個人成敗。

張曉唯在《喟嘆一聲羅家倫》中說：「從羅家倫上演的這一幕『大戲』的結果而言，最大的贏家除了清華自身，大概當局教育部了。由兩部共管變為一部專轄自不必說，代管清華基金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在一九二九年初業已完成了改組，其正、副董事長分別是蔡元培、蔣夢麟，而主

1 張曉唯：《喟嘆一聲羅家倫》，《書屋》二〇〇五年第三期。

2 羅久芳：《父親在清華大學》，《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百花文藝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一二二頁。

導該基金會事務的則是胡適、任鴻雋等留美學界。民國教育界的主流力量，實際上促成了清華大學『體制上的回歸』，而羅家倫無疑立下了汗馬功勞。還在羅就任清華校長前幾日，蔡元培曾致函給他，就治校方略發表意見說：『鄙意清華最好逐漸改為研究院，必不得已而保存大學，亦當以文理兩科為限，若遍設各科，不特每年經費不敷開支，而且北平已有較完備之大學，絕無需乎重複也。惟收束自當以漸耳。』此一方略是否高明和可行姑且不論，從中顯現出羅氏背後的支撐力量卻是再清楚不過了。¹以蔡和羅的關係，他既然力主羅氏出掌清華，必當是信任、支持羅氏，所謂幕後策劃也是題中應有之意。但蔡元培所處位置很多時候卻不能直接出面，蔡元培之不能過於出頭，從該校《南下代表報告書》中可以看出。報告書說：「自大學院所召集之全國教育會議通過全國教育學術機關應歸大學院管轄後，大學院即根據此項原則，提議清華大學應直轄於大學院。經國民政府中央政治會議議決通過。故清華大學應歸大學院管轄，在法律上已不成問題。唯外交部始終聲稱與清華歷史上有特殊關係，不允完全放手。而大學院蔡院長，又素持禮讓態度，不願力爭。一則恐傷外交部與大學院之感情，再則恐釀成僵局影響學生之學業。結果遂由大學院暫時會同外交部管轄。」²蔡元培、蔣夢麟等人當日乃教育部的要員，必不能出頭與外交部直接爭取基金管理和清華隸屬，但為清華正常發展計，他們不可能袖手旁觀。羅家倫在《我和清華大學》中就明確說到當時當避免蔣夢麟和作為同僚的王正廷發生正面衝突。可以說從一開始得蔡元培鼎力舉薦來到清華，羅

1 張曉唯：《喟嘆一聲羅家倫》，《書屋》二〇〇五年第三期。

2 《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二冊（上冊），第五〇—五一頁。

家倫的攻堅，無疑就大有「來頭」，但這裡和他一氣的諸人不能浮出，羅家倫要扮演那個衝鋒陷陣的主角，而他竟是粗中有細，明槍暗箭，攻城拔寨，外交部於此戰真是一敗塗地。昔日在北大為中國現代大學教育抱定共同理想的師生多人，此時聯手為中國高等教育打了漂亮的一戰。

羅家倫於國民政府會議決議清華改隸教育部的同時，即擬就〈國立清華大學校務進行計劃大綱〉呈送教育部，教育部令准照此大綱切實執從。這個大綱包括基金的運用、預算分配原則、應增建之建築和學校的發展方向等方面，對清華日後的發展意義重大。如此，羅家倫得以放開手腳開展他的改革整頓和建設擴展事業。羅家倫在短短兩年間，對清華所作的貢獻，可見他《我和清華大學》的回憶，其中包括了他對中國大學教育的理念構想：

第一，院系：清華從留美預備學校改為大學，自然院系的設置問題，首先應當確定。我認為大學的重心，應當以文、理兩院格外適當。因為大學的組織法規要有三院，因此先設立一個法學院，將原有的土木工程系暫歸理學院，以後再把工學院建立起來。我對工學院除已有的土木工程系之外，首先預備發展的是水利工程。這項工程的人才，在華北的地區裡最為切要，所以我最後的計劃，是發展成為四院，並且先從文、理兩院打下大學的基礎。當時文學院分中國文學與英國文學、哲學、歷史學四系；理學院分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心理學、地理學六系，並將土木工程系附設在內，成為七系。我對添設地理系，有濃厚的興趣，因為中國講了許多年的地理，所說的都是文、史、地混合的地理，而不是純粹科學的地理。我的主張是若不趕快提倡科學的地理，把地形學、地圖學，各種專門的學科發達起來，則我們無法對我們廣大的國土能夠有實際科學整理的方法。我並

且主張把氣象學和地震學一道包括在地理系之內，局部地發展起來（我不辦地理系的原因，是北京大學已經有很好的地質學系，而且城裡還有地質調查所，不必重複，不幸我離開清華以後，地理系改為地學系，於是地質一科，竟喧賓奪主，把地理反而擠得幾無容身之地），多疑理學院較為龐大，共有七系。法學院分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人類學三系，我有意緩辦法律系的原因，乃是因為北平各大學裡的法學系的數量已經太多，而社會人類部門，確是許多有關社會科學的基礎。我以文、理學院為大學教育的核心，這種觀念，多少受蔡元培先生的影響；我自己在德國讀書的時候，更使我相信這種觀念是正確的。不過，我的政策比較廣泛一點，把工學院放在大學裡，能夠得到理學院從基本科學方面給它協助和影響，自然有很大的好處。後來我從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由工科大学而發展理學院的基本學系，以完成它重要的學術貢獻，足以證明我這個看法是對的。在研究院方面，我自然極力扶植國學研究所的繼續發展，把它納入收容大學畢業生的研究系統。此外，我繼續預備創辦的是數學、物理和生物三個研究所，可是來不及在我任內完成。

第二，教授的選擇和提高學術的標準：我認為一個大學要辦好，最重要的就是要教授得人。我不願意把任何一個教授地位做人情，也絕不我自己好惡來定去取。我對於以前若干不學無術而藉歪理來干涉校政的洋教員，更覺有澈底甄別的必要。我到校的時候，西籍教員留下的還有十幾個人，其中稱職的如詹姆生（Jameson）、溫特（Winter）等，成績優良的，我不特續聘，而且加薪，其不稱職的，我一口氣去了六個。我的理由是清華學校，既然改向為清華大學，是一個澈底的改組，自然不必受以前的拘束，何況這六個人的聘約已滿，我現在只是不續聘而已。他們去運動美國使館來說情，我提醒美國公使馬慕瑞注意一點，就是若是留這些人在清華，絕不是美國的光榮，因為他們

絕對不能代表美國的學術水準。馬慕瑞究竟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以後他擔任美國約翰哈普金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我這個話是能打動他的，所以他也就不堅持，只說他是轉達他們的意見而已。其中最難應付的有一個人，此人名叫史密斯（Smith），以前清華的校長送了他一張終身的合同，而他是全校出名的「老飯桶」（全校的學生都是這樣稱呼他）。他教的是英文和拉丁文；在教室裡絲毫不講，一進來就叫甲生讀一段，乙生讀另一段，如此接連續下去，等到打下課鈴了，他挾著書本就走。他對英文的教法尚且如此，拉丁文的高明可想而知！當時外文系主任王文顯對我說：這個人在美國教初中都沒人要的，怎麼樣可以教大學。這是確切不移的評語。他在清華有十幾年了，我對於這張終身聘的，怎麼辦呢？我最後決定送他一張一年的聘約，並且注明，如果續聘或不續聘在六個月以後通知。更明白告訴他這是我對他最大限度的禮貌，因為清華學校已經改為國立清華大學了，教育的水準也不同了，所以我無法請你一世。他沒有辦法，也只有把這一年的聘約接受下來，到第六個月，我正式通知他不能續聘。以後他還給我許多小的麻煩和不近情理的要求，例如他寫一封信給我，說是在清華添了幾個小孩子，所以每個小孩回國的旅費都要學校負擔。這不但我給他的契約沒有這條件，就是以前的終身契約裡也沒有這條件的，所以我斷然拒絕。他再來信說他在中國買了不少器具，要學校替他搬運，這無理取鬧的要求，我也拒絕。如此不近情理的要求有六七個之多，我沒有答應他一個。最後他並不曾回國，在燕京大學找了一個事，薪水自然比清華要少。我趕走這「老飯桶」的事，不但在校的學生，就是許多畢業生也感到痛快的。對於中國教授，自然在改組的時候也有去留，陳寅恪、趙元任、金岳霖、陳達諸位碩學之士，我不但親自去留他們，而且我認為待遇不公的，立即設法改進。當時有件有趣的事，就是外文系的吳宓教授，因為在五四新舊

文學之爭的時候，他攻擊新文學運動甚力，並且同我打過小小的筆墨官司，現在我來做校長了，我怕我對他有所不利，託趙元任先生來向我打聽消息。我大笑道：「哪有此事，我們當年爭的是文言和白話，現在他教的是英國文學，這風馬牛不相及。若是他能教中國古典文學，我亦可以請他教，我絕不是這樣褊狹的人。」以後，我不但繼續請他，並且對於他的待遇大事增加，並且倒成了很好的朋友，這位吳宓先生的趣事甚多，給我麻煩亦復不少，但不在這範圍之列。

至於聘請新教授，我倒有一個堅定的原則，就是我絕不請有虛名，而停止了上進的時下所稱的名教授；我所著眼的，是比較年輕的一輩學者，在學術上打得有很好的基礎，有真正從事學術的興趣，而願意繼續做研究工作的人。我認為只有在這個類型裡求人才，才可以得到將來最有希望最有成就的學者。當時我做校長時不過三十歲，自己年紀很輕，所以請的教授們，也都不過和我上下的年齡。在這批人裡面，以後產生了很多對學術很有貢獻的學者，也產生了許多頗有事功的人物。把他們請來以後，供給他們一個安定的生活，良好的設備，讓他們專心致志的去研究、去教育，所以早則三、五年，遲則十年都能夠各自表現他們的專長。在自然科學方面所出的人才最多，如薩本棟、周培源、楊武之、李繼侗等，都是很有貢獻的人。在中國文學方面，我很注意培養新文學建設的人才，而揚棄腐朽的傳統。如楊樹達、朱自清、俞平伯等諸位，都是我那時候請進去的。在社會科學方面，如蔣廷黻、葉公超、浦薛鳳、陳總、蕭邁諸位，都是特出的人才。並且我為了請蔣廷黻擔任歷史系主任，得罪了我的老師朱希祖先生。這原因很簡單，因為當時歷史學系朱先生資格最老，若是要請系裡原有教授擔任系主任，這不但朱先生感覺不安，而且其它的教授也不肯；若是我讓朱先生擔任系主任的話，那朱先生因為是中國史學的專家，對於世界史學的潮流沒有接觸，自然無法使

這個系走到現代化的路上。這是我請蔣廷黻的理由。不巧那時廷黻在南開大學任教，要歇一年才來，所以這一年之內，我只有以校長的地位來兼史學系的主任。縱然得罪了我的老師，但是我為了歷史系的前途，也不能不為公義而犧牲私情了。

講到外國教授方面，我既然去掉了若干位不學無術的外國人，我當然應該按照我開學時所宣告的主張，請幾位第一流的學者，到清華來任教，所以我陸續請到的有英國劍橋大學的正教授 I. A. Richards，美國芝加哥大學國際私法教授 Quincy Wright，哥倫比亞大學史學系教授 James T. Shotwell 諸位。他們不但是外國正式的教授，而且是國際間著名的第一流學者。其餘短期來演講的人還有許多，這不但使清華增加了學術空氣，而且可以給外國朋友們看我們請教授的方針，是注重他本人的學術造詣，絕不是排斥客卿。

第三，學生：清華既然改為大學，其重心自然落到大學本科。我認為大學招收學生，應該重質不重量，做大學校長對教授的職位和學生的學籍兩項，是絕對不做人情。入學考試一定要嚴格而公平。我對清華大學只希望他能夠成為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一般的大學，學生人數不過二、三千人，可是這種精而不多的隊伍，卻產生了許多學術的貢獻。至於美國許多二、三萬學生的大學，雖然規模宏大，卻非我所希望的。清華從來沒招收過女生，我到校以後，就把清華的大門為女生而開放。這件事我在招生時並沒有事先呈請大學院批准，因為男女享受同等教育的權利，是政府應當賦予的。至於留學政策，既然廢止全班資送留學的辦法，卻亦有採取補充措施之必要。因為在這個時期，我們還有許多種學科需要派學生到國外去深造的。但是這種出國深造的機會，不必成為清華畢業生的專利品，應當給各個大學優秀的畢業生，用考試的方法來公開爭取這種權利。所以我宣布，每年設

置的留美額十名，每名期限三年，經費比以前所給的要多一些，以便他們在外國研究院裡能充分地利用時間繼續研究。這個辦法在第一年實行的時候，雖然以清華大學畢業生錄取的為數較多，可是學術界都承認這是一種公開合理的制度。原有最後一班的清華舊制高等科的畢業班，以前招進來的時候，是答應他們全班及格的學生，一律可以派赴美留學的，既然是最後一班，當然繼續派遣，從此結束。我想不到我把清華改制以後，立刻收了兩個外國留學生，一個是德國公使 Von Bosch 的兒子，一個是瑞典女生叫 Schmid，這是清華有外國留學生的開始。

第四，建築：大學整個校舍的分布和設計，是與大學學術的理想和發展的計劃有密切關係的。我到校的時候，清華只有大禮堂、科學館、圖書館、體育館四個建築，除大禮堂比較堂皇而外，其餘的規模都很狹小，其它的零星建築，都東添一所，西造一幢，毫無整體的安排。清華園的地點是很寬大的。我到校以後，大約有十年的時間不曾添過一個像樣的建築，也可以說是停頓了將近十年。現在既然改了大學，就不能不有新的建置，於是我把整個的校址重新設計，另畫藍圖。這個計劃不限於清華園內，而且打算把英法聯軍燒毀的圓明園亦準備圈到大學範圍以內來（這個歸併圓明園的計劃，在我任內未曾實現，這片廣大的圓明園面積不下一萬餘畝）。清華校址的重新設計，應當考慮到以下幾點，第一，是整個將來發展的計劃；第二，是學術上使用的便利。我把這各點考慮清楚重訂藍圖以後，就開始作必要的興建。那時候各點考慮清楚重訂藍圖以後，就開始作必要的興建。那時候經濟困難極了，在一班人想來，清華是有錢的學校，可是那時候清華的基金在風雨飄揚之中，日益縮減，按月的經費，因為由外交部經手發給，財政權由他們的員司操縱，學校當局毫無通盤籌劃的自由。我不願意看他們的臉色，而且知道向他們談教育建設大計是毫無用處的。在另謀基本解

決的辦法以前，我實在不能長久等待。於是先向中南、金城兩個銀行借款四十萬，動工四個建築。這四個建築就花費了一百萬以上，自然四十萬是不夠的，可是我做了再說。這四個建築，一個是圖書館，一個是生物館，一個是男生宿舍，一個是氣象臺。還有三個，一個是化學館，一個是水利工程實驗室，一個是體育館的擴充部分，也都設計完畢，預備繼續興建。這些建築當中，我最得意的是圖書館。本來清華有一個圖書館，相當華麗，可是規模狹小，藏不了十萬冊書，坐不下二百個人，這是不夠一個相當規模大學裡圖書館的條件的。而許多人士建議，以為把原來的一個「丁」字形的圖書館接成一個「工」字形的便好了。我認為不對，我覺得一個近代大學的圖書館，應當留最寬大的餘地，做書庫的擴充（書庫的擴充，是一件最該注意的事。我知道在一九二二年的時候，芝加哥大學造一個新圖書館，其中書庫可容三百萬本書，以為在很長時期內盡可夠用了，哪料到不及十年，該校藏書已經超過三百萬本，無地可容）。所以我自己畫一個圖樣，把原來的圖書館僅作為側面的一翼，另外建一中心，在另一翼造一個很大的閱覽室，其中可容一千人讀書的座位。這一個大閱覽室，不但可以引起大家讀書的興趣，而且可以使一個學生進去之後，可以發生一種莊嚴偉大的印象，不禁油然而生好學之心。在閱覽室底下一層，增闢幾十間各系教授所用的小房間，讓他們一人或二人利用一間房間，準備一切看書研究的便利，養成以圖書館為家的習慣。至於為書庫所留的面積，至少有六、七十畝的地方可以延長。這個擴大的圖書館，我原計劃是用四十二萬餘元，等到完成，用到七十萬以上，可說是當時我國國立大學中最偉大適用而有發展前途的一個圖書館。說到我任內已建的實驗室之外，還有教授研究的實驗室，內部的設置也相當講究，氣象臺建築在一個小山上，其實不是在小山上，而是把小山挖空建築在平地上，有點像個雷峰塔，上層為氣象之用，下層我原

定裝置地震儀。體育館本來的建築很好，我又定下擴大計劃，但是不及實行，是由後任完成的。學生宿舍的區域，我所選擇的是在校園的北面，左邊靠體育館，右邊靠近圖書館，前後左右都是操場和球場。我的想法是大學裡對圖書館、實驗室不厭其講究舒服；體育館不厭其大，球場不厭其多；而宿舍則斷乎不可講究，這樣才能使學生樂意到圖書館、實驗室去工作，到體育館或操場球場去運動，免得老是留戀在臥室裡高臥隆中！

第五，整理學校內部行政：清華因為以前經濟情形較為寬裕，所以浪費的情形在所不免。而且因為在老的外交部統治之下，有許多積弊是由外交部傳染過來的，甚至於有外交部不能報的賬，發給清華來報。其中有些駭人聽聞的項目，是被我在就職以後發現的。至於行政鬆懈，更是無可諱言。我認為辦學校，只有盡量節省行政費用，來從事學術建設，才是辦學校的正軌。因此，我決定從整頓學校的積弊著手，可是有時候我感覺到除弊比興利還要困難。我就職以後，外交部對於在學校支配範圍以內的經費，已經有所顧忌，不加干涉。又因為我約去的幾位事務人員，都是清華的畢業生，願意任勞任怨的，所以節省下來的經費不在少數。改革教職員原有割據的習慣，倡立新的風氣，並非易易。舉一個有的例來說吧！清華改為正式大學以後，教授人數增加，尤其是單身教授宿舍不夠分配，於是定一個辦法，請單身的教授每人只占用一個房間（清華教授的房間相當爽朗寬大的）。吳宓教授一人占了三個房間，並且請梁任公先生題了一塊匾名謂「藤影荷香之館」，現在要請他讓出二間來，他自然不高興極了。但是我想不到他會寫封正式的信給我，說是若我要他讓出這兩間房間來，他要跳後面的荷花池自殺。我自然站在行政的立場上，為了其他沒有宿舍住的教授的困難，一定要使這項行政的規定行得通；可是我也不願意一個教授因此而自殺。好在辦理事務的人

是一位老清華畢業生，吳宓的舊同學，經他再三設法，居然辦通了，我因此也免除了迫死人命的罪嫌。清華遠在城外，教職員、學生的生活在一個區域以內，這區域宛然是一個小的都市，因此，大學校長亦無形中添了許多小市長的麻煩。

第六，基金：清華的經費，我上面已說過，是由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撥充的。這宗款項，可分為二部分使用：一部分為清華學校和清華畢業生派送美國留學生的經費；另一部分就是用不完的部分，存作清華基金，設有三人委員會管理，一個是外交總長，一個是外交次長，一個是美國公使。三人之中外交部占了二個，自然有多數決定之權。底下設二個執行秘書，都是外交部的職員，所以這項基金完全在外交部操縱處理之下。其如何存放與運用，除美國公使之外，外界全不得而知。美國公使為對於外交部的客氣起見，亦不認真的過問。很巧的事，在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收復北京，我因為擔任戰地政務委員，在接收外交部的時候，發現到一個文件，就是一個英國會計事務所 Thomson and Co. 審查清華基金賬目的報告。原件是英文的，我翻閱之後，甚為驚異。這報告上所列的清華基金總額達五百多萬國幣，但是實數只有二百三四十萬，一半以上都損失了。損失的原因何在呢？有以下幾點：一、清華基金所購的公債，都以票面價當實價，而且從來不曾中過簽的，管理人就買不中的換下去了；二、清華基金裡有許多開私人抬頭的股票證券，其中有龍煙鐵礦的股票二十萬元，上面是陳籙的抬頭，陳籙是前外交次長，他從前投資在龍煙鐵礦，後來該礦失敗，股票跌價，陳籙就把這份股票在清華基金裡提走了二十萬現款。這份股票的款子，就沒有著落了。其餘還有平綏鐵路的股票幾十萬元也是如此。還有一筆大有銀行的存款，頭天送進去，第二天這銀行就倒了。諸如此類，看了令人髮指。我那時候帶了一個副本到南京來向大學院報告，當時雖然沒有結

果，可是這個基金內容的秘密就被我發現了。王正廷以前是做過北平軍政府的外交總長的，現在搖身一變做了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了，他是在上海辦交易所投機的專家，哪裡肯放過這一筆利之所在的大宗款項？所以他要和大學院共管清華，並且想出共管的董事會制度，不是為了清華的教育，乃是為了清華的基金。他知道他是要清理這筆款子的，所以他一定要指揮董事會裡面他的奴才來攻擊我，使我不安於位。哪知道我雖然不一定要做清華校長，可是卻下決心，要做到清查清華的基金和爭取清華脫離外交部的掌握，納諸大學系統。這兩件事，我知道要達到這二項目的是不容易的，是要經過一場苦鬥，所以我決定以去留來力爭。同時，王正廷派管理清華基金的蔣履福和關菁麟二位秘書來向我講好話，這二個人是為管理清華基金而發財的，我難道會理會他們嗎？這時候大學院已經改成了教育部，由蔣夢麟先生擔任部長。蔣夢麟先生看穿了王正廷要管清華為了要染指基金，若是把基金脫離外交部，王正廷對於清華的興趣亦就減低了。可是這兩件事要做起來，是不能完全分開的。於是同時採取了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由我要求教育部長請求外交部長和美國公使召開清華基金董事會，商量基金處置事項。……我在基金會開會的前夕，在上海《申報》、《時報》、《新聞報》、《民國日報》這四個大報裡，發表了一篇幾千字長的談話，把清華基金的內幕完全揭布。這一下，王正廷受不了了，所以清華董事會也就跟著取消，該項基金交由清華大學保管。這時候我辭職呈文跟著發表，我實在不願意在這場惡鬥之後，再回清華，於是到杭州省親，在西湖邊上盤桓了兩個星期。因為政府的敦促，和清華南下代表的挽留，我不久也就回校。可是我對基金第一個措施就是主張該款不應由清華校長保管，而委託中華文化教育基金（China Foundation）代為保管，如保投資生息，委託該會辦理。至於該款本息如何運用，則清華秉承教育部自由支配之權。到現在

美庚款雖早已結束，但是清華基金在今年據梅貽琦校長的報告，已經積到六百萬元美金左右。這也可以說是我當時一場苦鬥的結果，我心裡感覺到很大的安慰。在此地附帶說一件事，當我辭職到杭州省親的時候，無意中遇到一個同學叫周仲舟，他告訴我他的岳父是楊文瀾，那是一位老翰林，也是一位藏書家，他豐華堂的藏書，在江、浙一帶是很有名的，現在要想出讓。我當時存了一個心，心裡想，我這次離開清華，願意替清華圖書館留個紀念，清華圖書館的中國書太少了，我願意在交卸以前，買下這一大批書，以補清華圖書館這個缺陷。於是我打電報給清華圖書館主任洪有豐（范吾），請他來杭州議價，結果以三萬四千元最廉的代價，購得將近四萬冊精選的藏書。其中元明的刻本有二千八百多冊，經抄本和批校本有二千五百多冊，更有浙江的志書兩百八十幾部，從元朝起每府縣修刻一次之志書，豐華堂都搜集到一部，這是最重要的浙江文獻。最傷心的是當抗戰的時候，許多豐華堂善本的書和浙江志書全套，清華大學當事人把他寄放在重慶附近的北碚工業實驗所內，被日本一次的大轟炸完全毀了，這是我覺得最可惋惜的事。¹

羅家倫對自己的事功一向不吝宣示，也許有些人覺得他喜歡吹噓或者大言不慚，不過一般來說，他所說的多為事實。突出他一己之力的時候是有的，但在他做事那種勇猛勁兒，他自認為功勳卓著也屬正常。上文中他說到的事情，清華廢董自是最得意之事，毋庸多說，其他如強聘蔣廷黻一事，極為人們稱道，被視為民國時代教育界「選賢與能」的一大佳話。羅家倫的友朋們日後說及他善為

1 羅家倫：《我和清華大學》，《文存》第八冊，回憶，第三九九—四一一頁。

大學納賢，常要回憶此事。毛子水說他剛從德國回到北大時，就從當時北大教務長何基鴻那裡聽說過這件事：「志希親自從北平到南開去請蔣廷黻先生。蔣先生本不願離開南開的。但蔣先生若不答應去清華，志希便坐著不走，熬了一夜。蔣先生終於答應了。當年我跟志希同學時，實在看不出來他能夠有這個勁道。」¹羅家倫熬這麼一夜強聘蔣廷黻，就是不及劉備三顧茅廬，也算是精誠所至吧。

在羅家倫對清華的硬件建設中，清華圖書館的建設特別值得一提。因為這圖書館常常是清華人對清華最深的記憶，最大的驕傲，但其建設者卻長久遭到了遺忘。智效民在《羅家倫的校長生涯》中寫道：

「改隸廢董」以後，清華基金於當年八月正式移交中基會。羅家倫爭取的六大項目得到資金保證。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二年，生物館、學生宿舍、圖書館、氣象臺先後落成。其中最漂亮而且影響最大的，恐怕是圖書館了。

凡是去過清華大學圖書館的人，都對它那富麗堂皇的建築和高雅肅穆的環境讚嘆不已。楊絳在《我愛清華圖書館》中談到，一九三二年她去清華大學借讀時，中學時代的好友蔣恩鈿就對她說：「我帶你去看看我們的圖書館！牆是大理石的！地是軟木的！樓上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見樓下的光！」一連串的驚嘆號，表達了這位清華女生的激動和自豪。進了圖書館，楊絳看到那無須油

1 毛子水：《博通中西廣羅人才的大學校長》，臺灣，《傳記文學》第十三卷，第一期。轉引自《羅家倫傳記資料》。

漆的軟木地板，便情不自禁地想摸一摸它有多軟，是不是可以掐得動。到了書庫，她都不敢落腳，生怕把玻璃地板踩碎（《不盡書緣——憶清華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第五頁）。資中筠在《清華園裡曾讀書》中也說：「一進入那殿堂就有一種肅穆、寧靜，甚至神聖之感，自然而然誰也不會大聲說話，連咳嗽也不敢放肆。……在那燈火通明的大閱覽室，浸潤在知識的海洋裡，有一種無限滿足的心靈淨化的感覺。」她還說：「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樓梯進得書庫望著那一排排淡綠色磨玻璃的書架，真有說不出的幸福感，外加優越感」（同上，第一三〇—一三一頁），這就是她非要報考清華大學不可的原因。

清華圖書館不僅裝修考究，館藏豐富，使用方便，而且還有非常幽雅的外部環境。曹禺說，當年他在那裡寫《雷雨》，無論是「想到頭痛欲裂」還是「寫得太舒暢」，都要走出圖書館，在春風、楊柳、藍天、白雲、淺溪和綠草中，才能感受到「韶華青春和自由的氣息迎面而來」。（同上，第四六頁）

毫無疑問，大家都承認清華圖書館在「中國大學中絕對是一流」（同上，第四八頁）的；但是他們在讚美清華圖書館的時候，幾乎都不提羅家倫的貢獻。

羅家倫對圖書館有自己的看法。早在就職時他就批評說：「清華現在的弱點是房子太華麗，設備太稀少。設備最重要的是兩方面：一方面是儀器；一方面是圖書。我以後的政策是極力減少行政的費用，每年在大學總預算裡規定一個比例數，我想至少百分之二十為購置圖書儀器之用。」他還說：「圖書館不厭舒適，不厭便利，不厭書籍豐富，才可以維繫讀者。我希望圖書館和實驗室成為教員學生的家庭。我希望學生不在運動場就在實驗室和圖書館，我只希望學生除晚上睡覺外不在宿

舍！」（《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二卷（上冊），第二〇二—二〇三頁）

一九三〇年初，羅家倫公開招標擴建圖書館。後來他在開工典禮上表示：「我對大學建築計劃的基本觀念是：圖書館實驗室一定要造得堅固，造得講究，使人進去工作時覺得舒服。體育館一定也要設備完好，……體育場一定要寬大，要多分幾處。至於宿舍，則一定要樸素，乃至於不甚舒適。必須如此，學生才不願意老躲在宿舍裡『高臥隆中』，而樂意上圖書館、實驗室、體育館和操場，發揚青年們蓬蓬勃勃，努力上進的精神。這才是我心目中大學應有的氣象。」（《文化教育與青年》，第一一四頁）

除了講究、舒適以外，羅家倫還有兩個原則：一是要為將來的發展留下餘地，二是要有一個「偉大的閱覽室」。關於第一點，他說我們要接受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的教訓，該圖書館建成後，沒幾年就面臨書庫爆滿的困擾，以致不得不另謀出路。為此，他不同意當初要在原圖書館背後加蓋一個建築物，使之形成工字形結構的方案，而是主張把書庫建在北面，「使他有很大的地面可以不斷的推進」。幾十年後，清華圖書館在原來基礎上再次擴建，應該感謝羅家倫的遠見。至於第二點，羅家倫富於激情地說：「大閱覽室是最可以使人興奮，最能刺激人好學的場所。所以這次在西面所建的大閱覽室中，預計可設一千個座位，而且每一個或兩個座位上都安置檯燈。諸位想想，將來有人一踏進這個閱覽室，看見一千個青年學子各個都在座位上，面對著綠色的檯燈，靜靜地埋頭用功研究——這是何等可以使人感動的氣象！」（同上，第一一三頁）此外，羅家倫還在擴建後的圖書館

一層設置許多研究室供教授使用，這也是他高明之處。¹

羅家倫為清華開放了「女禁」，這也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情。他做這件事的乾脆利落更是值得稱道。羅家倫上任之初在就職演說《學術獨立與新清華》中用極簡單但無可反駁的一句話就表明瞭他堅決的態度：「關於學生，我今天還有一句話要說，就是從今年起，我決定招收女生。男女教育是平等的。我想不出理由，清華的師資設備，不能嘉惠於女生。我更不願意看見清華的大門，劈面對女生關了。」²之後他大筆一揮，也不呈報什麼部門，直接在招生簡章上寫個「男女兼收」，就把這件當時會是極大變革，而在他看來則屬天經地義的事情解決了。從一九二八年秋起，清華迎來了第一批十五名女生。

至於當日陳寅恪等名教授正好在羅家倫任中離開清華，也許會讓人起疑。對此，羅久芳做了澄清：

新制的清華大學，不僅提供了優良的求學和研究環境，也增加了與北方其它學府和研究機構的合作與交流。最初校內流傳「北大兼並清華」的謠言，不久便已消失。其實父親羅致人才的努力，從未顯示門戶之見。他剛到任即聘請地質調查所的翁文灝來校設立地理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1 智效民：《羅家倫的校長生涯》，智效民：《八位大學校長》，長江文藝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

2 羅家倫：《學術獨立與新清華》，《文存》第五冊，演講（上）。

究所北遷以後，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陳寅恪和李濟都先後離職參加了這個研究機構。一九二九年十月六日史語所所長傅斯年致馮友蘭、楊振聲和父親的信，為的便是開展雙方合作的構想。信中說：現在寅恪、元任兩兄，及李濟之，我們的研究所均不免與之發生關係。這不是我們要與清華鬥富，也不是要與清華決賽，雖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清華的臺，有諸公在，義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狼狽為善（狼狽分工合作本善），各得其所！

一、清華到底是個學校，此則是一純粹研究機關。

二、清華到底是一處（北平），此則無所不在。

三、清華各種關係太多，此則究竟是個小小自己的園地。

所以在清華不便派人長期在外時，可由我們任之。我們有應請而請不起，而清華也要請的人時，則由清華請之。有可合作的事時，則合辦之。諸如此類，研究的結果是公物，我們絕不與任何機關爭名。¹

可見當時，陳、傅、羅諸人仍保持著過去那種相互理解、信任、關切的關係。

至於陳寅恪離開清華的理由，在其致傅斯年和羅家倫的一封信（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可尋端倪。他說：「前函略言欲於一年內校注《蒙古源流》事，茲再詳陳之。《蒙古源流》著錄於四庫書目，然訛誤極多，幾不可讀。王觀堂先生臨卒前猶勤校此書，然迄未能蕆事。近日既得蒙古

1 羅久芳：《父親在清華大學》，《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第一二二—一二三頁。

文原本，而中國文本系自滿文譯出，又於景陽宮發見滿文本，及蒙古文書社新印漢文本，寶瑞臣、王靜安等校本，是治此書之一最好機會，故思以一年之期間為之。弟居清華兩年之經驗，則教書與著書，兩者殊難並行，此間功課鐘點雖少，然須與學生談話及閱改文卷等，仍無十分餘暇及精神看書及作文。至於所授之課，如自己十分有把握者，則重說一番，如演放留聲機器，甚覺無興趣。如新發現之材料，則尚多闕疑之處，對人高談闊論，亦於心不安。且須片段預備功夫，無專治一事一氣呵成之樂。況近日之為教授者，復多會議等雜務，尤為費時耗力，此種苦處，想公等必知之甚明，不待詳陳也。欲救其弊，唯一策，即仍領教授之俸一年，而此一年之間暫不教書及作他種雜務，雖形式同於乾館（好笑），而實際則責成著成一書，庶幾更有具體之績效可稽。較之隨例授課，為功為罪無從分別者，固勝一籌。而國家欲提倡學術，獎勵著述，恐此法亦不可不試行之。自顧雖非其人，敢援請自隗始之例，燕王卻駿骨、宋賢乞祠祿之義，兼而有之。故不以為嫌，冒昧率陳，或與蔡先生一言如何？勿上，敬請孟真、志希兩兄道安。弟寅恪頓首。六月二十一日。」陳寅恪之離開清華，乃與他此時需要撇開教務，專心校注《蒙古源流》有關。但信中問羅家倫提出的建議，或許未得通過，陳寅恪始離開清華。

專轄廢董的勝利及各項整改和建設事業大力推進，使得清華出現了一個嶄新面貌，並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然而，突然之間，羅家倫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再次向教育部提出辭呈。也就是這次請辭之後，他堅絕不再回清華。對於他離開清華的原因，眾說紛紜，事實上也是綜合因素所致，也可

1 孟憲實：《新發現的陳寅恪書信》，《光明日報》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八日。

說是內憂外困之下必然的結局。首先是北方政局的動蕩。不必諱言兩年前羅家倫入主清華背後的政治因素。北伐帶來的新希望是羅家倫為清華師生接受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然而，當時軍閥閻爾虞我詐，矛盾重重，政局動蕩，變化莫測，此一時彼一時也。一旦政局變動，羅家倫必然受到衝擊。一九二八年，蔣介石聯合馮玉祥、閻錫山趕走張作霖，北伐軍占領北平。而一九三〇年初，馮、閻聯合反蔣，中原大戰開始，閻錫山系力量控制北平，並且有意染指清華。羅家倫為國民黨人，「非走不可」。這是馮友蘭、蔣廷黻與郭廷以等人共同的說法。羅家倫自己也說：「我離開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閻錫山和馮玉祥聯合叛變，勾結汪精衛在北京設立擴大會議，另組政府，當時物理系的薩本棟先生開始在物理系裝置了一架收音機，被閻錫山知道了，以為我們與南京通消息，派人前來搜查，前後在清華搜查過兩次。這個時候，人心自然浮動起來，我在這種環境之下，更不能留在北京了，所以由天津坐海輪南下。」馮友蘭講述了當時的許多細節，基本也是同樣的意思：「一九三〇年，閻錫山反對蔣介石的戰爭開始了。他們三個，本來是聯合反對張作霖的，把張作霖趕出關以後，他們之間的矛盾就尖銳了，以馮、閻為一方，以蔣為一方，展開了大規模的內戰。這場戰爭，北京的教育界也受其影響。有一天晚上，清華學生會開大會，反對羅家倫，要求他辭職，可是這個議案沒有通過。第二天，羅家倫就和幾個比較熟的人商量對策。這時候，楊振聲已到青島大學當校長去了。當時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學生會雖然開了大會，提出了議案，但是議案沒有通過，學校當局盡可以認為沒有這回事，照常工作，不必有所表示。另一派認為，學生會開大會討論校長問題，雖然

沒有通過什麼議案，但是校長不能裝著不知道，必須有所表示，表示只能說，自己不負眾望，引咎辭職。我是贊成第二派意見的。當時我想，學生的這次大會，雖然沒有什麼決議，但是總是對於校長的一個挑戰，一個侮辱，如果校長沒有什麼表示，那就是接受了這個侮辱，不敢反擊。表示辭職，也是一種反擊的辦法。況且學生會雖然在這次大會中沒有得到什麼結果，難保沒有第二次以至第三次大會。如果等到學生通過要求校長辭職的議案，那時候再說辭職就晚了，被動了。羅家倫考慮的結果，接受了第二派的意見，一面打電報往南京表示辭職，一面又親筆寫了一個布告，布告裡表示自己已向教育部辭職，又向學生說了些責備的話，發了些牢騷。學生會果然開第二次大會，通過了要求校長辭職的議案。羅家倫也就離開學校往南京去了。事後有人責備我，說我不應該主張羅家倫辭職。我反覆考慮，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羅家倫不能維持清華的局面，是必然的。因為我們這些人，在當時的學術界和教育界中，還都是後進，沒有什麼特殊表現。羅家倫之所以得到清華校長的職位，完全是依靠政治上的勢力。趕走張作霖以後，蔣介石直接指揮的軍隊，當時稱為『中央軍』，並沒有開到北京。當時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商震為北京衛戍司令，商震是屬於閻錫山系統的人，這一任命就表示，南京承認北京是閻錫山的地盤。不過當時，閻錫山還在表面上服從南京。對於北京的教育界他沒有插手。羅家倫就是乘這個機會來接收清華的。馮、閻同南京決裂，凡是靠南京勢力的人，本來都應該撤回南京，在北京是站不住的。況且像清華這樣的學校，在教育界和學術界有相當高的地位，在財政上又有充分的來源，閻錫山和他那一派的人，豈有不想搶去之理？所以羅家倫的辭職，是見機而作。如果能在學生開會以前就先表示辭職，那就更主動，用當時的話說，那就更『漂

亮』。」¹

但羅家倫離開清華最直接的導火索，畢竟是自清華內部，由學生發生的「驅羅運動」。羅家倫之所以避而不談，或為其內心隱痛吧。這所謂「驅羅」運動又緣何而起呢？事實上，雖然清華學生會在一開始表現了足夠的歡迎姿態，雖然專轄廢董行動中學生會與羅家倫協同一致，雖然無論怎樣不能抹殺羅家倫給清華帶來的福利和新氣象，但自始至終，羅家倫同清華師生之間都摩擦不斷。蘇雲峰在《羅家倫與清華大學》中詳細分析了當日的複雜原因：「在羅與清華教師的關係方面，他吃力卻不討好。在他到校以前，就有一部分人跑到美國大使館去『挑撥離間』，破壞他的形象了。他帶來的清華大學組織條例，又大大地削弱教授、評議二會的權力。他雖然尊重評議會，但後來在院長任命權上，也曾與教授會發生摩擦，經協調折衷，始告解決。他個人政治色彩較濃，又好『展露才華』，給人不太好的印象。他的大力整頓，裁汰教職員工，又新聘教授講師三十餘人，『得罪了許多人』，也使許多人失望。清華人一向強調純種主義，即清華人治理清華，對外來的政治及學術勢力，並不歡迎。羅家倫不僅是國民黨人，而且又是北大人，他延聘了許多北大入當教授，如馮友蘭、周炳琳、楊振聲等都掌握相當的權力，自然引起清華師生的疑慮。學生們都聽過這種謠傳，說『清華和北大合併』了。馮與周都有這種感覺。所以當學生會發動反羅運動時，『多數教授都袖手旁觀，不支持他』。」「羅家倫與清華學生會的關係也不好，學生會是真正主動發起驅趕校長的組織，所以要看看他與學生的關係。據一位班代表並參加大會的學生回憶說，『羅先生就職以後，大

1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六八—六九頁。

家對他的批評不太好，因為他話說得太多；他的話常有不妥當的意味，就是他說的不大像是從事學術研究的人。』於羅到校沒幾個月，他們聽到謠傳，清華和北大要合併了，更增加對羅的惡感，遂和另一位班代表向學生會提出『罷免羅先生的提案』，因未作醞釀活動，而被否決。他後來任學生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曾請教幾位清華畢業返校執教的教授，關於驅羅的意見。『他們都未置可否』。換言之，清華教授，這時尚未表示意見，但學生何以這麼積極呢？我想，除了怕被北大合併並不喜歡羅個人作風外，還應該考慮到他對學生的有關改革措施。前面提到，他的紀律化、軍事化管理，強制學生補期末考與繳學費，都有損於學生的自由與利益。羅氏並不完全承認紀律、軍事化的失敗，但郭廷以說『紀律化有點操之過急』，學生對軍訓最初覺得好玩，但『半年以後無法繼續下去，只好作罷』。馮也說紀律化成績平常，軍事化則『澈底失敗』。在這種鬱積的不滿情緒下，他們無睹於羅氏在制度、方向與學術化上的成就，乘中原大戰爆發之際，突然於一九年五月二十日的學生會代表大會上，有人提出請羅校長自動辭職案，理由除不滿他的作風外，大致是不滿意『他鉅制言論，束縛同學』，『濫用私人，離間分化』，與他的四化政策。不過，這個提案於翌日被全體大會所否決，照理，羅氏應感到欣慰，而他居於『道德的抗議』，根本否認學生有與聞校長進退之權，乃斷然於五月二十三日向教育部提出辭呈，即行離校。不幸，羅的壯士斷腕作風，正為學生會領導人所乘，在次日的學生會全體大會上，張人傑（一九三一級，經濟系）說：『我們相信在座各位同學，沒有一位會認為羅先生的人格有問題，若我們挽留他，不讓他辭職，就是侮辱他；為尊重他的人格，請教育部趕快批准。』大會馬上通過提案，就這樣，羅家倫就離開清華了。到底清華學生驅趕羅家倫，是自發的呢？還是受到北方政治的干預呢？可有二種不同的解釋。蔣廷黻認為當閥、馮反對中央

時，『某些閻氏左右的學者煽動一次學潮，反對羅校長』。蔣氏沒指明何許人，不過，可以確定系由閻錫山身旁的喬萬選去聯絡推動。但據學生會領袖張人傑說，這是『單獨對羅先生』的，『沒有人為校長問題找我們；清華學長、教授都不表示意見；學生也很單純……根本沒有什麼背景可言』。等到羅校長走後，才有『兩位清華學長，任北大教授（的），來找我講話』，『問這次運動是否希望請清華學長回來主持母校，我答是』。於是他們才提出喬萬選。張人傑說，喬是閻錫山派的，很理想，但要等到戰局結束，才能來接，現在不行。換言之，依張人傑的意思，純粹是學生自發的，教授與學長都無意見，事後才透過校友與他們聯絡。我認為儘管是事後才掛鉤，清華北平、上海同學會應有很大的牽連。郭廷以說，清華同學會自始一直抵制羅氏，十九年春也『一直為難羅先生』。可為證明。」¹

政局也罷，人事也罷，總是讓人無奈的紛亂和複雜。事實到底怎樣，恐怕公說公理，婆說婆理，難以全部還原。就個人風格來說，羅家倫無疑和他的恩師蔡元培不是一種類型。蔡人格上的魅力令人折服不說，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的涵養和氣質，圓通含蓄的處事風格，大概都是做大學校長最理想的風範。羅家倫執掌清華兩年，即使厭惡他的人，也不否認他的「使命感」、「事業心」，也許是正當盛年才有的熱情和衝勁，羅清華兩年的任期，其風格幾乎就是直奔主題的熱烈和直率。但是，很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合時宜的事情，他這個授了國民黨少將銜的所謂「儒將風流」，當日似乎膨脹到視而不見或渾然不覺。本來其政治背景就已易為人詬病（他那時候還時常身著軍裝，

1 蘇雲峰：《羅家倫與清華大學》，《文存》第十二冊，附錄，第九五〇—九五二、九五二—九五三頁。

踏著馬靴，到清華師生面前亦如是，這副尊容除了在時人那裡落下笑柄，就是今天想起來，仍要覺得是一大敗筆！），他且毫無收斂，處事霸氣，儘管毫無疑問他正是藉有利的政治背景做了不少實事，但仍惹人反感，引得多少人感慨他「吃力不討好」！他在專轄廢董事件中用淋漓的霸氣一舉攻下外交部的堡壘就不用說了。他在改革校政中，亦是大刀闊斧，不徇私情，不留情面，才會使得清華臃腫的人事和龐雜的校務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精簡得乾乾淨淨、梳理得井井有條。這不說是奇蹟，起碼也讓人驚嘆。馮友蘭舉過一個很小的事例，頗能說明羅果斷的風格：當年清華想招收女生，這個問題如果要跟有關部門商量，那就可能無休無止地討論下去。於是，羅家倫在招生簡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個字，問題就解決了。這種風格，恐怕也是此一時彼一時，各人的觀感會大相逕庭。一面可以是高效果斷、敢於任事，一面就可以是獨斷專行、把持校政，尤其是在清華那個自由主義傳統濃厚，學生握有相當權力，而教師亦極珍惜和維護教授會、評議會「教授治校」傳統的地方。羅家倫個人缺乏含蓄的性格亦成為招致惡感的重要原因。事實上，他這種性格特徵，在其一生各個階段都可見出。他的朋友也常不客氣地對其大加揶揄。他的好說大話，好露才，在知識分子當中，無疑是最易招人反感的，可羅似乎渾然不知，始終我行我素。甚至對於別人的揶揄或譏諷，他也不一定知道。黃季陸就說過還在復旦公學時，大家諷刺他是「老夫子」，他聽不出諷刺的意思，還很大言不慚地說自己是「孔夫子」。在這些方面，羅家倫的自以為是固然好笑，但與其說他狂妄自大，倒不如說是有點書呆子的味道。張曉唯在《羅家倫在中央大學》一文中這樣評價過羅氏：「羅家倫辦學雖然努力仿照他的老師蔡元培先生的理想和做法，也確乎卓有成效，卻不曾贏得像蔡先生那樣的廣泛尊重，這多少有些令人困惑。大凡由學生運動領袖而知名的人物，往往是成名早而個人英雄

情結偏重。成名早，即使天資過人，因受盛名之累，難有潛心研磨學問的定力，有時就不免淺顯之譏；個人英雄情結偏重，則能夠開創局面，成就事功，然身帶霸氣，也在無形中結怨於他人。」¹

物理學家周培源初返清華，受到羅家倫的禮遇。羅熱情地接見了他，並高度評價他在相對論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績。然後羅家倫就開始對周培源大侃相對論。周氏心中笑羅班門弄斧，一個學歷史出身的人，怎能撓到相對論的癢處？但出於禮貌，不得不隨聲應諾，心裡則對羅留下了第一個印象：此公喜歡表現自己。如此種種，就更不必說清華校史資料中留下的不少關於羅家倫「醜態」、「惡行」的記錄了。羅家倫這些缺點，對深知他的朋友來說，不過認為他不拘小節，至多也只是出入小德，但在學校師生中那些並不會深知他，而主要憑印象來認識他的人，他的形象就蒙上了「地地道道的政客」，「過分熱衷政治，自我表現欲太強」，或「一個在各方面都喜歡展露才華的人」這些很不客氣的批評和譏諷。

但羅家倫跟周培源談論相對論僅僅是為了露才麼？恐也未必。羅家倫的老友方東美曾回憶羅氏後來在中大當校長時，為了羅織人才而去參加各種他完全外行的學術會議。方東美說：「志希是學文科的，他雖然寫過《科學與玄學》的論文，但是他的科學也只是玄學式的科學，對真正的自然科學，他不會有很深的了解的。但是凡有新型的學術會議，他無有不到的，而且是第一個到最後一個退席。當時我就笑他不務正業，校長該辦的公事有多忙，哪有這許多時間來參加這些外行的會議。他回答我說：『這你就不了解了。學問之事是個人的事體，可以很專門，但是在學術會議上，這些

1 張曉唯：《羅家倫在中央大學》，轉引自張曉唯：《舊時的大學和學人》，中國工人出版二〇〇六年版。

專家學者必須把他們的專門之學，用文字語言表達出來，來使人懂，而不會亂說話的。譬如彈道學，我完全是外行，但是我聽了彈道專家的講演，他用他的方式來表達他的專門之學，我聽了之後，至少可以抓住他的見解之要點。我認為這是一位做教授的人的首要本領。教授必須要有學問，同時要能表達，這樣才能領導學生。所以，我對這樣的學術會議絕不放過。無論我對這些學問是如何的外行，沒有退過一次席。我的目的是在為中大求師。」¹聽過羅這一番話的人，是不是還會笑他班門弄斧呢？某種意義上，現代學科的分際和發展，使得任何人，不說完全掌握所有學科，就是通曉幾門學科，都是很困難的事情。即使是某個領域頂尖的學者，可能出了他那門學科，也馬上變得完全無知。作為一個大學的校長，要領導這麼多不同學科領域裡各自的專家，似乎也成了某種不可能的任務。也許應該這樣來看，即作為一個學科領域中的專家學者和作為一個大學校長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羅氏無疑在學識上遭人質疑，年紀輕輕，毫無資歷和建樹，不管他自己認為如何，著者也傾向於羅並非是一個「學術」的人，他的確是一個適合實際事務，以「事功」見長者。作為一個大學校長，他在專門的學術地位上可能不夠，但他對各種學術能探知一定途徑，在實際事務上又富有才能，則不得不承認他的恪盡職守，甚至多有過人之處。對於此點，與羅家倫志趣相去甚遠但又對其知之甚深的老友陳寅恪就看得非常清楚。陳寅恪對羅家倫個人的所謂「學術」是不可能讚賞的，關於此節，有一件趣事。據說一日，羅前去看望陳，並送給陳一套他本人主編的《科學與玄學》。陳寅恪拿著書，翻了翻便說：「志希，我送你一聯如何？」羅說：「甚好，我即刻去買上好的宣紙

1 方東美：《「但有凋謝無死亡」的羅志希先生》，臺灣，《傳記文學》第十三卷，第一期。轉引自《羅家倫傳記資料》。

來。」寅恪說：「不用了，你聽著：『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羅聽後，大笑不止。寅恪接著又說：「我送你一個匾額：儒將風流。——因為你在北伐軍官拜少將，不是儒將嗎？你剛剛討了個年輕貌美的太太，正是風流。」而陳寅恪對羅之「事功」則另有一番評價，這件事是毛子水在羅逝世後回憶起來的，他說一九三〇年羅家倫離開清華之後，有一天他在陳寅恪家裡吃飯，「我和他（指陳寅恪——筆者按）談起志希（那時志希已經離平赴南京了），他說：『志希在清華，把清華正式地成為一座國立大學，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論這點，像志希這樣的校長，在清華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我聽了這話，心裡頗不服。我雖然是羅志希多年的朋友，但是『前無古人』猶可說也，怎麼能肯定的說『後無來者』呢？而寅恪在一班朋友中，說話是最有分寸的。我當然要問到底。寅恪對我解釋說：『清華屬於外交部時，歷任校長都是由外交部所指派的。這些人普通辦事能力雖然有很好的，但對中國的學問大都是外行，甚至連國文都不太通，更不要說對整個中國學問的認識了。像羅志希這樣對中外學術都知道途徑的人，在清華的校長中，實在沒有過！以後恐怕也不會有了。』寅恪以為『以後也不會有』，並不是說後人沒有志希那份天資，或缺少像他的學歷，而是時代的不可能。學問上的分工，一天比一天細。有些學問上的問題，在十九世紀末年只是一個新的假設，到現在則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已有汗牛充棟的氣勢了。事實上，在十九世紀末年到二十世紀初年，在西方先進的國家裡，如英、德、法等國，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兩個可以說『博、精、通』的人，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這樣的人便一天少一天了。這就是時代的關係。在今天，無論哪個大學或專科學校的校長，實在找不到博通中西學術的人。不要說兼通中西，就是中西兩方能精通一方的也沒有了。所以我到現在還常常記得陳寅恪先生稱讚志希的話。我今天所以特別提出來，因

為我跟寅恪相處二十多年，知道他向來是不輕易稱讚別人的。我平常跟他談話時如有什麼錯誤，他就當面指正。因為我對他的話印象很深，所以到今天還記得。」¹

羅氏自己呢？不管是喜歡不喜歡他的人都不否認他的那些「使命感」、「事業心」和「熱情」，其動機何出？動力何在？從他幾年後寫下的《新人生觀》中似乎可以看出一些心跡。他在《道德的勇氣》一文中說：「我們所要的是『臨事不懼，好謀而成』。對事非經實在考慮以後，絕不輕易接受；而一經接受，就要咬緊牙根，以全力幹到底。他所有的勇氣，都是經過內心鍛煉過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現出來的。」²許多人覺得羅氏平時似乎膽小懦弱，而臨事常能擔當，甚而勇猛精進，從這樣一段話，或許就可以說明中間的反差。羅氏將「道德的勇氣」和「匹夫之勇」、「好勇鬥狠」之「勇」相對立。他說：「要知道什麼是道德的勇氣，就要先知道什麼不是道德的勇氣。第一，衝動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衝動的行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時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審慎的計劃，所以不免『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他的表現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與堅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堅毅愈差。細察社會運動的現象，歷歷不爽。第二，虛矯也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虛矯的人，絕不能成大事。所謂『舉趾高，心不固矣』。」³所以，他說道德的勇氣，要經過長期有意識的鍛煉，要通過修養來達成。這種修養和鍛煉包括知識的陶冶、生活的素養、意志的鍛煉、臨危的訓練，其中他尤其花了很多筆墨談到臨危的訓練。他以文天

1 毛子水：《博通中西廣羅人才的大學校長》，臺灣，《傳記文學》第十三卷，第一期。轉引自《羅家倫傳記資料》。

2 羅家倫：《道德的勇氣》，《歷史的先見——羅家倫文化隨筆》，第一一頁。

3 羅家倫：《道德的勇氣》，《歷史的先見——羅家倫文化隨筆》，第一〇——一一頁。

祥為例，來說明「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從羅氏一生屢屢在危急狀況下才特顯其「勇」而言，他這篇文章要麼是自己人生信念的吐露，要麼是真實體驗後的感悟，不管怎樣，他的確在自己生命中多次印證了這裡所說的「道德的勇氣」。

羅家倫在清華僅僅兩年時間，其間的糾葛、恩怨不斷，他的才幹，他的事功，也幾乎被他這些招人詬病的個人風格所淹沒。幾年後他出掌中央大學，歷經最艱難的歲月，苦苦支撐，成就中大輝煌，則幾乎贏得所有人的尊重，博得滿堂喝彩。其實他出掌中大的時候，也許因為年齡的增長，閱歷的豐富，更能通解人情世故，也一定吸取了清華時候的很多經驗教訓。但根本上，他的理念、他的行事，未必與執掌清華時候有多麼巨大的轉變，而兩相對比，對其評價的反差竟如此巨大，的確令人困惑。在我看來，羅家倫與清華的恩怨也就只是歸結為政局的動蕩和人事的糾葛兩相激蕩、互相利用而已。羅家倫對自己離開清華，只提政局的影響，並不奇怪。對他這個有政治背景的人來說，政局的動蕩是再明顯不過的原因。但隨著政局動蕩在跟他「較勁」的，還有種種伏在莫測「人心」中的恩怨糾葛。羅出掌清華的時候，可以說不過是剛從國外留學回來沒兩年的一個「青年」，以羅氏的年齡、個性和閱歷，以他的種種表現來看，他實在算不得是老於世故之輩，所以對這些人心複雜的態度，恐當時不懂究竟，過後更不願揣度。這隱在暗處的恩怨糾葛，在教師們對他的態度中最為明顯。茲舉吳宓一例。眾所周知，在新文化運動中，羅家倫和吳宓發生過好幾通論戰，可謂「夙敵」。兩人在清華相遇時，彼此看待對方的心境則大不同。吳宓七上八下，心存芥蒂，處在吳宓的位置，加之其本來就是過於敏感的性格，那種忌憚和憂慮的心態自然毫不奇怪。而羅則似乎把論戰亦看作是「故交」，這可以說他是以才取人，也可以說他是為了籠絡人心，但以羅大大咧咧的個性，

就算籠絡人心，恐也非出自虛偽。事實上，羅家倫在清華的時候，真的做到了不拘一格納人才，例如昆曲大師「紅豆館主」愛新覺羅·溥侗應聘為國樂導師，錢鍾書「破格」被錄取入學，都成了一時佳話。多年後他口述回憶往事時說，他當年聘請教授的原則之一是：「不把任何一個教授地位做人情，也絕不以我自己好惡來定去取。」並且列舉了前文所述的吳宓教授的「趣事」，還說他和吳宓「倒成了很好的朋友」。但天知道他們是否成了很好的朋友！要是從吳宓的日記看來，羅家倫真有自欺欺人的嫌疑。吳對於羅家倫的不信任的確算是「宿怨」，他在日記中把「胡適、羅家倫之流」，視為「排除異己，以邪說曲學召惑眾者」¹。兩人無論於性情氣質、學術觀點抑或政治立場，都有格格不入之勢。而羅入北平乃藉著北伐聲威而來，這種政治背景也成為羅與昔日舊交或夙敵新一層的隔膜。當時清華早就人心浮動，關於國民黨將如何「黨化」清華的傳言開始滿天飛。早在羅受命前，在陳寅恪的婚宴上，吳宓和羅家倫都應邀出席，吳便對羅避之唯恐不及，覺得羅有拉攏人心的嫌疑，無疑將其視為「政客」一類。過了幾天，吳宓聽說外交部已經為清華大學物色了三位校長人選，這三個人是凌冰、張歆海、羅家倫，「而以羅為最有希望云」²。次日，他去趙元任家吃飯，在座的還有錢端升、張奚若夫婦，金岳霖及其美國女友。席間談話，雖未說及清華校長事，但吳宓卻隱隱不安，覺得「似糾眾擁戴趙元任為校長，而由羅家倫暗中主持一切」³的。接著，他們就知道羅接受任命的消息。羅受命上任前，曾於八月中旬派郭廷以到清華了解情況。郭廷以了解情況後

1 《吳宓日記》第四冊，三聯書店一九九八年版，第七七頁。

2 《吳宓日記》第四冊，第九一頁。

3 《吳宓日記》第四冊，九一—九二頁。

給羅去信，言除在北平的畢業生聲稱「羅某長校，誓死反對」外，學生會和大多數在校學生都對羅表示歡迎。郭還對羅家倫說，「我師一再致意於吳宓，不知吳早已宣言不與我師合作」了。而對於吳宓的反應，羅家倫似乎並不介懷。九月四日，吳宓與楊振聲見面時，楊代表羅家倫再次向他致意，希望他能留下來繼續合作。楊振聲與羅家倫是北大同學，共同參加過五四運動，羅家倫上任時，特意把他和馮友蘭從北大挖來擔任教務長和秘書長。楊還說：「羅君不以個人意見為好惡，且平昔待朋友亦甚好云云」。但吳宓還是疑慮重重，心存芥蒂。²就在同一天，清華學生召開大會，驅逐了部分教工。吳宓懷疑這是羅家倫暗中指使的，因此他在九月七日的日記中說：「聞羅氏將以楊振聲為本校教務長。羅之與學生勾結，為之掃除障礙，似屬事實。如是辦法，豈可云正當？清華前途，益將陷於悲境矣。」³吳宓憂心忡忡而又無可奈何的心態溢於言表。在當日清華那種氣氛下，抱持吳宓這種擔憂觀望心態的教師，必不在少數。一直到羅家倫對校政大刀闊斧地改革起來，清華師生均感受到其成效後，吳宓才漸漸改變了一些看法。他在日記中說：「訪王文顯，悉羅校長力圖改良校務，並增善教授待遇，所認為庸劣及為學生攻擊之教授，固在所必去；而優良之教授則反加增其薪金。西洋文學系尤為滿意。宓之月薪，已內定增為三百四十元。宓向不持與人比較或虛空立論之態度，自家能增四十元，亦佳事也。」⁴而改革利益觸動到吳宓時，他同樣極不滿意。如前文所述，

1 郭廷以：《抗戰前的清華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專刊，二〇〇〇年版，轉引自智效民：《羅家倫的校長生涯》。

2 《吳宓日記》第四冊，第一二三頁。

3 《吳宓日記》第四冊，第一二五頁。

4 《吳宓日記》第四冊，第一三四頁。吳宓與羅家倫此節，參考了智效民的《羅家倫的校長生涯》一書。

要吳宓讓出兩間房間時，吳宓甚至曾以「自殺」相威脅。當日情景中各人的微妙心理不會進入歷史的評價，但誰能說這些東西不在暗地裡參與了歷史事件的形成呢。著者無意得出一種歷史敘述的合法性，倒是想到張愛玲那種文學性的說法：「生活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虱子。」在這個語鏡中，可以有一種非常感性的理解。這裡借吳宓的日記可以多少還原當時清華教師中的一些人對羅家倫的態度。不過，以吳宓這一類對羅存有疑慮的心態，似不足以主動積極地參與驅羅，但會成為風潮中不置可否、袖手旁觀那種角色。當日情形中，清華教師的立場似乎也正如此，時局壓頂、學生驅動而教師袖手矣。

不過，別忘了，吳宓是改革受益者，所以才會慢慢改變對羅的惡感，而那些改革中利益受損者呢，那麼多被羅毫不留情地辭退或拒絕的人，他們不會懷恨在心，藉機洩憤麼？對此，王世杰在羅家倫逝後的紀念講話中特別提出來：「羅先生做大學校長之時，對於選聘教授，極為嚴格，毫不苟且，也是值得我們敬佩的。我記得……遷臺之後，……蔣公擬提名他為考試院副院長，……有一次問我：『羅志希很好，為什麼有許多人批評他、攻擊他？這是什麼原因？』我回答說：『據我所知，羅志希在做大學校長之時，政府中和黨中許多人向他推薦教職員，倘若資格不合，他不管是什麼人，都不接受，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羅在清華的狼狽固然是多種因素所致，而成功執掌中大後的黯然離職也與任人唯賢的關係甚重，又怎是偶然。清華學生給他的罪名裡還有一「濫用私人」一說，大概是說他到清華之後從北大挖來馮友蘭等人所組的「班子」吧，要是這樣，真是天大的不公

平。馮氏後來在清華二十餘年，成為清華歷史上最得力之管理者和教員之一，若是一個一無是處的「私人」，以清華師生的厲害，別說二十年，就是兩個月也待不下去，這看看他們一而再再而三驅走校長的風潮就知道了。我認為張曉唯在《喟嘆一聲羅家倫》一文中的許多剖析是中肯的。他說：「羅家倫在清華的辦學進程由於政治風雲的突變而戛然終止。中原大戰閻錫山控制北平，清華園內『驅羅』風潮驟然而起，以羅的慣有風格與學生形成對立，局面遂無法挽回。其中，校內外對羅不滿和另有企望的一些人顯然起了發動和推波助瀾的作用。羅家倫之於清華，依憑政治（代表南京政府）而來，又緣於政治而去，這首尾當中的是非功過，囿於『現場情景』的人們難免一時梳理不清。」¹但也許對羅家倫，清華師生的評價真是有太多的冤屈，如果當年是寓於「現場情景」不能認清，那麼事隔多年以後也當有所澄清，也難怪羅家倫當年的知交方東美會憤憤不平地說：「後來清華畢業的同學，對羅志希這位校長的功績，不肯承認。我認為這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平之事！」²方東美認為，僅就爭取到清華基金以及對清華的人才建設兩項而言，羅家倫已是善莫大焉，此兩舉乃是奠定清華後來良好發展至關重要的貢獻。所以他甚至會這樣說：「我覺得志希辦大學，對國家最有貢獻的就是他做清華校長的時候。」³許多事情真是說來容易做來難，面上漂亮背後淒涼。羅對於離開清華，只提時局變化而避談他節，我想他真有難言的痛苦。「據了解他的朋友們說：羅一生轟轟烈烈，表面上看起來像粗枝大葉的人，不肯對外人言說；他為國家辦大學認真誠懇，忍受了

1 張曉唯：《喟嘆一聲羅家倫》，《書屋》二〇〇五年第三期。

2 方東美：《「但有凋謝無死亡」的羅志希先生》，臺灣，《傳記文學》第十三卷，第一期。轉引自《羅家倫傳記資料》。

3 方東美：《「但有凋謝無死亡」的羅志希先生》，臺灣，《傳記文學》第十三卷，第一期。轉引自《羅家倫傳記資料》。

別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只求把學校辦好做到了『勇於公義，怯於私鬥』。他的學生則分析他的性格說：『像他這樣帶有詩人氣質和士大夫教養的人，宦海浮沉，注定失敗！』是耶非耶？」

不過，當我看到羅氏《新人生觀·知識的責任》文中一段話時，我對羅家倫常常表現出這種「啞巴虧」的性情有了別樣的 understanding。他在該文中有一段話批評中國文人的「清談」、「清議」，認為「清談」、「清議」是最不負責任的思想的表現。「南宋是清議最盛的時代，所以弄到『議未定而金兵已渡河』。明末也是清議最盛的時代，所以弄到忠臣義士，凡事不能作有計劃的進行，逼得除了一死以外，無以報國。『清議可畏』，真是可畏極了！橫直自己不干，人家幹總是可以說風涼話了。……」²我們不知道這「清議可畏」的感慨是羅氏早已有之的心理準備，還是他閱歷世後的經驗之談，不管怎樣，在他這個重視「力行」的人看來，「清議」必非其所喜。這裡所言「清議」之可畏實有二意，一乃「人言可畏」之意，直指那些說風涼話的人；更糟糕的是「清議」害事，貽誤戰機、沒有擔當。從羅家倫在清華的行事風格來看，可說他對「清議」害事頗有前見，提前預防，許多事情，他知道一旦付諸「清議」必致無法解決的，他必斷然以「非常」手段處之，快刀斬亂麻，頗有「議未始而羅已事畢」的味道。他既然知道「清議」害事而刻意規避之，則他必定也知道少不了事後的眾說紛紜，「清議」可畏。只是有了勇於任事的心理準備，對這些可畏的人言表現出一種默然，也許就不那麼難以理解了。

1 張曉暉：《喟嘆一聲羅家倫》，《書屋》二〇〇五年第三期。

2 羅家倫：《新人生觀·知識的責任》，《歷史的先見——羅家倫文化隨筆》，第一〇——一八頁。

說到清華教師跟羅家倫之間的關係，不可避免會說到教授會、評議會同校長權力的關係問題。這中間，對羅的評價亦是紛紜。所謂「把持校政」所指大約就是此節，似乎羅家倫掌校期間和教授會、評議會關係不洽，甚至削奪教授會、評議會的權力。對這個問題，馮友蘭的看法是比較持平的：「所謂『教授治校』，在清華得到了比較完整的形式。在羅家倫到校以前，清華本來有『評議會』，由行政當局和教授會的代表組成。學校的規章制度必須由評議會通過，重要措施必須由評議會審議，才能執行。羅家倫尊重這個組織。當時他和教授會有異議的，是關於院長人選問題。清華設文、法、理、工四個學院，每院有一個院長。羅家倫主張，各院院長由校長就教授中聘任；教授會主張，由教授會選舉。這是一個校長和教授會怎樣分權的問題。因為院長不僅只負責管理本院的事務，還有出席學校的各種重要會議的權力，照清華後來的實踐，後者尤其重要，因為各院的事情，主要是各系分辦了。此項異議，經過商量，達成協議：每個院長由教授會在教授中選出二人為候選人，由校長就其中選定一人，加以聘任。任期二年，可以連任。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和四個院長組成校務會議，處理學校的經常事務。四個院長也出席評議會，為當然評議員。這樣，就有了三級的會議。評議會好像是教授會的常務委員會。校務會議又好像是評議會的常務委員會。因為這三級會議還各有自己的職權，各有自己的名義。校務會議不能用評議會的名義辦事，評議會也不能用教授會的名義辦事。這種教授治校的形式，除了在西南聯大時期沒有評議會之外，一直存在到一九四八年底。」¹蔡仲德在《也談羅家倫執掌清華的是非功過》中還提供了另一位時人，著名物理學家陳岱

1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書》第一卷，第二八七—二八八頁。

孫的說法，他寫道：「關於清華的教授治校體制，陳岱孫（三四十年代清華大學校務領導體制和前校長梅貽琦）一文（東方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清華影》）認為在一九二八年羅家倫掌前後有很大不同。在這之前，雖已有教授會、評議會，但它們只不過是校長的諮詢機構，權限很少，作用很小；在這之後，『教授會的地位提高了，評議會的作用加強了，校務會議則執行著虛設的、受了一定限制的校長的職能』。所以清華的教授治校體制在一九二八年前只存在其『胚芽』，它是在羅家倫長校時初步形成，在『校務會議暫行校務』期間迅速發展，最後由梅貽琦加以扶植、鞏固、定型的。陳文還提及清華院長產生辦法問題，說，清華第一任院長產生於羅任校長的一九二九年，根據當時教育部大學組織法，院長應由校長直接任命，教授會則認為院長應於教授會選舉後方由校長任命，後經協商，雙方作了讓步，改為每一院長先由教授會選出兩名候選人，再由校長從中擇一任命，擇任時充分考慮教授會選票的差別，這一辦法後來成為清華的傳統，直至一九四八年底。馮友蘭《三松堂自序》的記述與陳文大致相同。羅長校時期的清華校務會、評議會、教授會會議記錄也表明羅與清華教授們的關係大致融洽，教授治校體制得以正常運作，教授治校原則始終得到貫徹。這就可見，羅不是削弱、損害了教授治校體制，而是尊重、發展了這一體制。」兩位時人差不多的說法中，羅家倫的確在清華院長產生辦法上同教授會、評議會有過分歧，但最終妥協，應該說以教授會和評議會的意見獲得成功。除此之外，陳的說法是直接肯定了羅對清華此制度的發展，而馮的說法也差不多，只是和他肯定羅其他貢獻一樣，說得比較含蓄隱諱而已。

1 蔡仲德：《也談羅家倫執掌清華的是非功過》，《中華讀書報》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當日事實也確是如此，教師並不是驅羅的主力。直接發起驅羅的是學生。至於羅和學生間的緊張關係，前面說到的紀律化、軍事化，以及其他「黨化」的措施無疑最招致惡感，是羅在清華最大的敗筆。一直到今天，翻開各種材料，這都是清華學生恥笑的一出鬧劇，以及各種貶斥抨擊的主要標的。學生和羅的緊張關係一直存在。在一九二九年四月，當羅氏由於清華基金使用問題與清華大學董事會發生矛盾而提出辭職時，學生會就申明「無論國府批准與否，本校無人表示挽留」，使他大掃面子。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二日羅家倫離開清華後，校務會議決定自七月十日起，由馮友蘭「批行清華例行公事」，即代理校長職務。七月二十九日夜間即發現校內有匿名標語，說馮友蘭「想當清華校長」，「『河南黨』要霸占清華」。三十日，馮友蘭向校務會議報告此情況後，校務會議決定於三十一日召集學生談話。談話時，馮友蘭表示「如果我們有錯，大家不妨明說。若半夜貼匿名標語，我不希望清華有此等事」。同一天，有汪吟龍者登門對馮友蘭說，喬萬選願與馮合作，請馮仍當文學院院長，馮表示「只能依教授會之意而行」。此後又有「清華大學讀書護校會」在報端造謠，說清華校務會議「形同解散，百務益微」，校務會議當即發表聲明予以駁斥。八月八日，馮友蘭又發表個人聲明，逐一駁斥各種謠言攻擊，並明確表示，「所謂讀書護校會者，已經把我告在閻總司令那裡了，我靜坐在清華聽候查辦。同時我要聲明，我受教授會的推舉，加入校務會議維持校務，要負我的責任。除非我不能行使職權，除非校務會議別人全走不能開會，除非教授會撤了他給予我的代理文學院院長之職，除非大多的學生對我失了信任，我一定要遵守教授會的意思，維持清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我的修養還未到此，但我是照此方向

做的。」同日，清華學生會致函校務會議，表示支持，說「校務會議諸公悉心維持，一切進行如常，學生等無比感佩。值此校長問題未解決前，學校岌岌可危之際，萬請毋信流言，致感不安。學生等皆了然深悉，異常諒解。尚懇諸公仍本愛護清華大學之精神貫徹初衷，始終維持，不勝企禱。」²這場風波到此結束。

澄清以上這些關係後，著者會更傾向於蔡仲德在〈也談羅家倫執掌清華的是非功過〉中對驅羅運動的看法，他引證的是當年清華學生代表大會主席李景清所寫〈清華校潮的前後〉一文中對羅之被驅的分析，蔡仲德寫道：「值得注意的是，李文透露，積極驅羅者不是清華全體師生，也不是清華全體學生，而是校外的『清華同學會』（即部分校友）和校內少數學生組成的所謂『護校團』，此『學生會』和『護校團』不僅驅羅，而且擁喬（萬選），甚至與閻錫山有勾結。所以李文中有一樣的話：『他們既然不滿意羅家倫，就應該找一個至少比羅家倫高一等的人才對，為什麼偏要捧一個羅家倫還不如的喬萬選呢？在清華學生會一方面，也不過是想借喬氏的力量，他們可以爬進清華園的大門；本校諸位驅羅的健將，也不過是想讓近水解渴的喬氏進來堵住羅家倫的回路，他們諸位就可以高枕而臥，免得再做羅家倫回校整頓校風的噩夢。……他們不過抱一種「謀地盤」、「報私仇」的心思來驅羅擁喬。……我們可並沒有想到護校團諸君不但驅羅而且擁喬，不但去私見喬萬選而且擅電當局（指閻錫山。下同——蔡按）請予維持。我們也並沒有想到清華同學會諸公，不但主張擁

1 馮友蘭：《清華現狀與我的態度》，《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一九六期，一九三〇年。見《三松堂全集》第一四卷，第四八一—五一頁。

2 《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一九五期，一九三〇年。

喬而且擅電當局保薦喬長校。他們的計劃，以為由清華護校團去電表示學生的意思，清華學生會去電表示畢業學生的意思，如此閻錫山就不會不信而不加以任命了。……這就不能不聯繫「學生會」、「護校團」在此前後的作為。在此之前，即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任命羅家倫為清華校長後，南京、上海清華同學會部分會員曾表示反對，且斷言「外（交）部以前管理清華成績甚佳，……有外交關係，羅氏總不適宜」，「羅氏學識膚淺，……人格卑鄙」，「即令羅來清華，三月內羅必不安於位而去」。有必要指出，清華學生會曾發表宣言反對此種做法，駁斥此類言論，他們明確表示，清華學生會係清華畢業學生之團體，自不能代表在校之清華學生。現在代表清華全體學生之機關為清華大學學生會。根據學生會之議決案，不但對羅先生毫無反之意，且對羅先生之來執掌清華，深抱革除積弊及建設學術化的清華之希望。……故對於清華學生會所云「為校長者必須與該校夙有關係深知其歷史者」之主張，未敢苟同。至以「外交關係」為藉口，反對羅先生，是何異借外人勢力，干涉中國教育主權。當今革命思潮澎湃之秋，斷不宜有此落伍思想。」（轉引自蕭仁樹、傅任敢、鍾一帆〈南下代表報告書〉，見《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二卷（上冊））在此之後，即在一九三〇年羅家倫辭職離校、閻錫山脈喬萬選任清華校長被清華師生拒絕之後，在根據校務會議決定由馮友蘭主持清華校務期間，護校團不斷在校內張貼匿名標語，製造各種謠言，攻擊馮友蘭，攻擊學生會，又致電閻錫山，並在報上發表，說清華「行同解散，百務益廢」，竭力為喬萬選卷土重來製造輿論（參見李文。又見馮友蘭〈清華現狀與我的態度〉，收入《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上述資料表明，羅還未到清華上任，驅羅運動便已開始；羅已辭職離開清華，驅羅者的活動仍未停息。這就可見，驅羅只是現象，擁喬才是目的，羅的被驅雖與羅的某些處置失宜、某些言論不當不無關係，根本原

因則不在此，而在政局變遷，閻錫山勢力作祟。」¹因此，羅家倫去職時的確是政局壓頂、學生驅動和教師袖手（關於教師袖手，從前面的材料，我們起碼可以得出這樣的一些線索，如吳宓一類對羅有疑慮的教師是自然的袖手派，如馮友蘭這一類本應該支持羅家倫的教師，迫於時勢，知道羅不宜久留，非走不可，可以說是被迫的袖手派），正是政局動蕩和人事糾葛兩相激蕩、互相利用所致。

至於羅家倫本人的態度，劉維開在《羅家倫先生年譜》中有幾段材料：八日（一九三〇年十月八日——著者按），先生以此次學生要求校長辭職一事，幕後有部分教員策動，致函教育部部長蔣夢麟，以為為維護中央威信計，為保持一國立學術機關計，似當請中央派風厲而不徇情之大員查辦鼓動此次風潮之學生，並予以開除；校內外勾結學生搗亂之教職員，一併查辦，「不然中央派去之人，可以任人驅逐；中央以後何以派人，稍有人格之人，何以肯去」。事實上，不滿教育部處理清華事件的態度，實為此一階段先生不願重返清華之主因。二十日，先生再函蔣夢麟，重申辭職之決心，並謂：「弟以目前整頓教育，當首重紀律問題，若中央任命之人，奉命在外退苦奮鬥，欲為中央保持一教育機關，而一般投機搗亂附逆之人，必設法盡力去之，破壞紀律，顛倒是非，並有明目張膽語侵中央者（報紙俱在，可以復按），致奉命之人，以此入告，懇請辭職，設中央不問其辭職之原因，僅責原人復職，是非不明，順逆不分，試問原人有何力量得繼續奉行中央政令而無阻；即欲整頓，又何以分別其維持中央威信之心與個人鞏固地位之嫌？更何以使一般人明白中央能自樹威信，明正紀綱。不然，則乘機思動之反側心理何日蔑有，故愚意現在整頓教育，當以紀律為重，

1 蔡仲德：《也談羅家倫執掌清華的是非功過》，《中華讀書報》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家倫回校與否，實係末節。家倫寧可捨棄個人之職位，以定政府之威信，而明個人之心跡。」¹二十二日，羅氏致函教育部秘書鄭天挺（毅生）復稱堅辭清華校長一職，「絕非意氣或面子之爭，乃是非、正義之所在。設政府不能以或種方式維持其本身，及派出奉命而為政府行事者之威信，則何事可為？」²「弟非怕有阻力，不敢回清華，事實上弟如回校，一般人必不敢有異議，……可知若不先立紀綱，只是寇去則返，徒然於當日為中央奮鬥之時，白白的受了一般投機反動分子的揶揄，到今日，中央一聲不提，弟啞然而返，弟實恥之。此亦弟之區區道德立場，不只為個人著想，亦且為中央威信著想也。」³羅氏為表其去意已決，不待教育部核准其辭呈就受王世杰之邀就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十二月蔣介石到漢口巡視，又詢及羅家倫重返清華一事。羅家倫陳明不願回任之意，又一再提及整頓學風，樹立國民黨中央威信之類的意思。甚至在呈蔣的所謂整頓清華辦法中說到這樣一條：「當即行一面由部派風厲嚴明之（非敷衍不著際之查訪）專員，精細查明鼓動風潮之賽，指令該校開除，一面請中央黨部令當地市黨部會同地方負責長官，實行清校，肅清反動分子。附注：離中央所在地愈遠之大學愈應注意，免成反動淵藪，即欲選繼任校長，亦必注意確係與黨有歷史而對中央忠實之人，萬不可放鬆。」⁴雖然一再聲明不計個人面子，但從這些材料中還是可以看出年輕氣盛的羅家倫因為遭到學生驅逐而激憤不已。他認為維護清華紀律為第一要務，這有什麼問題。由於學生嚐到權力的滋味而導致學校紀律不容易維持，這是時代風潮屢屢引發學潮以及各種

1 羅家倫：《復蔣夢麟函》，《文存》第七冊，函札，第一〇三頁。

2 《羅家倫致鄭毅生函》，《文存》第七冊，函札，第一〇四—一〇五頁。轉引自劉維開：《羅家倫先生年譜》，第九二—九三頁。

3 羅家倫：《上蔣主席書》，《文存》第七冊，函札，第一一一—一二二頁。轉引自劉維開：《羅家倫先生年譜》，第九六—九七頁。

政治力量滲入校園產生的一個棘手問題。從五四到北伐，政治空氣也發生了相當的改變。「學生運動的火焰剛剛點燃，政黨只是配角，等到蔓延開去以後，便與學生組織建立各種聯繫，爭取吸收入黨。隨著政府的鎮壓，左右派別的衝突，大眾鬥爭的規模化，學生的政治興趣大大增強，積極參與政黨的組織工作。許多有名的知識分子，無論何種派別，也都在國民革命軍的炮聲中紛紛南下，向政治勢力靠攏。」¹蔡元培時代的北大，雖然也曾為學生運動和政治動蕩的糾結困擾不已，但當時政黨對於學校的滲透、政黨政治和學生的糾結還沒有羅家倫時代的清華這般深入和複雜。蔡元培、蔣夢麟這些羅家倫的師長輩無不為此殫精竭慮，而那時候，也還容有一些化解的空間。蔡元培當年憑著個人的魅力化解過一些問題，但也不得不再避走，因為不論是時勢的風雲變幻、政治的爾虞我詐還是學生的魚龍混雜，整個情勢錯綜複雜，不是個人所能解決的。蔡元培的避走不是逃責，而是避免強極則辱的明智之舉。羅家倫在此問題上的立場，不得不和蔡元培相區別，可以說，羅氏此時已經完全認同政黨政治對大學的控制，此時的政治空氣，不再有北洋政府時期殘存的那點自由空氣。羅家倫的個性亦全無蔡元培的「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他以強硬的姿態和學生對抗，在這個問題上，忘記了他口口聲聲強調的「學術獨立」，把黨派利益加諸學校管理之上，這無疑更將其「黨化」清華之罪名坐實了。陳平原指出：「北伐成功，國民黨統一中國，開始實行『黨化教育』，教育界的情況於是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不只是『教育獨立』的口號被禁止，連大學課程的設置也都必須接受檢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嚴峻的挑戰，自由表達政見的文化空間也岌岌可危。不識時

1 林賢治：《五四之魂》，《書屋》第六期，一九九九年。

務的胡適之，繼續『妄談人權』、『批評黨國』，受到了政府的嚴重警告，險些兒被『肉體解決』。蔡元培名氣更大，地位也更高，可照樣無法挽狂瀾於既倒。」¹前面劉維開所言，羅家倫此次不願重返清華之主因實為不滿教育部處理清華事件的態度，羅家倫在呼籲政府對學生厲行整治時，也多次表達對「元老之優容庇徇」的不滿，雖不知其具體所指，但依稀可見在此節中，羅家倫之主張和行事大約同蔡元培、蔣夢麟等人產生了分歧。倘其所指果為蔡氏等人，對羅來說不無諷刺意味，他大約忘掉自己在五四當年所受這些元老們的優容庇徇了。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學潮更是風起雲湧，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羅家倫受任為民國政府特種教育委員會委員，負責解決學生請願風潮。他提出了一個《整頓大學教育意見書》，呼籲政府澈底整頓學風，態度依然十分強硬。且又有一條明白寫道：「注重黨在大學內部之工作，以吸收青年，偵察反動。」²幾無異要在校內安插特務了。

摒棄羅家倫「黨化」清華的這些態度和行事，他打造清華的功績還是應獲公允評價。羅家倫在清華短短兩年經歷的這些恩恩怨怨，又讓我想到沈剛伯在羅逝後那番蓋棺定論的評價大體不差。沈云：「他生平不畏強悍，而有時卻能負重忍辱。他本辯才無礙，而有時偏訥澀若不能言者。他通權達變，偶亦出入小德，而在重要關頭，確有臨大節而不可奮的操守。他周旋於黨、政、教育、外交界逾四十年，而始終未失其赤子之心。」²至於對他的成就，張曉唯提到了幾位羅家倫同時代人對羅評價甚高的說法，在羅家倫清華成就尚未得到公允評價的情況下，值得提出來說：海外有人將

1 陳平原：《「兼容並包」的大學理念》，《中國大學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五一頁。

2 沈剛伯：《悼念羅志希先生》，臺灣，《中外雜誌》第七卷，第三期。轉引自《羅家倫傳記資料》。

羅家倫與蔡元培相聯繫，認為羅乃蔡的得意門生，所以羅氏辦大學，與蔡先生的理想和做法很是相似。曾經在羅家倫之後擔任中央大學校長的顧毓琇，在二十世紀末憶述他相識的六十位重要人物時，稱羅對於教育之貢獻，上承北大蔡元培先生之道統，下啟中央大學與北京大學南北交相輝映，可垂史冊！學者方東美在一九七七年一次會議的發言中追述羅家倫的辦學功績後，語氣激越地說道：「在今天的臺灣，我老實不客氣地說，我在臺大教了近三十年的書，我不承認臺灣有大學。因為在臺灣做大學校長的是什麼人？這些做大學校長的只知奉迎上司，而沒有一個對學問表示重視！」這裡涉及一個切實問題：在政治力量介入大學管理的環境下，作為校長如何協調關係而又有所建樹？在方東美看來，羅家倫的不辱辦學使命、有作為有擔當且富有成效，是他在大學史上令人追懷的緣由所在。¹不過，羅氏入主清華期間折射出黨派政治對大學滲透、控制和爭奪，的確不能諱言，羅氏在這方面的一系列言行完全不能與蔡元培掌北大時力阻政治力量滲透的那些努力相諧，許多人曾說到蔡元培時代的北大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產物，那樣的機遇難以再現。因為時代背景、政治氣候的不同，個人觀念和氣質稟賦的差異，在面臨同樣一些問題的時候，羅家倫對很多事情的處理和蔡元培風格迥異。但前述所謂羅氏承北大蔡元培「道統」之說還是基本成立的，因為在一個更廣闊的時代大背景之下，他們對教育、文化的觀念在大方向上還是基本一致的，他們教育救國的抱負，為教育事業殫精竭慮的努力也都是「一脈相承」的。

羅家倫對於「大學」的理想到底是什麼呢？這一定是包括著多方面的理念，非常豐富的內容。

1 參見張曉唯：《羅家倫時代的清華大學》。

不過，我覺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自始至終對「學術獨立」的頑強信念。我想這正是他遊學歐美多年中得出的最重要的一個信念。從他第一次成為大學校長開始，也便成為了最深切的大學信念。他入主清華的就職演說就以《學術獨立與新清華》為題。仔細揣摩羅氏所言的「學術獨立」，實有著非常豐富而深刻的內涵，具有幾個層面的信念。且看他一九二九年七月在畢業典禮上對學生們說：「中國以往的教育方針是借貸式的，唯一的目的，就在轉販外國已成的學術……但是從民族的觀點來看，一個民族要求獨立、自由、平等，必須在文化方面、學術方面，先求得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方可。」¹我希望諸位養成一種知識化的人格，將自己所學所研究的知識，融化到自己的人格裡去，使自己的人格，受一番科學的洗禮，因此養成一種領導時代的健全的人格。」¹另外，對這年最後一屆畢業留美學生，羅家倫勸勉他們：

- 一、學問事業均須竭畢身之力以赴身，萬不可惑於西方浮薄的成功論。
- 二、在國外時間不多，應當多讀書，少活動。
- 三、學位只能以「緣木求魚」的方式得之，不能以「揠苗助長」的方式得之。
- 四、欲求中國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獨立平等，當求中國學術在世界學術界的獨立平等。
- 五、治學當重工具的學問，勿以他人之成績自炫，當獨立求自己的成績。
- 六、對於本國的文化應有自尊心，但萬不可炫於東方文化之說，造成自欺的心理。²

1 羅久芳：《父親在清華大學》，《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第一二四頁。

2 羅久芳：《父親在清華大學》，《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第一二五頁。

從這些話裡我們起碼可以看出，所謂「學術獨立」的信念，並不是許多人可能想當然認為的那種把學術和其他因素劃清界限的所謂「學術獨立」。而羅家倫所說的學術獨立卻與此相反，他正是看到了從學術所折射的更深刻更廣大的層面，他所追求的學術獨立包含了民族觀念、政治意識、文化意識以至於人格信念。從這些多層面的信念出發，才能真正理解羅家倫為打造清華所奮力爭取、所努力建造的那一切。

羅家倫的女兒羅久芳借一九四八年馮友蘭在《清華的回顧與前瞻》文中的評論來為父親正名，馮友蘭寫道：「清華大學之成立，是中國人要求學術獨立的反映。在對日全面戰爭開始以前，清華的進度真是一日千里，對於融合中西新舊一方面也特別成功。這就成了清華的學術傳統。……不管政治及其它方面的變化如何，我們要繼續著這個學術傳統，向前邁進。對於中國前途有了解底人，不管他的政治見解如何，對於這個傳統都應該重視愛護底。」¹羅久芳還提到研究清華校史多年的蘇雲峰指出：「現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貽琦是清華大學的功臣，而不知道羅家倫的奮鬥成果與經驗，實為梅有的成就，鋪下了一條康莊大道。」²在一九九六年臺北紀念羅氏百年誕辰的座談會中蘇雲峰還說：「從羅氏在清華的作為看，我們發現他不僅是一位理想色彩濃厚的人，也是一位有協調和實踐能力的人……我覺得他所留下的學者風範，富理想、說真話、敢批評、能改革、肯負責又不戀棧的光明磊落精神，是值得後人效法的。」³

1 馮友蘭：《清華的回顧與前瞻》，《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第一五七頁。

2 羅久芳：《父親在清華大學》，《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第一二六頁。

3 羅久芳：《父親在清華大學》，《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第一二六頁。

風雲變幻的二十世紀已經走完，慢慢地一切都將塵埃落定。也許現在的確是對羅家倫清華兩年的功績做出公允評價的時候了。羅女久芳必定懷揣這樣的期盼很久了，她說：「多年前為編印《文存》整理父親文稿時，我看到一句話最能代表他治史的心得與信念，他說：凡是一件歷史的事跡，時代隔得愈遠，其意義和影響，愈看得清楚。」¹

執掌中大

一九三〇年十月，羅家倫請辭清華大學校長之後，未待核准就應王世杰之邀到武漢大學任歷史系教授，本想重拾留學時候為自己確定的研究中國近代史之志業。但他在武漢不及兩個月，蔣介石到漢口巡視，要求他不回清華就得到南京協助中央政治學校校務。羅辭謝不獲，只得於年底回南京就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務處主任。回到他一九二七年曾參與籌備過的中央政治學校，羅家倫很希望能貫徹他對於政治學校教育的一貫主張。他不相信短期訓練能培養人才，認為知識技能須經長期訓練。他認為清末民初日本式的速成法政和速成師範，對中國政治和教育危害不淺。他自參加國民政府以來，對國民黨內的許多流弊也有親身感受。他在中央黨校成立半年後擬定新課程及授課時數計劃時便指出，當時黨校學生之大病，在僅能高談主義，而不知實現主義之方，僅能說幾句漂亮的「黨話」，而不知如何促成「黨治」之術。因之建議擴充、改訂課程，延長時數，從短期的訓練班變成二年制的政校，最後達成四年畢業的大學編制。其目標正是要盡力達成「請教專家」和「充分運用科學」，

1 羅久芳：《父親在清華大學》，《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第一二六頁。

來造就有現代知識的行政人員。一九二九年中央政治學校改制時他就堅持將原來一年肄業的黨校教育改為四年制的政治大學。但這一主張未獲通過，最後折衷的辦法是將期限改為兩年半，其中半年實習。現在他又回到政校，終於確定了四年的大學制，學生前三年在校學習，四年級第一學期實習，第二學期回校討論、研究、作論文。羅家倫希望把中央政治學校辦成像倫敦大學的經濟政治學院和法國巴黎政治學校的標準。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學術水平為世界公認，而巴黎政治學校則在普法戰爭之後湧現出許多政治和外交人才，復興了法國第三共和國。羅家倫到政校後的一系列改革，使政治學校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這正是多事之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國事艱危，全國各地都激起抗日救亡運動，出於對時勢的了解，羅氏知道這次國家的命運必得有長遠寄託方能挽救。他對政校學生講話指出：「我們從前的辦法，沒有效力，人家早已看穿了。現在應另定大計，謀根本的辦法。」「我們在砲火下犧牲容易，而謀久遠的大計就很難。」因之，羅氏提出一個響亮的口號：「我們要擔負普法戰爭後法國政治學校所擔負的責任。」號召政校學生造成共同建設的政治意識，以革新政治為雪恥圖強的基礎。關於此間羅氏的心境及態度，羅女久芳寫道：「『九一八』過後三天羅氏對政校學生演講時說，他感覺像是『最後的一課』故事裡的小學老師，看到危亡的日子就在眼前。從那時起他以定時演講的方式，提高學生的醒覺，積極作備戰的心理準備；主張在國內要聯合自救，外交上要採取運用『國聯』的政策，並特別強調知識分子應盡的責任。一九三二年夏，羅家倫接受了整頓國

立中央大學的任務，更是感到大學教育在國難時期的重要性。那年九月，他對中大畢業同學會演說，提出中大應負起復興中華民族的責任，並且說，『本人觀察現在的國難雖甚嚴重，但尚非最嚴重的時期，五年之內，當更有重大國難發生。』一九三三年他在政校講『太平洋戰爭與中國前途』時，更詳細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必然性，並預測『總在一九三五—一九四〇年，這個大戰是再也不可避免的。』同時主張應在國防建設的各方面，積極做出備戰的努力。¹

於此民族危亡之際，全國各地學生情緒高漲，到處是罷課、示威、請願，要求政府積極抗日。而位於南京的中央大學學潮尤為猛烈。在風雨飄搖之中，羅家倫受命執掌中央大學。此時的中央大學，其情勢同羅家倫當年接手清華之時有過之而無不及。羅氏執掌之前的中大，一直動蕩不安。先是易名風潮，一九二七年六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多個月內，四易校名，先後叫東南大學、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和國立中央大學。隨後又是易長風潮，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兩年不到，七易校長（含代理及未到任），直到羅家倫出掌中大。這一次，羅家倫不僅順利接手，而且在這個位置上一待就是十年，中央大學的真正安定、發展、充實得益於羅氏，並且在國事最危難的歲月中，造就了中央大學的輝煌，也成就了羅家倫本人一生最為人稱道的功業。和對他執掌清華的評價迥異，他在中大的作為幾乎得到眾口一詞的褒獎。如此鮮明的對比，讓人平添感慨。

中央大學最早的前身是三江師範學堂，係張之洞等人於一九〇二年籌建，一九〇四年開始招生。嗣後，隨著時代的變遷，曾先後易名為兩江師範學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第四中

1 羅久芳：《胡適與羅家倫》，臺灣，《華美族研究集刊》第六期，二〇〇三年。

山大學、國立江蘇大學等。一九二七年三月，國民革命軍攻占南京，四月，成立國民政府。同年六月，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採納蔡元培關於「改官僚化為學術化」的提議，頒布「大學區制」，先在江浙兩省試行。國立東南大學與河海工科大學、上海商科大學、江蘇法政大學、江蘇醫科大學及南京工業專門學校、南京農業學校、蘇州工業專門學校、上海商業專門學校被合併組成國立第四中山大學，任命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張乃燕為校長。同時裁撤江蘇省教育廳，改為第四中山大學區教育行政部（後改部為院），全權處理江蘇省範圍內的一切教育行政事宜。除教育行政院外，全校共設九個學院：文學院、哲學院、自然科學院、社會科學院、工學院、教育學院、農學院、醫學院和商學院。一九二八年二月，依照國民政府大學院大學委員會決議，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改稱江蘇大學。五月正式更名為「國立中央大學」（以下凡簡稱中大者，均指中央大學）。國民政府任命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為校長，因為吳未到任，校長一職便仍由張乃燕擔任。一九二八年八月，中大調整院系設置，改設文、理、農、工、教育、商、法、醫等八個學院、四十個系科。學制四年（醫學院七年）。一九二九年八月，「大學區制」停止試行，恢復江蘇省教育廳，中大不再擔負大學區行政工作。一九三〇年十月，中央大學校長張乃燕由於經費等原因辭職。十二月，原中山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執委朱家驊受命接任校長。翌年，「九一八事變」後，學生出於激憤，上街示威遊行，在外交部抗議時與外長發生言語衝突，進而打傷外長王正廷，朱首次請辭，但被慰留。十二月五日，再因學生為示威遊行向校長秘書取校旗不果，發生衝突，朱復提辭呈，部令慰留。十二月八日，朱家驊第三次提出辭呈，以離開南京表示決心，終於獲准。朱家驊辭職後，調任教育部長。國民政府另任桂崇基為中大校長，但被學生所拒，當月下旬桂即辭職。復又任命原中國科學社社長、曾經做過東南

大學行政委員會副主任（即副校長）的任鴻雋為校長，但任堅辭不就，遂由法學院院長劉光華代理，六月劉堅辭不代，校務無人處理；此時中大全體教師因索欠薪，宣布「總請假」，發生了索薪事件。而學生會到行政院請願，要求解決校長懸缺問題，並提出竺可楨、翁文灝、任鴻雋三位人選請當局遴選任命。國民政府派教育部次長段錫朋暫代中大校長，學生反對「政客式人物來當校長」，而段到中大時因為與學生溝通不良遂遭毆傷。教育部部長聞之大怒，復受政府支持，下令解散中央大學，由教育部派員接收中大，教員予以解聘，學生聽候甄別。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行政院決議聘蔡元培、李四光、錢天鶴、顧孟余、竺可楨、張道藩、周鯁生、譚伯羽、俞大維、羅家倫等十人為中大整理委員會委員，委員會調查之後向行政院提出報告並建議：經費實發不得減成，上海商、醫學院獨立，科系適當調整，行政組織於校長下設教務長、總務長及校長室秘書，本年度停止招生等項。八月二十二日，行政院院會議決，任命羅家倫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獲悉後於八月二十五日上書懇辭，未准。八月二十六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羅家倫為中大校長。

羅家倫曾說及此次出掌中大，係出教育部部長，亦即前任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的安排。他說道：「駱先先生（朱家驊字駱先——著者按）不使我知道先行商承中樞要我擔任中央大學校長的任務。他自己親自到我住所來看我，我深恐不能收拾此項殘破的局面，堅決請辭，爭執甚久。他一再以國家及民族學術文化前途的大義相責，於是我不得不擔任下來。」¹至於羅家倫之能順利到任，不再遭遇幾個前任那樣的窘境，論者眾口一語地說起羅家倫過往惹人好感的業績，無非是他在五四

1 劉維開：《羅家倫先生年譜》，第一一三—一一四頁。

時代學生領袖的形象以及濟南五三慘案中與日軍交涉的膽識。事實上當年羅之順利接下清華，無疑也與他這些過往業績給人們的印象有關，但既然他在清華的作為毀譽參半，論者也很少追述他的「光榮歷史」。待念及他中大十年的功德，所有美好回憶都湧現出來了。其實羅氏出掌中大，也非風平浪靜和當年出掌清華一樣，少不得背後的利害衝突。「羅家倫接手中央大學這個爛攤子，可謂『受命於艱難之際』。由南高師到東南大學，再到中央大學，一些與之淵源較深者，對北大出身的羅氏來執掌校政抱有抵觸情緒，甚而公開有所動作。羅任校長是由教育部長朱家驊提名，嗣後又得到這位頂頭上司的鼎力相助，朱讓羅『放手去幹』，並說：『我逼志希擔任中大校長，苦了志希，救了中大。』此後王世杰繼任教育部長，對羅家倫同樣給予大力支持，以至當蔣介石『特意垂詢』羅任大學校長何以竟招致許多人的反對和詆毀時，王實話實說，將羅不肯拿大學教師的位子做人情的實況和盤托出。抗戰開始後，陳立夫出任教育部長，厲行『戰時統制』，羅家倫的行事風格大概難以暢行無阻，加之一些其他因素，他最後黯然離開了戰時中國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¹

說羅家倫出任中央大學校長，乃是「受任於動亂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大體不錯，這不僅當時的中大在學潮和易長風波中難以為繼，就是整個國運亦是風雨飄搖、淒苦無告。易長風波，很大一個原因在於「經費」問題。中大成立之後的前四年間，由於經費來源不定，前幾任校長或是遭到學生抗拒，或是自行請辭，導致數次易長，校務不時陷入窘境。東南大學時期，學校經費由江蘇省財政負擔，其款項來自屠宰稅、牙稅及捲煙稅之收入。成立第四中山大學時，經費依慣例由江蘇

1 張曉唯：《羅家倫在中央大學》，《舊時的大學與學人》。

省教育經費管理處支付。但當財政部將捲煙稅劃為國稅後，江蘇省收入頓減，遂要求國立大學經費應由中央負擔。然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全國預算委員會決議：中央大學經費「暫仍舊案辦理」。中央地方兩相推諉，引起中大師生請願、抗議；而中小學校聯合會亦因大學區制下大學與中小學經費分配不公而不斷抗議。翌年八月，經過各方討論，行政院訓令中大經費由江蘇省負擔，在本年度預算不足處由財政部每月補助五萬元。然到一九三〇年，財政部卻有三個月未付補助款，而江蘇省亦積欠一個半月的經費未付，引發中大校長張乃燕與教育部部長起爭執，導致張辭職。（張一九二八年已辭職，接任者為吳敬恒，但吳堅辭不就，張續為代理，此時為張第三次辭職。）十二月，朱家驊受命接任校長，經費問題並未獲完全解決。朱家驊辭職後，桂崇基為學生所拒，任鴻隽亦堅辭不就，劉光華代理至六月亦堅辭不代，因江蘇省積欠中大經費數月，全體教師索欠薪幾乎宣布總請假。¹因而，羅家倫之前的中央大學一直沒有真正穩定。羅家倫亦深知此中情形。在請辭任命未准後，他於九月二日就所擬中大發展步驟分呈行政院及教育部核定。陳述他的對教育事業的信念，造就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為理想的大學理念以及穩定和發展中大的計劃，但為了達成這些目標，他切望行政院能承諾三事：一、經費應請繼續予以切實之維持及保障，每月按照預算全數發給。二、對於任職校長，請循成規，予以專責及深切之信任。如大學組織法有應予變通之處，在整理期間，乞酌予變通。際此力求安定之會，更望具決心以助其對於困難問題之解決。三、如有建設計劃，並乞盡全力以督促其實現。因為中大幾次易長的根由，也因為在清華得到的教訓，羅家倫深知辦理大學的

1 以上關於中央大學之校史，參見南京大學百年校慶特別網站之「中大滄桑百年」以及臺灣中央大學校史館網站的校史介紹。並參閱王運來：《羅家倫重建中大》，謝泳、智效民等著，陳遠編：《逝去的大學》，同心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

種種艱難，尤其在經費的落實上。於是，羅氏此番以預先料想的困難，責成政府承諾。則「如蒙裁可，則家倫願為一種教育理想而犧牲，成則為國家教育事業之成功，敗則為殉主張而失敗；否則斷不敢以不才之身，重增罪戾。」中大十年是羅家倫殫精竭慮的十年，即便慮之在先，中大不得復此元氣，更不用說十年中，他一面苦苦支撐，一面還勵精圖治，在這種情勢下所成就的中大輝煌，羅家倫居功厥偉。有論者說：「他任校長的十年，是中央大學危難深重而又有長足發展的十年，是中大也是他本人的『黃金十年』。」

一九三二年九月五日，羅家倫到校視事。聘任孫本文為教務長，張廣輿為總務長，以接替竺可楨和錢天鶴在整理期間所擔任的職務。另聘請文學院院長汪東等人為甄別考試委員。接著，便公布了教育部批准的學生甄別實施辦法八條。通過甄別考試，開除學生十九名，合格的學生於十月十一日全部返校，中大重新開始授課。是日，在全校大會上，羅家倫作了題為《中央大學之使命》的就職演說，陳述其出任校長的遠大抱負和治校方略。這篇演說不僅於中大的發展關係重大，在中國現代大學教育史亦有意義，茲錄全文於下：

中央大學之使命

當此國難嚴重期間，本大學經停頓以後，能夠以最短的時間，由積極籌備至於全部開學上課，以及今天第一次全體的集會，實在使我們感覺得這是很有重大意義的一回事。

1 劉維開：《羅家倫先生年譜》，第一一四—一一五頁。

這次承各位教職員先生的好意，舊的願意繼續惠教，新的就聘來教，集中在我們這個首都的學府積極努力於文化建設的事業，這是我代表中央大學要向各位表示誠懇謝意的。

本人此次來掌中大，起初原感責任重大，不敢冒昧擔任，現在既已擔負這個大的責任，個人很願意和諸位對於中大的使命，共同樹立一個新的認識。因為我認為辦理大學不僅是來辦理大學普通的行政事務而已，一定要把一個大學的使命認清，從而創造一種新的精神，養成一種新的風氣，以達到一個大學對於民族的使命。現在，中國的國難嚴重到如此，中華民族已臨到生死關頭，我們設在首都的國立大學，當然對於民族和國家，應盡到特殊的責任，就是負擔起特殊的使命，然後辦這個大學才有意義。這種使命，我覺得就是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我認為個人的去留的期間雖有長短，但是這種使命應當是中央大學永久的負擔。

本來，一個民族要能自立圖存，必須具備自己的民族文化。這種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結晶，民族團結圖存的基礎。如果缺乏這種文化，其國家必定缺少生命的質素，其民族必然要被淘汰，一個國家形式上的滅亡，不過是最後的結局，必定是由於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先告衰亡。所以今日中國的危機，不僅是政治社會的腐敗，而最要者卻在於沒有一種整個的民族文化，足以振起整個的民族精神。

我們知道：民族文化乃民族精神的表現；而民族文化之寄託，當然以國立大學為最重要。英國近代的哲學家荷爾丹（Lord Haldane）曾說：「在大學裡一個民族的靈魂，才反映出自己的真相。」可見創立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學若不能負起來，便根本失掉大學存在的意義；更無法可以領導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動。一個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創造，一定要趨於滅亡，被人取而代之的。

正所謂「子有廷內，勿灑勿掃，子有鐘鼓，勿越勿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其影響所及，不僅使民族的現身因此而自取滅亡，並且使這民族的後代，要繼續創造其民族文化，也不一定為其他民族所允許的。從另一方面看，若是一個民族能努力建設其本身的文化，則雖經重大的危險，非常的殘破，也終究可以復興。積極的成例，就是拿破崙戰爭以後，普法戰爭以前的德意志民族。我常想今日中國的國情，正和當日德意志的情形相似。德國當時分為許多小邦，其內部的不統一，比我們恐怕還有加無已；同時法軍壓境，萊茵河一帶俱分離而受外國的統治。這點也和我們今日的情形，不相上下。當時德意志民族歷此浩劫還能復興，據研究歷史的人考察，乃由於三種偉大的力量：第一種便是政治的改革，當時有坦斯（Stein）、哈登堡（Hardenberg）一般人出來把德國的政治改革，確立公務員制度，增進行政效能，使過去政治上種種分歧割裂散漫無能的缺點，都能改善過來。第二種是軍事的改革，有夏因何斯弟（Scharnhorst）和格萊斯勞（Gneissau）一般人出來將德國的軍政整理，特別是將徵兵制度確立，並使軍事方面各種準備充實，以為後來抵禦外侮得到成功的張本。第三種便是民族文化的創立，這種力量最偉大，其影響最普遍而深宏，其具體化的表現便靠馮波德（Wilhelm Von Humboldt）創立的柏林大學，和柏林大學哲學教授菲希特（Fichte）一般人，對於德意志民族精神再造的工作。所以現代英國著名的歷史家古趣（G. P. Gooch）認定創立柏林大學的工作，不僅是德國歷史上重要的事，並且是全歐洲歷史上重要的事。尤能使我們佩服的便是當年柏林大學的精神。在當時法軍壓境，內部散亂的情況之下，德國學者居然能夠在危城之中講學，以創立德意志民族文化自任。菲希特於一八〇七年至一八〇八年間在他對德意志民族講演裡說：「我今天乃以一個德意志人的資格向全德意志民族講話，將這個單一的民族中數百年來因種種不幸的事實所造成

的萬般差異，一掃而空。我對於你們在座的人說的話是為全體德意志民族而說的。」現在我們也需要如此，我們也要把歷史上種種不幸事實所造成的所有差異，在這個民族存亡危迫的關頭，一掃而空，從此開始新的努力。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就是由於這種整個的民族精神先打下了一個基礎。最後俾斯麥不過是收獲他時代的成功。柏林大學卻代表當時德意志民族的靈魂，使全德意志民族在柏林大學所創造的一個民族文化之下潛移默化，而成為一個有機體的整個組織。一個民族如果沒有這種有機體民族文化，絕不能確立一個中心而凝結起來；所以我特別提出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為本大學的使命，而熱烈誠懇地希望大家為民族生存前途而努力。

講到有機體的民族文化，我們不可不特別提到其最重要的兩種含義：第一，必須大家具有復興中華民族的共同意識。我們今日已臨著生死的歧路口頭，若是甘於從此滅亡，自然無話可說，不然，則惟有努力奮鬥，死裡求生，復興我們的民族。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在這個共同意識之下來努力。第二，必須使各部分文化的努力在這個共同的意識之下，成為互相協調的。若是各部分不能協調，則必至散漫無系統，弄到各部分互相衝突，將所有力量抵消。所以無論學文的、學理的、學工的、學農的、學法的、學教育的，都應當配合得當，精神一貫，步驟整齊，向著建立民族文化的共同目標邁進。中國辦學校已若干年，結果因配置失宜，以致散漫雜亂，尤其是因為沒有一個共同民族意識從中主宰，以致種種努力各不相謀，結果不僅不能收合作協進之功效，反至彼此相消，一無所成。現在全國大學教授及學生，本已為數有限，若是不能同在一個建設民族文化的目標之下努力，這是民族多的一件損失？長此以往，必至減少，甚至消滅民族的生機。人家罵我們為無組織的國家，我們應當痛心。但是我們所感覺的不僅是政治的無組織，乃是整個的社會無組織，尤其是文化也無

組織。今後我們要使中國成為有組織的國家，便要趕快創立起有組織的民族文化，就是有機體的民族文化。

我上面就德意志的史實來說明我們使命的重要，並不是要大家學所謂「普魯士主義」，而是要大家效法他們那種從文化上創造獨立民族精神的努力！

我們若要負得起上面所說的使命，必定要先養成新的學風。無論校長教職工職員學生都要努力於移轉風氣。由一校的風氣，轉移到全國的風氣。事務行政固不可廢，但是我們辦學校，不是為專為事務行政而來的，不是無目的去做的。若是專講事務，那最好請洋行買辦來辦大學，何必需要我們？我們要認識，我們必有高尚的理想做我們的努力的目標，認定理想的成功比任何個人的成功還大。個人任何犧牲，若是為了理想，總還值得。必須能夠養成新的學風，我們的使命乃能達到。

我們要養成新的學風，尤須先從矯正時弊著手。本人誠懇地提出「誠樸雄偉」四字，來和大家互相勉勵。所謂誠，即謂對學問要有誠意，不以它為升官發財的途徑，不以它為取得文憑資格的工具。對於我們的使命更要有誠意，不作無目的的散漫動作，堅定地守著認定的目標走去。要知道從來成大功業、成大學問的人莫不由備嘗艱苦、鏗而不捨地做出來的。我們對學問如無誠意，結果必至學問自學問，個人自個人。現在一般研究學術的都很少誠於學問。看書也好，寫文章也好，都缺少對於學問的負責的態度。試問學術界習氣如此，文化焉得而不墮落？做事有此習氣，事業焉得而不敗壞？所以我們以後對於學問事業應當一本誠心去做，至於人與人之間應當以誠相見，那更用不著說了。

其次講到樸。樸就是質樸和樸實的意思。現在一般人皆以學問做門面，作裝飾，尚纖巧，重浮

華；很難看到埋頭用功，不計功利，而在實際學問上作遠大而艱苦的努力者。在出版界，我們只看到一些時髦的小冊子，短文章，使青年的光陰虛耗在這裡，青年的志氣也消磨在這裡，多可痛心。從前講樸學的人，每著一書，往往費數十年；每學一理，往往參證數十次。今日做學問的和著書的，便不同了。偶有所得，便惟恐他人不知；即無所得，亦欲強飾為知。很少肯從篤實笨重上用功的，這正是莊子所謂「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的弊病。我們以後要體念「幾何學中無王者之路」這句話。須知一切學問之中皆無「王者之路」。崇實而用笨功，才能樹立起樸厚的學術氣象。

第三講到雄。今日中國民族的柔弱萎靡，非以雄字不能挽救。雄就是「大雄無畏」的雄。但是雄厚的氣魄，非經相當時間的培養蘊蓄不能形成。我們看到好戰者必無大勇，便可覺悟到若是我們要雄，便非從「善養吾浩然之氣」著手不可。現在中國一般青年，每每流於單薄脆弱，這種趨勢在體質上更是明白的表現出來。中國古代對於民族體質的讚美很可以表現當時一般的趨向。譬如詩經恭維男子的美便說他能「袒裼暴虎，獻於公所」，或是「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恭維女子的美便說她是「碩人欣」。到漢朝還找得出這種審美的標準。唐朝龍門的造像，也還可以表現這種風尚。不知如何從宋朝南渡以後，受了一個重大的軍事打擊，便萎靡不振起來。陸放翁「老子猶堪絕大漢，諸君何至泣新亭」的詩句，雖強作豪氣，卻已早成強弩之末。此後講到男子的標準，便是「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一流的人。講到女子的標準，便是「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一流的人。試問時尚風習至此，民族焉得而不墮落衰微？今後吾人總要以「大雄無畏」相尚，挽轉一切纖細嬌弱的頹風。男子要有丈夫氣，女子要無病態。不作雄健的民族，但是衰亡的民族。

第四講到偉。說到偉便有偉大崇高的意思。今日中國人做事，往往缺乏一種偉大的意境，喜歡

習於小巧。即論文學的作風，也從沒有看見誰敢嘗試大的作品，如但丁的神曲，哥德的浮士德；只是以短詩小品文字相尚。我們今後總要集中精力，放開眼光，努力做出幾件偉大的事業，或是完成幾件偉大的作品。至於一般所謂門戶之見，尤不應當。到現在民族危亡的時候，大家豈可不放開眼光，看到整個民族文化的命運，而還是故步自封，怡然自滿？我們只要看到整個民族存亡的前途，一切狹小的偏見都可消滅。我們切不可褊狹纖巧，凡事總須從偉大的方向做去，民族方有成功。

我們理想的學風，大致如此。雖然一時不能做到，也當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心願。若要大學辦好，學校行政自然不能偏廢，因為大學本身也是有機體的。講到學校行政，不外教務行政和事務行政兩方面。關於前者，有四項可以提出：第一要準備學術環境，多延學者講學。原在本校有學問的教授，自當請其繼續指教，外面好的學者也當設法增聘。學校方面，應當準備一個很好的精神和物質環境，使一般良好的教授都願意聚集本校講學，倡導一種新的學風，共同努力民族文化的建設。在學生方面，總希望大家對於教授有很好的禮貌。尊師重道，學者方能來歸。

第二是注重基本課程，讓學生集中精力去研究。我們看到國內大學的通病，都是好高騖遠，所開課程比外國各大學更要繁雜，更要專門，但是結果適得其反。我們以後總要集中精力，貫注在幾門基本的課程上，務求研究能夠透澈，參考書能看得多。研究的工具自然也要先準備充足，果能如此，則比開上名目繁多的課程，反使學者只能得到東鱗西爪的知識的那般現象，豈不更為實在，更有益處？

第三是要提高程度。這當然是必要的，但我們如果能做到上面兩頭，則程度也自然提高了。我們準備先充實主要的課程，循序漸進，以達到從事高深研究的目標。

第四是增加設備。中大此前行政費漫無限度，不免許多浪費，所以設備方面，自難擴充。我們以後必須在這點上極力改革，節省行政費來增加設備費。這是本人從辦清華大學以來一貫的政策。

講到學校事務行政，自然同屬重要。現在可以提出三點來說：

第一是厲行節約，特別是注重行政費的縮減。要拿公家的錢來浪費，來為自己做人情，是很容易的事。現在要節約起來，一定會引起多方面不快之感。這點我是不暇多願的，要向大家預先說明。

第二是要力持廉潔。我現在預備確立全校的會計制度，使任何人無從作弊，並且要使任何主管者也無從作弊。本校的經費，行政院允許極力維持，將來無論如何，我個人總始終願與全校教職員同甘苦。大家都養成廉儉的風氣，以為全國倡。

第三要增加效能。過去人員過多，辦事效能並不見高。我們以後預備少用人，多做事，總希望從合理化的事務管理中，獲得最大的行政效能。使每一個人員能盡最大的努力，每一文經費獲得最經濟的使用。

本人自九月五日方才視事，不及一月，而十月三日即已開學，十一日已全校上課，在此倉卒時間自然過著種種事實上的困難，使許多事未能盡如外人和本人的願望。這種受時間限制的缺陷，希望大家能夠有同情的諒解，不過今天居然能全部整齊開學上課，也是一件不容易而可以欣幸的事。希望以全校的努力把中大這個重要的學術機關，一天一天的引上發展的軌道，以從事於有機體的中国民族文化的創造。我們正當著民族生死的關頭，開始我們的工作，所以更要認清我們的使命，時刻把民族的存亡一個念頭存在胸中，成為一種內心的推動力；只有這種內心的推動力才能繼續不斷的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以完成復興中國民族的偉大事業。願中央大學擔負復興民族的參謀本部

的責任。這是本人一種熱烈而誠懇的希望。¹

在這篇講演中，羅家倫將大學的使命上升到為國家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為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中救亡圖存的高度。在國難當頭，民族生死存亡之際，作為設在首都的國立中央大學，對民族和國家應盡到特殊的責任，擔負特別的使命。他以拿破侖戰爭的德國柏林大學為榜樣，把這種特殊責任、特殊使命確定為「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他說道：「今日中國的危機，不僅是政治社會的腐敗，而最要者卻在於沒有一種整個的民族文化，足以振起整個的民族精神。」這裡所謂「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看起來固然是同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國民黨整個文化導向保持一致，似乎同羅氏之為五四急先鋒時的主導觀念已有相當的轉變，但綜觀羅氏自留學返國加入現實政治後，其點點滴滴的言行實際都在發生著這種逐步的調適。而且，所謂有機體的民族文化到底是怎樣一些內容，這篇演講也未真正展開，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民族本位文化和全盤西化又一輪論爭的大背景下，羅氏這裡所謂「有機體的民族文化，其內蘊大概仍傾向於他著日師長胡適的主張，即「矯枉必須過正」的全盤西化，由於舊文化的惰性，其最終目的乃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這裡沒有展開的所謂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的主張，其內蘊的含混並不妨礙在國難當頭的語境，作為一種精神和意志的激發，對因愛國熱情高漲而學潮頻仍的中央大學產生一種號召和凝聚的力量。」羅家倫曾先後留學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倫敦大學等世界著名學府，在他心目中，這些大學都是各國民族精

1 羅家倫：《中央大學之使命》，見南京大學百年校慶特別網站：<http://www.NJU100.edu.cn>。

神的體現，代表了各自『民族的靈魂』。羅家倫志在要中大承擔起『創立民族文化使命』，『成為復興民族大業的參謀本部』。否則，『便失掉大學存在的意義』。¹

在這種精神鴻鵠的號召和凝聚下，羅氏並為中央大學提出了「誠、樸、雄、偉」四字校訓。此校訓本中大前身的傳統精神而來。創辦中央大學前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校長江謙提倡以誠為訓，以誠為本，崇尚儉樸，主張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有始有終，自然日長日化。他把兩江師範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八字校訓，做成木匾懸掛在門上，躬身示範，師生們相行相效，漸漸形成了「誠實、儉樸、勤學、勤勞」的風氣。「誠」、「樸」二字，是自兩江師範、南京高等師範、東南大學以來，多年形成的學風傳統的基本內涵。羅家倫針對時弊，加以闡述，有了新意。更針對當時國難深重，民族危亡的形勢，增加了「雄」、「偉」二字，要中大師生時刻以民族存亡為念，激勵自己去完成振興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以筆者當年在南京大學就讀時的經驗，羅家倫當年力求為中央大學樹立的這種「誠、樸、雄、偉」的校風遺韻悠長，尤其是「誠」、「樸」這一長期以來的學風內蘊仍在深深影響著和塑造著今天南京大學師生們的精神，影響極為深遠。

根據中大當時的情況，羅家倫提重建中大必循「安定、充實、發展」三時期以進，這就成為他的六字治校方略。後來的事實證明，羅家倫極為出色地實施了他提出的這六字治校方略，不但先將風雲激蕩的中央大學很快穩定下來，創造出一個「安定」的教學環境，然後馬上對師資、課程、設備諸方面進行「充實」，在極為艱難困苦的条件和環境中，羅家倫帶領全校師生，孜孜以求，居然

1 王運來：《羅家倫重建中央》，《逝去的大學》，第八六—八七頁。

使得中央大學在及其艱難的八年抗戰中得到極大「發展」，成就中大輝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在其學科建設方面，中大原有文、理、法、教育、工、農、醫、商八個學院，自中大整理委員會決定把地處上海的商、醫兩院劃出獨立後，南京僅存六個學院，羅家倫根據社會急需和學科發展趨勢，對中大的系科設置，不斷地進行調整和擴充。鑑於國難深重、國內航空事業近於空白這種狀況，羅家倫電邀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機械科的羅榮安回國，來中大創辦自動工程研究班（後改為機械特別研究班），培養了我國最早一批航空工業專門人才，並於一九三八年成立了國內第一個航空工程系。一九三五年，羅家倫考慮到當時中國極需醫務人才，同時為充實中大學科起見，於五月再度創辦了醫學院。六月又主辦國立牙科學校。從此奠定了中大七院的格局。使中大成為當時學科最為廣泛、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學，擁有七個學院，三十多個系科，其系科之多，位居全國之首。在羅家倫任期內，中央大學還先後添設或恢復了心理學系、化學工程組和畜牧獸醫專修科等。尤其是一九三八年，教育學院改為師範學院的同時，又在該院增設了國文、英語、史地、數學、理化、體育和公民教育七系。中央大學這種七院四十餘科的規模當時在我國是絕無僅有的。羅家倫在擴充院系的同时，還致力於教學質量的提高。在課程開設方面，他制訂了八條「整理學課大綱」，要求各院系據此擬訂課程，以求課時數的集中，刪除不必要的課目，明確劃分必修課和選修課，使學生集中時間和精力從事專業課程的學習，建設若干核心課程，不因人因事而變更；修業年限至少須滿四年，以免除爭求速效所可能帶來的弊端。這就從制度上保證了教學活動的穩定性，加之優秀教師的安心授課，就使得中央大學的教育質量不斷得到提高。

為了繁榮學術和促進高深學問的研究，在羅家倫的倡導下，中大校務會議決定發行兩種學術刊

物，一種是「國立中央大學叢刊」，登載專門研究之著述，分為《文藝叢刊》、《社會科學叢刊》、《教育叢刊》和《農業叢刊》；另一種是「國立中央大學專篇」，對於特別有價值的著作，專印成冊。同時，羅家倫從研究條件和社會需要來考慮，不遺餘力地謀求中大與社會事業和學術機關的合作。如，與江寧要塞司令部合作在要塞造林，與中央棉產改進研究所合作棉做實驗，在江蘇省推廣純良棉種，開辦中等學校教職員暑期講習班，與實業部合編《中國經濟年史》，進行全國兒童問題諮詢，主持高中英語和數理化測驗，進行淮河流域土壤分析、四川石油調查和滇邊地理考察等等。這一系列研究活動，既對國計民生有所裨益，又拓寬了學校研究經費渠道，還增強了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一時間，學者名流雲集中大，科研氣氛隆盛，聲名鵲起。

在改善辦學條件方面，羅家倫在精簡行政機構、厲行節約的同時，卻非常重視館舍建設、添置圖書儀器和教學設備。羅家倫制訂了學校行政工作的三條原則：一、厲行節約，縮減行政費；二、力持廉潔，養成廉儉風氣；三、提高效能，少用人多做事。以把學校有限的經費，主要用於教學設施的改善。羅家倫上任後的前五年，用於校舍建築方面的經費達八十七萬元，先後建成或擴建了圖書館、體育館、生物館、東南院、南高院、牙醫院、音樂教室、游泳池和學生宿舍等。至抗戰前夕，中大已頗有最高學府的恢弘氣勢。圖書雜誌也大有增加。接受東南大學圖書館時中西文藏書共有四·八萬冊，而一九三七年中大圖書館收藏圖書已達四十·七萬冊（中、西文各半）。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間所購中文書中善本極多，不勝枚舉；西文書中也大多是較珍貴者，如 *Geographical Journal*，連續刊行一百三十四年。最貴的雜誌達七千元一套，但為了研究的需要，羅家倫均不惜巨資，全部購齊。此外，由於院系學科眾多，教學研究所需的儀器、設備、標本、模型

等甚多，中央大學亦大量購進。羅家倫上任之後，擴建了學生宿舍，重修了生物館、東南院和南高院，加建了圖書館，不僅使閱覽室的面積擴大了四倍，而且書庫的容量也增加了一倍半。

羅家倫曾說，他在中央大學充實的不僅是圖書儀器，而且還有教學人才。聘人是他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他一上任，首先從延聘師資入手。一方面極力挽留原有優秀教師，另一方面及時添聘專門學者。當時大學的教師分專任和兼任兩種，而羅家倫則主張教師隊伍以專任為主，其原則是「凡可請其專任者，莫不請其專」，以求其心無二用，專心在中大授課。數年之後，中大兼任教師即由一百一十人減至三十四人。而這些為數不多的兼任教員，均為某一學科的知名專家，為政府或其他學術機關所倚重，是「本校所欲羅致而事實上又不可能者」。這就充分保證了師資隊伍的穩定和教學質量。羅家倫重視師資，還體現在對教師切身利益的心上。當時公教人員斷薪是司空見慣的事。羅家倫為了解除教職員的後顧之憂，在經費吃緊、時有短缺的情況下，總是定期發薪，絕不拖欠，有時甚至不惜挪用其他款項。一九三三年中大僅理學院就新聘了十餘位著名學者擔任教授，如留美的數學博士孫光遠和曾遠榮，化學博士莊長恭，生物博士孫宗彭；留日的物理博士羅宗洛；留學法國的有居里夫人為中國培養的唯一物理博士施士元，地理博士胡煥庸和王益崖等，以及原清華大學教授胡坤院、兩廣地質調查所所長朱庭祐和前南高師高材生張其昀等。另有德籍物理、化學教授各一人。在此前後被羅家倫選聘為教授的還有：經濟學家馬寅初，藝術大師徐悲鴻、張大千，著名詩人宗白華、聞一多、徐志摩，農學家梁希、金善寶，天文學家張鈺哲，醫學家蔡翹，生物學家童第周，化學家高濟宇，政治學家張奚若，建築學家劉敦楨和楊廷寶等。在此期間，先後被聘任為「三長」和各院院長的著名教授有孫本文、張廣輿、陳劍修、查謙、汪東、李善堂、李學清、莊長恭、孫光遠、

戴修瓚、馬洗繁、鄭曉滄、艾偉、蔡無忌、鄒樹文、周仁、盧恩緒、戚壽南等。一時間，中央大學少長咸集，群英薈萃，盛極一時，令兄弟院校稱羨不已。因為中央大學就在首都，一些黨政要員想把親朋好友安插進來，都被羅家倫拒絕。因此他在離任時能夠於心無愧地說：我撫躬自問，不曾把教學地位做過一個人情。縱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這在當時，實屬不易。

經過安定、充實的中央大學群英薈萃，學術景象欣欣向榮。一九三四年，羅家倫認為「中大發展的時期」到了。他認為：一、首都大學在國家用人的時候，絕不應只是上千人的大學；二、中大處市中，車馬喧囂，市氣逼人，不適宜研討學問、培養身心，養成「高尚純樸」的特殊學風；三、四牌樓校址不過三百餘畝，湫隘逼窄，實無發展餘地，而工學院又極須擴大面積，添建實驗室；四、農學院與校本部分離，教學設備不經濟；五、師生食宿，雜處市井，身心不安，而且不能常相接觸，問難質疑。所以，羅家倫打定注意：要在市郊另覓校址，建造一個能容納五千至一萬學生的首都大學！羅家倫的設想，在他多方奔走努力下，得到了當時教育部部長王世杰的支持（王世杰曾經擔任武漢大學校長，他當年在珞珈山主持建造的武漢大學校園，被胡適視為「中國進步」的標誌），亦得到了蔣介石的首肯。於是，一九三四年元月，國民黨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築費暫定為二百四十萬元，並訓令行政院自一九三三年度，按月撥付遷校建築費八萬元。羅家倫在南京四郊尋找適宜的地方，最後選定南郊中華門外約七公里的石子崗一帶為新校址，這裡北面是龍盤虎踞的紫金山，南面是樹木蔥蘢的牛首山，西面是天印式的方山，若登高則可望見滔滔長江，氣象宏大，山林起伏，布置起來曲折有致，非常時期又宜於防空；內有秦淮河支流通過，雖已淤塞，若是加以浚導，不僅增加校景，且有工程和農業上的用途。選址既定，羅家倫陪教育部部長王世杰

兩度前往該處勘察，並特邀曾為蘇聯五年計劃設計學校建築的德國專家來南京察看，也認為地點很是適宜。對於這個新址，羅家倫充滿了美好的嚮往。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內政部頒發公告，徵得石子崗八千畝土地為中大新校址，並由教育部聘請葉楚傖等九人為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羅家倫懸賞五千塊大洋，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圖案設計招標，經公開評定後，由興業建築公司繪圖承建，共圈地八千多畝，預計三十個月完成。倘真如願，中大必將成為一個「環境優美、格局軒昂的全國最大的近代式大學」，正如羅家倫自己所認為的：「本校是否能成為國家完善之學府，當視新校址是否建築遷移而定。」一九三七年一月，新校址正式鑿井動工。五月，工學院和農學院主要建築著手興建，預計次年秋季便可落成，二院即可先行遷入。可是，就在新校址動工還不到兩個月的時候，盧溝橋的槍聲響了。數月之內，上海、南京相繼陷落。羅家倫另建新址的藍圖被日軍的炮火炸得粉碎，寄託著羅家倫無上理想的那個「玫瑰色的甜夢」就此破滅，「理想的學術之都」沒能變為現實。中央大學也不得不舉校西遷。那「二水三山」之間的「學術都城」，便永遠地成為羅家倫在《憶南京》這首詩中抱憾地呼喚著的一場夢：

我又想到雨花臺南，

崗名石子，

橋喚鐵心。

南望牛首，

東望方山，

北望紫金。

山頭放眼呵，

大江雄渾，

秦淮澄清。

這二水三山的中間，

正是理想的學術都城。

有的是很老的森林，

更加上手種的榆柏，

也快成蔭。

牧場的花背牛羊，

歷落的沿著山崗西下，

夕陽裡，

映出來如雪如金！

一九四一年七月，羅家倫離開中大前夕，回顧中大十年來的發展，還對遷校計劃功敗垂成耿耿於懷，這實在是他在中大最傷心的一件事。他把此事當成他離開中大時的一個「文化遺囑」，希望



抗戰勝利以後，每個愛護中大的人，一定要將此事實現。¹

事實上，從九一八事變以來，由於處在政府和學校之間，羅家倫內心擔負了許多壓抑。他在《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中說道：「九一八事變和淞滬戰爭以後，中國學術界，尤其是大學，毫不挫氣，而且加倍邁進。從一二八到七七這一段時間，可以說是中國高等教育進步最迅速最沉著的時候。中央大學也是和他的學術伴侶，在這邁進軌道上奔向前程的一分子，可是主持大學像我這樣的一個人，處境卻是困難極了。因為我是略略知道國防政策的一個人，知道中樞是如何積極的準備抗日；同時又是天天和熱血青年接近的一個人，他們天天在要求抗日。我在這方面知道的不能和那方面說，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了！所以也只有做做軍歌，跑跑大青山邊的戰壕，以略抒胸中的抑鬱罷！」²盧溝橋事變一起，正如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演講向全體人民發出的動員令那樣：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面對瘋狂的敵人，面對殘破的山河，激發了羅家倫深沉的激情、頑強的信念、堅強的意志。他深信：「武力占據一個國家的領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個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當年曠代軍事天才的拿破崙還不能在西班牙達到他的目的，何況滿坑滿谷自命為小拿破崙的日本小軍閥，要來征服一個歷史悠久，文化最優越的偉大中華民族！」³面對敵人一次次野蠻地轟炸，他向中大師生莊嚴

1 關於羅家倫在中大的作為，參見王運來：《羅家倫重建中大》，何善川：《羅家倫與中大》，南京大學百年校慶網站關於校史的內容。此兩文亦見《逝去的大學》。

2 羅家倫：《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臺灣，《中外雜誌》第七卷，第三期。轉引自《羅家倫傳記資料》。

3 羅家倫：《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臺灣，《中外雜誌》第七卷，第三期。轉引自《羅家倫傳記資料》。

宣示：我們抗戰，是武力對武力，教育對教育，大學對大學；中央大學所對著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

抗日戰爭的到來，給中國教育事業帶來嚴峻考驗。「近代以來中國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使得中國文化教育的精華大多集中在華東、華北等東部沿海地區。而我國防軍事力量特別是海防、空防的落後，又無力來保護這些『精華』的安全。所以當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後，華東、華北很快淪入敵手，這些地區的大批的文化教育機關、學校、團體等，或遭日軍炮火野蠻摧殘，或遭日寇蹂躪踐踏。而那些不甘為敵奴役的各界文化人士、廣大教職員工和青年學生，則為保存我國文化教育的精華、延續中華文明，在國民政府的組織領導下，或主動、或被動、或自覺、或不自覺地紛紛向遠離戰區的我國西部廣大地區遷徙，從而形成了我國文化教育方面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最大規模的自東向西的大遷徙。在此舉世聞名的「大遷徙」中，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的西遷重慶沙坪壩，則是組織最早、計劃最周、結果最完滿的典範。」¹

中央大學圓滿西遷，羅家倫是最大功臣。他自己曾對中央大學遷校的整個過程有過極為細緻生動的回憶，茲錄於下：

自從九一八之後，跟著的就是一二八，上海淞滬之戰，我就認為中日戰爭是一件絕對不可避免的事。等到以後就是長城的戰役，造成了塘沽協定，到了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對於冀

1 唐潤明：《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內遷及其影響》。

察問題提出無理要求，壓迫中央軍第二第四兩師和憲兵第三團退出北平，宋哲元退出察哈爾，在北平設立華北政務委員會，這一連串的事實發生，我更覺得戰鼓敲得愈來愈緊。我曾經為了商量冀察事變的問題，經重慶飛成都，我這次飛往成都，關於對日問題向蔣委員長有所陳述，一方面表示我自己的見解，另一方面亦是代表中央政治會議裡面一部分朋友們的意見，我和這許多朋友們，並不是不知道國際情勢和國內狀況在當時不宜於發動全面的對日戰爭，但是我們卻反對當時親日派和日本軍閥政客胡調式的外交，我們主張要有一個最後的立場和方向，絕不能退過這最後防線的一步，可是在沒有退到這防線以前，我們亦應當不惜一種有限度的犧牲，免得日本軍閥得寸進尺，而無限度的推進，我常常說，對於這般獷悍的軍人和狡猾的政客，若是我們以嚴正的態度來應付他們，多少還使他們不敢過於放肆，這是中國古書上所謂「臨之以莊則敬」的道理。當在南京汪精衛做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唐有壬任秘書長，對日態度非常軟弱，而且唐的行為完全是一種胡調式的格局，在成都委員長行營裡楊永泰任秘書長，也是一個以親日著名的人，當這兩個秘書長都在親日的陣營之中，恐怕有許多其他意見都被他們埋藏起來了，所以政治會議裡這般反日朋友們，要我到成都去走一趟，陳說我們共同的意見。因此，我在二十四年五月下旬由南京起飛，坐了一架專機，改姓為熊，自稱為交通部的熊參議，在武漢換了歐亞航空公司的水上飛機，沿著三峽江面，飛往重慶，耽擱了一天轉機飛成都，和蔣委員長談了三次，並且每天和陳布雷老是一道吃飯談天，使彼此的意見溝通了不少。我為了要趕回中央大學來主持畢業典禮，乃由成都坐委員長的專機飛往重慶，在回程的時候，幾乎出了一個危險，飛機師在鳳凰山的機場加油待發，可是那天氣候不好，飛機師不願起飛，在這專機上一共有四個人，一個是張發奎（這是他在民國十六年以後第一次和蔣先生見面），還有

董顯光、端納和我，張發奎要我慫恿這個飛機師起飛（飛機師是德國人名叫 Lutz），他居然聽了我的話，不過飛到重慶上空，雲霧迷漫，找不到降落地點，在空中盤旋大約有二小時，張發奎要我勸 Lutz 飛回成都，我說我再也不幹了，因為在這個時候，我們只有聽飛機師單獨的判斷，不能擾亂他的觀察和決定，到最後找到一個雲洞，飛機俯衝下來，找到了一個兩江合流的地方，最初以為是重慶，哪知道並非重慶而是合江，於是再沿江低飛到達重慶，下機之後，Lutz 同我們拉拉手說：「幸運，幸運，只有十分鐘的油了。」我們更不能忘記那時候的飛機沒有無線電的設備，雖然這還是委員長的專機，因為氣候不好，我們在重慶耽擱了二天半，我就利用這段時間在重慶觀察地點，因為我從漢口飛重慶的時候，觀察過了宜昌以後山地的形勢，便感覺到若是中日戰事發生，重慶是一個可守的地點。回程到了重慶，我便存了一個心，為中央大學留意一塊可以建設校址的地方，我亦了解在中日戰爭的過程中，空襲是一個重要的戰略，重慶山勢起伏，層岩疊嶂，易於防空，覺得這是一個戰時設校的理想地點，像沙坪壩、老鷹岩也是我遊蹤所到地方，可以說我這兩天半在重慶的遊覽，賦給我對於重慶的形勢一種親切的認識。不久我就回到南京，我招呼總務處開始定做九百個大木箱，裡面釘最好的洋鐵皮，存在學校工廠的後邊，因為數量太多，不能不搭幾間臨時的蓬屋貯藏，學校裡的人對於我這個舉動都覺得莫名其妙，最初還有人談論，以後過久了，也就把這件事忘了。

到二十六年六月，蔣委員長在廬山辦了一個大規模的訓練班，召集了將近一千簡任以上的官吏，一千四百多中學校長和教務主任，大約兩千校官以上的將領，在廬山集中訓練，這顯然是為了準備將來萬一發生的非常事變；同時更召開了一個廬山談話會，約集了將近二百個全國各界的領袖和知名之士，大家交換國事的意見。那個夏天我被聘為廬山訓練團的講師，同時也是參加廬山談話會的

一分子，就在七月八日的一早，我和太太在一個美國學校的飯廳吃早飯（這個學校暑假放假，房屋租作招待所），在座的有邵力子夫婦，忽然蔣委員長來電話，要邵力子去商量要事（當時邵任宣傳部長），邵單獨去了，我們同他說等他回來一道吃早飯，他果然很快的回來，一回來便說昨天晚上出了大事，日本軍隊藉故攻擊盧溝橋邊的宛平縣城，事態非常嚴重。我問他蔣先生的態度如何？他說非常鎮定和堅決。早飯後情報雖然加多，可是大致不過報告炮戰的情形，那天下午一點鐘，我在第二總隊向全國中學校長和教務主任有兩小時的演講，第二隊的總隊長是孫連仲（第一隊總隊長是胡宗南），我講到最後忍不住興奮起來，可是我不能當眾宣布昨晚盧溝橋的事變，因為這不是我的責任以內的事，同時我也不能夠完全緘默，我最後對大家說道：「時局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可能我們今天在此地講話的時候，正是華北炮火連天的時候，我們要共同為國家作生死存亡的鬥爭。」我講完以後，退到休息室，孫連仲、胡宗南和若干高級將領紛紛地問我這話什麼意思，是不是有特別的消息？我就把上午我所知道的各項情報告訴他們，他們亦都興奮得很。到下午五點鐘，我去仙霞飯店看胡適之先生，剛好他從蔣委員長那裡回來，我們就在樹下的板椅上坐下，他告訴我方和蔣委員長談話的情形，他說蔣先生態度比他還激昂，蔣先生對他說：「胡先生，你從前批評何梅協定，我現在撕破何梅協定給你看，我們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我已經下令派六師軍隊進河北省前往應援。」胡先生說，我們恐怕只有準備打仗吧！我仍然回到美國學校吃飯，飯後，我走過河東路遇著孫連仲，他對我敬個禮，再同我握手道：「我已經奉令下山，帶一部分部隊進河北，我今天晚上立刻動身，再見！」以後二三天內不斷的有若干軍事和外交的接觸，我因為要趕到南京主持中央、浙江、武漢三大學聯合招考委員會，特別是為了出題目的問題，不能不下山回南京一趟，於是

我由九江飛回南京，把聯合招生委員召集開會，解決了若干有關聯合招考的重要問題，仍然飛回九江轉上牯嶺。在我離開南京的前一天，我召集了中央大學重要的幾個行政人員，秘密地招呼他們趕快準備收拾重要的圖書、儀器，陸續裝箱，先拿這九百個箱子用，同時一面趕快添置。我在離開南京以前遇到軍政部長何應欽，我問他軍事的情形，他說：「津浦、平津二路已經有一千三百輛車皮準備運輸六個師進河北，可是第一列開到正定的時候，宋哲元擋駕，他打電話到牯嶺請示，委員長回答的電話是已經運到正定的部隊，先在正定下車，再把空車皮接運其餘的部隊，繼續集中正定一帶。」我回到廬山出席十七日上午的廬山談話會，蔣委員長就在那裡堅定而激昂的宣布現在最後關頭到了。隔了兩天，他在海會寺舉行訓練團畢業典禮，他對於華北的軍事和中國最後的立場，有一個明白的宣布，繼續有一篇很長的演講，題目是《建國的道理》，在結束的時候，他又說：「現在我們到了最後關頭，明天我們就要分手到各地去，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為國家民族做生死存亡的鬥爭，我們今天在此可能是生離死別，希望大家為國珍重。」這篇演講在烈日底下（因為海會寺在五老峰的山腳，鄱陽湖的湖邊，氣候非常的熱。）接連三個鐘頭，凡是在場的人，都是感奮萬狀，奔騰的熱血，沉痛的心情，相對無言，可是大家都有千千萬萬說不盡的話，第二天我們就下山了。我回到南京一方面很鎮定的舉行三大學聯合招生考試，考完之後，催促他們趕快看卷子，一方面限定大家在二星期之內把重要的圖書、儀器一齊裝箱，八月十三日，上海的戰爭爆發了，八一四南京遭受日本大隊重轟炸機的空襲，這隊飛機是日本著名的木根井航空大隊，由臺北松山機場起飛的，那天倒很好，一口氣打下他六架，以後南京天天有空襲，但敵人的目標是在光華門外的機場和若干軍事據點。以中央大學為主體並且參加了若干浙大、武大教授的閱卷委員會，在十五日已經把全部

卷子閱完（那年投考的有一萬一千人左右，評閱的卷子有六萬多本），到八月十九日下午所有的分數一律算好了，由三所大學合組的考試委員會在大石橋中央大學本部圖書管閱覽室開會，大致到了六點鐘吃飯的時候，大體決定已經有了，不過還有若干附帶問題尚待繼續商討，六點鐘，我們在圖書館樓上開始用晚餐，剛剛大家放下筷子的時候，天空的敵機不斷的盤旋，我們起初以為他所找的是軍事目標，不至於會炸到大學，所以不曾十分注意，那時中大的警衛隊長李治華君跑上樓來對我說：「敵機在上面盤旋，不懷好意，請趕快到圖書館最下一層半截在地下的書庫裡坐一下。」於是我約集其他兩校的代表和本校的教職員，一共一百多人到地下書庫，我為了要結束這個會起見，約集其他兩校的代表坐成一個圈子，我自己拿了一把扶手椅，手放在扶手上正要坐下去的時候，忽而聽見一聲劇烈的爆炸，像天崩地塌一樣，屋頂上的水泥紛紛暴雨般的掉下來，這種強烈的爆炸聲音，繼續不斷有十餘分鐘，飛機聲音稍小，李治華君又趕下來向我報告道：「後面化學室起火，女生宿舍全部被炸。」於是乎我立刻出來，站在圖書館前的一個大日晷前面，督促本校員工救火，正在救火的時候，又聽見一連串不斷的爆炸聲，天空紅色的碎片橫飛，響了十分鐘之久，我們還是不問，把化學館的火救熄，女生宿舍被炸變為平地，圍牆以外承賢街農場的男生宿舍二三層樓的門窗，幾乎全部被震碎，可是男女宿舍兩處均未傷人，只有正在建築牙醫專科學校大樓的工人炸死了五個，校工炸死二人，是最不幸的犧牲者。說到女生和男生宿舍受到這種損毀而不曾傷人，幾乎可以說是個奇蹟；但是其中有一段經過，是當時在場的人都知道的，我不妨補說一下。南京從八月十四日被空襲起，來找我的客人大大的減少了，我的辦公室在大禮堂的二層樓上，這個禮堂是為當年開國民會議建築的，相當堅固，我的辦公室就正對大門，女生宿舍靠近大禮堂的左邊，是中國式的平房，

因為客人稀少，我一個人人在辦公室走來走去，忽而注意到臨近的女生宿舍，感覺到不妥當，於是坐下來寫了一個條子，請女生指導員陳美瑜女士（她原是金女大教授，當時在中大衛生教育科任教），要她把住在宿舍裡的女生限定在十九日上午一律搬出去，家在南京的回家，家不在南京的搬到三牌樓中大農學院女生宿舍裡暫住。這個條子寫好以後，我又在辦公室走了若干個圈子，又想到男生宿舍二三層樓不妥，因為男生當時沒有空襲的經驗，常常喜歡跑到屋頂上去看敵機，所以我又寫了一個條子給男生宿舍管理員吳茂聰和汪瑞年二位，要他們把二三層樓的男生，一起搬到一層樓居住。這二個條子送出去以後，他們三位負責管理責任的人，前後都來對我說，這個命令很難執行。女生指導員說：女生因為暑假之後，宿舍人少，洗澡又便利，覺到涼爽舒服。男生管理員說：因為這是熱天，二三樓房屋比較風大，男生也不肯搬。我很嚴厲地堅持非要他們做到不可。到了下午二點鐘，吳、汪兩君來報告我說：他們費了很大的氣力把二三樓層樓男生搬到一樓。在四點鐘的時候，陳美瑜女士到圖書館會場裡同我說：費了很大的唇舌，把女生搬出校本部的宿舍，方才搬完，她要請假二星期回浙江省親，我自然答應了的。可是在三小時之內，女生宿舍被炸，他們報告我說炸的時候，陳女士正在宿舍裡，於是我下令叫他們趕快去挖，不想正預備了器具去發掘宿舍廢墟的時候，這位女教授從倒坍了的宿舍旁邊爬了出來，狂奔到圖書館門口來找我，只見她一身都是灰，後頭跟著一個女工，原來陳女士從圖書館出來，正準備收拾行李明天回家的時候，忽而炸彈落下來了，女工王媽幫她在理東西，立刻上前把陳女士抱住往地下一滾，她說：「陳小姐，我們死在一道吧！」那知這一滾，正滾在水門汀的洗臉檯之下，這幢房屋倒坍下來的時候，雖然是石瓦橫飛，可是他們在洗臉架之下卻得到了庇護，等到轟炸停止，這一排架子底下成了一個小的弄堂，他們就從這弄堂內爬

了出來，這是女生宿舍的情形。至於男生宿舍，為什麼二三樓炸得門窗無餘，而一層樓學生所居之地沒有一人受傷呢？這些炸男生宿舍的炸片卻與日本飛機所投的炸彈無關，因為北極閣上有若干門高射炮，有一輛裝滿高射炮彈的卡車，正準備開上北極閣去時，正值敵機當頭，於是就在承賢街中央大學宿舍牆外停下來，想不到這車炮彈受到了敵機炸彈的破片起火爆炸起來了，因為高射炮彈是揮發性向上的，他穿透的力量不大，又在牆外，所以它爆炸的彈片向上飛，把圍牆內的樹木炸了許多，碎片再飛上去，破壞了男生宿舍的二三層樓的門窗，底下一層反而無恙；那一天單是在圍牆裡敵機投下的炸彈二百五十公斤的一共有七枚，計四分之三公噸，來炸毀一個不成為軍事目標的大學，其中離我最近的一個，就在圖書館書庫的外面，炸彈坑距外牆只有三公尺，若不是一個鋼骨水泥的牆隔著，那不只是我，在裡面的一百多人，恐怕大部分毀滅了。第二天早上，我站在大門裡馬路旁的法國梧桐樹下，拿了一支鉛筆一本拍字簿，正在發號施令督促大家工作的時候，有四個女生跑來謝我，我說：「你們真是小孩子！昨天你們不搬，以為是我的虐政，今天倒謝起我來了。」也有許多男生來對我作同樣的表示，這是一件很巧的事。許多迷信的人，或者以為我有什麼神靈幫助，說不好聽一點的話，或者是有什麼巫術，其實我以為靈感都說不上，只是一個有責任心的人，在他危險的時期，把他責任以內的事情，多用了一點心思罷了。那一天還有一件可慶幸的事，就是在被炸毀的牙科臨時房屋之內，有幾十箱貴重的儀器，就在那天早上搬到下關，上了輪船向上游起運。

我雖然把一部分圖書儀器開始搬運，可是這種措置，並未奉到命令，對於校址設在何處，雖然我自己胸有成竹，可是並沒有呈奉政府決定。說到把中央大學遷移這個問題，當時正是議論紛紜，主張不一：衛戍司令部為了怕動搖人心，是絕對不希望中央大學搬的；教育部當時仍希望中央大學

在郊外選擇比較安全的地點開學；胡適之先生主張我搬到安徽的九華山去；張岳軍先生主張我搬到牯嶺新造的圖書館和訓練團裡去，學校裡許多教職員受了「蜀道難」的影響，都不主張遠遷，有的主張至多遷到武漢，暫借武漢大學上課，說得頂遠的，也只是到宜昌為止，到重慶幾乎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我研究一切軍事、地理和經濟上的條件，有遷到重慶的決心。可是在中央大學沒有轟炸以前，這個問題是在任何方面都難於得到贊同的，現在受了這種嚴重的轟炸以後，自然我說話容易一點。可是要遷得這麼遠，仍然是一件不易得到同情的事，我於是親到陵園向蔣委員長說明理由，請他主持。我們討論的結果，得到了他的同意和支持，使我可以放手的進行。我回校以後，立刻請法學院院長馬洗繁，經濟系教授吳幹先生向重慶出發，醫學院院長戚壽南先生向成都出發（因為成都華西大學有醫科，所以我想把醫學院搬到成都，對於功課上容易進行），而教育心理系教授王書林先生向湖南出發，請他在兩湖一帶亦做一個大致的觀察，看是否可以發現適當的地址。他們都有極好的精神，我早上同他們講，他們連自己家庭的安置一概不顧，下午便出發了，這種精神是極可佩，而極能使人感動的。在重慶和成都兩路接洽的結果，來電報告都很圓滿，正如我所預期，到兩湖這路，王書林先生雖然很辛苦的跑了若干地方，找不到真正適宜的所在，他在路上還遇著一件不愉快的插曲，他道經醴陵，是當時省政府主席何鍵的故鄉，何鍵當政引用他鄉親最多，所以湖南人說他是「非醴不仕，非醴不聽」，這位醴陵縣長把王教授當奸細拘禁起來了，王告以是中央大學教授，並且把公函給他看，這位縣長不知道南京有中央大學，他問校長是誰，王先生說是羅家倫，這位縣長說這個名字，我倒彷彿聽見過，這倒是對我意外的恭維，使我受寵若驚！可是我和這位縣長大人距離究竟隔得太遠，使我無從為力。幸而王先生情急智生，想起了他的老同學朱經農正在湖

南省政府做教育廳長，於是乎由王出錢請縣長代打電報給朱先生，得到回電之後，才蒙釋放，已經受了兩天的牢獄之災。王先生在兩湖之行，既然沒有效果，而重慶、成都之局面大體已定，所以我就請他駐紮在漢口設立辦事處，一方面轉運赴渝的圖書儀器，一方面招待和轉運西上的教職員和學生。這兩路的部署已定，我在南京就是加緊督促大家整理和包裝，凡是可以帶走的東西一齊帶走，我自己常常拿了筆和紙親自發號施令，凡是教職員到學校來探詢的，我就立刻派他一件工作，大義所在，也從沒有推諉。那時候我簡直是學校裡的「狄克推多」，我做了十幾年的大學校長，從來沒有像那時候那樣的權力之大，和大家毫無異議更無怨言的服從，這真是我們智識分子民族意識最高的表現。我於是決定通知所有教職員，於十月十日以前在武漢辦事處報到，十一月在重慶、成都分別開學。在成都方面，因為醫學院同牙科學校的人數較少，華西大學規模很大，所以如期上課，還沒有很大的問題。至於重慶，為校本部所在，學生人數眾多，院系更是繁複，各科的實驗室，亦須要特別布置，乃不得不興建校舍，經馬院長與重慶大學接洽，在他校址後邊發掘了一個山頭，讓我們自行布置一個局面，這時候幸而我們還有一筆預備在南京中山門外建築新校舍，不曾領用亦不曾用完的款項，大約還有五十幾萬元，於是不顧一切，先撥二十六萬為重慶沙坪壩建臨時校舍之用，十萬為運輸和教職員旅費之用，這種權宜的措施，免除了許多請款領款的手續。我請工學院教授原素欣和一位徐工程師飛重慶辦理新建校舍事宜，他們居然發動了一千八百多工人，在二十八天之內蓋成可容納一千多學生上課和食宿的校舍，這也真是一件了不得的成就。在這一進行遷移和建築的進行之中，我每天晚上一點到三點的時間，總在等候重慶的消息。在戰爭開始以後，從南京通重慶的電報非常的慢，有時遲到一個星期，慢的原因，由於南京到漢口這段無線電臺，都為軍用所占，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要和重慶互通消息，接洽應辦事項，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幸而重慶到漢口一段電報常通，當天可到，而漢口接到南京的電話，到晚上十一點鐘以後可以接通，所以馬院長用電報給漢口的王教授，王教授在一點鐘以後用電話和我商量，這是一種傳遞的方式，可是有時候為了半夜的空襲，亦受到不少的干擾，對於大體上的進行，始終都能如期達成計劃。

自從南京第一次大轟炸以後，中央大學又受到過三次轟炸，第一次被炸以後，大禮堂已相當殘破，於是我搬到圖書館辦公，總務處在附近的文學院辦公，如斯者有一個多禮拜，忽然我發現文學院辦公的單位，搬到農學院去了，我很不高興，對總務長說：「我尚在此，為什麼同仁們要搬到那邊去呢？」我要他們搬回來，經總務長婉勸以後，我放棄了我的主張，可是我自己還不搬，不想第二天文學院果然被炸，若是當時我固執一點的話，可能有若干位同仁會受到災害。在這個時期，無論是總務方面的人員也好，各系的教授、助教也好，都是一有工夫就到學校來為圖書儀器裝箱，在九月底以後，凡是可以裝運的，都已經運出，其中有件很笨重的儀器，就是航空工程系的一個風筒，這個風筒是試驗飛機模型所必須的設備，大約要值二十幾萬美金，其中最大的一件機器無法分拆的有七噸多重，要運上輪船，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沒載這麼重的汽車。我和航空系主任羅榮安先生說，請你負責這個風筒運到重慶，他下了決心，風筒不運走，他絕不走，居然以愚公移山的辦法，把這個龐然大物搬上了輪船，載往重慶，像這種的精神，實在是值得讚揚。在這段期間，中央大學每次轟炸，我都在場，我自己家裡的物件器具全部放棄，什麼事先盡公家，亦只有這種做法，才可以對得住中央大學這些同事，若是我做校長的先顧自己的東西，我能責備誰應當先為公家著想？到九月底，學校的圖書館儀器搬完以後，我於十月初離開南京，到安徽屯溪為中央大學實驗學校主持

開學典禮，我是坐小汽車去的，我動身以前，安徽中學校長姚文采先生想搭我的車，要我到夫子廟蓮花池去接他，我臨出家門的時候，只帶了兩個小手提箱，不過裝些換洗的衣服，就是書桌上的陳設，也一點沒有帶走，臨走的時候，把各個房間巡視一番，心裡覺得：第一，要帶也帶不了這許多；第二，在這偉大的抗戰揭幕以後，生死都置之度外，還管什麼東西？所以看過以後，只拿了一瓶香檳酒，是我在清華大學做校長的時候請客沒有用完，帶到南京的，我拿了這瓶酒上汽車的時候，指著這瓶酒發誓道：「不回南京，我不開這瓶香檳」，不料正上車的時候，空襲警報又響了，我仍然在緊急警報下到達蓮花池，接了姚先生一同出小南門，轉向蕪湖的國道。在路上遇著一隊日本飛機，共二十一架去炸蕪湖的機場，我們汽車在中途照常開行，因為我想它絕不會為我一部汽車，來變更他原定的目標，等到我到蕪湖的時候，這一隊日本飛機，又在我上面回航了。

說到實驗學校這件事，實驗學校名義上屬於中央大學教育學院，供全體學生實驗的，可是我總認為，若是能辦一個好的中學，為大學儲備好的學生，也是件值得的事，所以我對於實驗學校發生了直接的興趣，請許本震（恪士）做主任，從幼稚園辦起，辦到高中，成為一個最完備的學校，教員標準選擇得很嚴，多都是中央大學優秀的畢業生，所以實驗學校的聲譽，在抗戰以前江南一帶，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程度。這次日本飛機轟炸實驗學校校舍，是在半夜的時候，我知道學校被炸的消息，就立刻親自去看，我正站在一個炸彈坑旁的時候，一個很忠於學校的老校工跑到我前面來，跪在地下痛哭，我很感動，我指著炸彈坑，對在場的教職員和工友說：「敵人要炸毀這個學校，我一定要復興這個學校，敵人能炸毀的是物質，敵人不能炸毀的是我們的意志。」所以在遷校時，中大有許多位院長和系主任都不贊成把實驗學校西遷，自然因為中央在那時候經費窘迫，怕顧全不到

實校，還有一點理由是很充足的，就是中學生年紀太輕，多半跟家庭走，現在他們的家庭遷移未定，我們帶這許多小孩走，很難得負責。但是我還是決定把實校西遷，第一步我把它放在屯溪，以後因為軍事的情形局部吃緊，經長沙搬到貴陽，在貴陽城外馬鞍山建築校舍，成為一個很好的中學，因為實驗學校的圖書儀器均全部搬出來了，同時實驗學校裡幾十個多年磨練出來的優良教師，仍是集合一起沒有散掉。這一件是至今許多貴州人說起來還是感激的，因為這個學校給了貴州幾千個青年比較好的中學教育。

現在讓我們回到大學本部遷移的問題上來，這次的遷移，可以說是「盡室而行」，凡是可以搬得動的東西都搬走了，尤其是圖書儀器，毫無損失，所以到四川以後，各院系不但可以照常開課，而且一切的實驗，都仍舊照著平時的標準進行，從這方面來說，恐怕可以說中央大學是抗戰期間保全實力最多，維持教育水準最高的一個大學。當全校離開南京的時候，我並且把南京的校舍——搬不動的房子，也有一個處置，就是把它移交給紅十字會的傷兵醫院。關於搬家澈底的程度，我還可以補充兩件小事來說明，一件是中央大學醫學院人體解剖學的死屍二十幾個用藥品製過的，戚壽南院長認為這是一到四川開學就要用的，捨不得丟掉，把它全數帶到成都；第二是農學院農場的牲畜，當開始遷移的時候，我和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先生商量，要他改造一條輪船的一層，為裝牲畜入船之用。盧作孚本來在成都辦了一個家畜保育所，對於改良畜種很為熱心，卻受到了四川所謂五老七賢這般人的攻擊，要想改良畜種，當然要飼養牲畜與不同的飼料，於是乎這些讀孔孟之書的老者、賢者，就引了「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這類的話大肆攻擊，所以盧作孚受了一肚子的委屈，現在聽說我要把中央大學一大群的畜種運往四川，他大為高興，除了與他願望相符，還可以給他洗刷「狗

餽食人，食而不知檢」的污蔑的責備，所以他接受了我的要求，改裝了川江輪的一層。我叫農學院把每一種畜種選一對上船起運，這條船拿基督教的聖經故事來作比喻，就是等於「羅哀寶筏」(Noah's Ark)，拿中國的詩句來說就是：「雞犬圖書共一船」。所以我同四川朋友講笑話說：「我們這次中央大學遷到四川以後，留下來文化的種子多少，現在還不敢斷定，可是牲畜的種子，可以保證為你們確實的留下來了。」關於牲畜的遷移，還有一個極動人的故事在後面，因為除了選了每樣一對畜種之外，還有許多留下的牛羊等等，怎麼辦呢？我在將離開南京以前，把管農場的一位職員王酋亭先生找來，親自對他說：「這留下的東西，交給你，在敵人未到南京以前，你設法保管，萬一敵人攻陷南京，那時你若是認為無法維持的話，不得已而放棄，我也絕不怪你。」哪知道南京攻陷前三天，他看見情形危急，居然把全部牲畜移到大勝關農場，再由大勝關用木船運過長江，迂迴的循著陸路游牧起來了，由安徽到河南，由河南轉湖北，到宜昌之後才上木船到達重慶，這樣的游牧，近乎有一年的時間，當然沿途的費用，我都隨時接濟他，或是請當地縣政府先行墊付，可是這漫長的路程是不容易走的，有時候背後就是敵人，而這些高貴的「慢牛」（很多是荷蘭和美國種），毫不知道發急，一天只能走十幾里路，走了二、三天，必得休息一個星期，裝了籠子的各種雞鴨，在路上要請牛先生幫忙背負，可是奇妙的很，從南京出發到重慶，這些大的牲畜沒有死亡一個，還添了一條小牛。在第二年的深秋，我由沙坪壩進城，已經黃昏了，司機告訴我說，前面來了一群牛，很像是中央大學的，因為他認識趕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車，一看果然是的，這些牲口長途跋涉，已經是風塵僕僕了，趕牛的王酋亭先生和三個校工，更是鬚髮蓬鬆，好像蘇武塞外歸來一般，我的感情振動得不可言狀，就是看見牛羊亦幾乎和看見親人一樣，要向前去和它擁抱。王酋亭在中大的職

位，不過是事務員，月薪不過八十元，到這個時候有這種了不得的精神表現出來，真可以說是「時窮節乃見」，因為大家有這種的精神，所以中央大學能做到完整的撤退。

開學以後，在松林坡的四周，陸續添了好些必須的房屋，同時我在嘉陵江邊的岩石裡鑿了一排極堅固的防空洞，可以容到五千人以上。這批防空洞以後發揮了很大的效用，在抗戰的第二年，敵機時常空襲重慶，當空襲警報一發，我立刻就叫他們把重要的文件和貴重的校產挑選進防空洞。等緊急警報一發，我就繞著松林坡巡視一周，幫同防護團的團員（包括教授與學生組織的）驅逐在四周逗留的學生進洞，習以為常。有好幾次，我把學生倒趕進去了，可是自己不及進洞，敵機卻已臨頭。中大雖然在沙坪壩被炸多次，賴有這樣的防空洞，在校本部的毫無死傷。我把中大遷到沙坪壩的時候，亦料到校址雖然在郊外，但是和重慶大學、南渝中學聚集在一個角落，敵人是不會放過的，所以我在民國二十七年春，又在嘉陵江的上游，離重慶有三十華里一個四山環抱的地方叫北溪（後來改為柏溪，因為此處柏樹成林），另闢一校舍，專為一年級之用，其實許多圖書儀器的複本亦藏在此處，每天用木船來往運送，使教育與保存雙重目的同樣達到，因此，敵機縱然炸了幾次沙坪壩中大的校舍，我們還是沒有受到很多的損失（有二次正是暑假的時候，大部分的圖書儀器早已運到柏溪，學生亦一部分疏散在該處）。講起敵人轟炸我們文化機關的毒辣手段，真是令人覺得可恨可鄙，在我手上，中大在南京被炸過四次，在重慶又是四次，他絕不饒過這個大學，在二十九年陰曆中秋期間，日本空軍對重慶實施九天九夜的疲勞轟炸，九天九夜之中沒有一個時間解除過警報，吃飯只是在防空洞裡吃點乾糧，睡覺亦在裡面打個瞌睡，可是大學行政的人員與防護人員，還要不斷的為公共福利而奔走，大家毫無怨言，行若無事。那年中秋節的晚上，我在防空洞裡和教職員談

天，改了一首唐詩念給大家聽，這本來是唐人一首中秋望月的詩，我只改動了幾個字，詩曰：「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躲，不知炸彈落誰家。」朋友們聽了大笑，問我為什麼在這種緊張的時候，還有這般閑情逸致，我的回答是：「在緊張的時候，難道痛哭流涕嗎？我們不妨有點幽默感吧！」

在抗戰期間，中大的功課頗有調整，我不反對有志的青年投筆從戎，但是我不贊成所有的學生，都犧牲學業走上戰場，我這話並不是要他們偷安苟活，乃是要他們對於這生死存亡關鍵的民族戰爭中，能夠各就所學發揮，有更大實施的力量。在抗戰發動前三年，我對於中央大學的課程中，已經注意到如何調整，以適應戰時需要的問題，如理學院開設彈道學、軍用化學等等，在戰前即已開始，我提倡得最早的就是航空工程，在民國二十三年我就開始把特別機械研究班招考大學工學院機械系和電機、土木三系的畢業生，給他二年航空工程師的訓練，所謂特別機械，不過是航空機械的化名，以掩護敵人的耳目而已。等到二十六年戰事一爆發，我立刻開辦航空工程訓練班，將工學院前三系的學生加一年的航空訓練，由航空委員會調派服務，以後就正式成立航空工程系，在這個部門，中大提倡得最早，畢業的學生在抗戰時期，及以後在空軍及航空界服務的最多。我辦醫學院和牙醫專科學校的目的，除了為提倡科學的醫學和增進民族健康而外，更有一種積極的任務藏在裡面，就是預備抗戰時期擔任救死扶傷的工作，這都是求其高者而言。後來中央大學醫學院遷到成都的時候，因為教授的學術水準為其它大學所推崇，所以彼此之間合作得很好，有中大、華西、和齊魯三校的醫學院合組成一個三大學聯合醫院，以後因為學生人數加多，實習的便利不夠，於是会同四川省政府主席張岳軍先生商量，合辦了一個公立醫院，這是四川第一個不是教會辦的醫院，也是對於四川

軍民一件實際的貢獻。還有一種確實基本的工作，在戰時由我提倡，後來頗著成效的，就是技工訓練班的設置。中國工程教育，或者可以說科學也是如此，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只有高級工程師，而沒有工頭——就是熟練的技工。所謂職業教育技工的部門，老實說大都是有名無實，我看見戰時兵工廠裡面，和遷川的工廠裡面，這種基本幹部的恐慌，實在是急需醫治的病症，那時候我和兵工署長俞大維先生商量，後來又和資源委員會負責人商量，廣泛設置技工訓練班，利用中大的助教教課，實習工廠給學生實驗，招收初中一、二年級學生，給他們一年實際的訓練，使其成為工廠的幹部，若是中大的工廠設備不夠的話，可以分派在各兵工廠實習，畢業後由兵工廠錄用，並且各工廠只要他們的工程師肯負擔這種教育工作，他們自己也可以同樣的開辦。這種的訓練班辦法實行以後，在短短的二、三年中，也居然訓練了二千人以上（包括各方面）熟練的技工，到現在臺灣的兵工廠，和一般工廠裡還有不少受過那時候訓練的人，將來中國要工業化，這辦法也是值得酌量採用的。

總之，中央大學在抗戰時期，始終沒有降低過學術水準，物質上大家覺得苦一點，但是精神上倒而比以前還要愉快，「同甘苦，共患難」六個字，當時是確實做到的。以後學生人數膨脹到三千多人，實驗的功課，自然不免受到相當的影響，因為種種的原因，尤其是經費上遭遇了不能由我來克服的困難，所以我離開中大。我對於有關抗戰的任務，是從不曾推卻過的，在珍珠港事變的時候，曾奉令有事於雲南、貴州，以後轉向到大西北，尤其是新疆。我在離開中大那一年的春天，在松林坡上種了一棵松樹，就在種樹的時候，做了一首詩：「龍孫手植感淒然，待爾參雲我白顛，終不羨人種姚李，花開花落是明年。」我願意我主持過的大學的學生，不要做三春桃李，而要做歲寒松柏，

這是我教育的理想，也是我對於教育的期待。¹

中央大學如此大規模安全、完整地西遷，幾乎成為抗戰時期教育界的一個神話。「對於中央大學的完整搬遷，不僅當時主其事的中大校長羅家倫曾自豪地宣稱：『我們這次搬家，或者可以算是較有計劃有組織的：幾千個人，幾千大箱東西，浩浩蕩蕩的西上，於不知不覺之中，竟做了國府為主持長期抗戰而奠定陪都的前驅。這次搬來的東西，有極笨重的，有很精緻的；還有拆卸的飛機三架（航空工程教學之用），泡製好的屍屍二十四具（醫學院解剖之用）；兩翼四足之流，亦復不少。』著名教育學家、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對比中央大學和南開大學在戰爭發生後的不同結果，也不無感慨地說：『抗戰開始後，中央大學和南開大學都是雞犬不留。』張伯苓先生這裡所指的『雞犬不留』，是指南開大學被日機炸得『雞犬不留』和中央大學被毀得『雞犬不留』。而主持中央大學內遷的羅家倫，也由此得到五個托德曼（按：當時德國駐華大使）的哥哥——逃得快（托德快）的戲稱。數十年後，當人們在追憶抗戰時期我國文化教育事業內遷壯舉時，也不得不承認中央大學的內遷是當時整個高等院校內遷中的最為得意之作，戰時主持高等教育管理的吳俊升就曾稱中央大學是『遷校最迅速而完整』。²

關於中央大學內遷後的發展與影響，茲引述唐潤明《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內遷及其影響》所作

1 羅家倫：《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遷校》，《文存》第八冊，回憶，第四四一—四五九頁。這篇文章和《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文存》第一冊）一文，敘事詳略互見。《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發表於一九四七年，《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遷校》成稿於臺灣。兩文可互相參閱。

2 唐潤明：《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內遷及其影響》。

的統計和評價：

西遷後的中央大學，校址在原来的基礎上一分為三，其中遷到重慶沙坪壩的校本部是中大的主體，共有文、理、工、農、法、教育等六個學院，占地面積約二百〇五畝。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西遷後的中央大學在重慶沙坪壩簡陋的新址正式開課，從而開始了中大在中國文化教育史上的另一段輝煌，並對中大本身的發展和中國教育文化的延續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就中大自身來說，中央大學人員及教學設備諸方面的完整內遷，不僅保存了中大數十年苦心積累起來的大批珍貴圖書、儀器和雄厚的師資力量，為中大於戰火紛飛的戰爭年代的進一步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且為國家民族培養了一大批棟梁之材。

中央大學內遷重慶後，在戰時物質條件極為匱乏的環境下，在日機頻繁的轟炸聲中，根據抗戰救國的實際需要，在對課程作適當調整和修改、增添部分與抗戰相關課程和專業的同時，始終把維持正規教育與課程，把無論如何必須準備一批國家所需要的「基本人才」放在首位，以冀能把沙坪壩的這支「軍隊」，訓練成為「民族復興的軍隊」。在此方針指導下，經過廣大師生的艱辛努力，中央大學在戰爭的惡劣環境下，在遠遷數千里之後，不僅沒有毀滅、縮減，反而有較大的發展和進步。

院系設置方面，到抗戰中期的一九四一年七月，在沙坪壩的中央大學除了教務處、總務處、訓導處等行政管理部門外，共有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工學院、農學院、師範學院、研究院七個學院擁有三十六個系、三個專修科和九個研究部。其中九個研究部除算學院、農藝部是戰前在南京

成立的外，其餘的政治經濟部、物理學部、化學部、土木工程部、電機工程部、機械工程部、教育心理部等七個都是中央大學西遷重慶後，於戰火紛飛、轟炸頻繁、物質條件十分艱苦的環境下設立的。

師生人數方面，戰前的中央大學，其最後一期的學生僅一千〇七十二人，中大遷重慶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學校開學時，入學學生也僅六、七百人。但由於中大的影響力及其位於首都特殊地位以及中大在招生方面所採取的系列有效措施，到一九三八年，學生人數即迅速增加到二千二百五十四人，一九四一年更增加到三千一百五十三人，較南京時期的一千〇七十二人，增加了約三倍；教師方面，在一九三七年內遷前，中大有教師二百九十人，其中教授、副教授一百三十三人，講師三十四人，助教一百二十三人。發展到一九四一年上學期，中央大學的教師情況是，專任教授二百〇三人，兼任教授四十九人，專任副教授十八人，專任講師四十四人，兼任講師七人，專任助教二百〇八人，此外還有特聘專職教授六人、兼職教授八人，教師總計為五百四十三人，較中大在南京時增加了近一倍。且師資隊伍的發展，不只是數量的增多，更是質量的提高。戰時一大批著名的專家教授，都被網羅在中央大學。所以當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國民政府決定於全範圍內實施部聘教授（即每一學科推舉一名最傑出的教授，由教育部直接聘任，作為全國同一學科的「首席教授」）時，中央大學共有地理學科的胡煥庸、教育心理學科的艾偉、社會學科的孫本文、林學學科的梁希、生理學科的蔡翹、外國文學的樓光來、中國文學的胡小石、歷史學科的柳詒徵、教育學科的常導直、化學學科的高濟宇、法律學科的戴修瓚、藝術學科的徐悲鴻等十二人當選為「部聘教授」，占當時全國四十五名部聘教授的四分之一強。因此，我們完全可以這

樣認為：抗戰時期內遷重慶的中央大學，不僅是戰時中國規模最大、系科最全的學校，而且也是中央大學發展史上最為輝煌和最值得紀念的一個重要時期。

.....

就其對整個中華民族來說：中央大學的內遷，開創了戰時我國高校大規模西遷的先河，並以其首都大學的影響揭開了抗戰時期東部沿海地區機關、學校、工廠以及人才大規模西遷的序幕。而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相對先進的思想、文化、科學技術、各種人才以及眾多學校、文化教育機關、科學技術團體的西遷，不僅保存了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而且還將這些東部地區先進的文化教育移植於落後的西部地區，他們在進行「傳道授業解惑」偉大工程的同时，還舉辦講演、創辦刊物、編寫教材、進行科學考察、訪問和學術研究，使傳統的民族文化 and 近現代文明得以在西部廣大地區生存、發展和光大。據不完全统计，僅戰時中央大學就創辦有《文史哲》、《科學》、《社會科學》、《林學》、《中華醫學雜誌（英文版）》、《文藝月刊》、《科學世界》、《哲學評論》、《地政學報》、《航空季刊》、《中國化學會會志》、《中華農學會會報》等數十種，出版有《中國社會問題》、《中國通史要略》、《西洋哲學史》、《經濟學綱要》、《中國教育思想史》、《高級統計學》、《普通心理學》、《世界經濟地理》等一大批大學用書，創辦了中國地政學會、中教育學會、中國心理衛生協會、中華體育學會、中國地教育研究會、中國藝術史學會、人事心理研究社等十餘個全國性的教育文化研究團體。這些刊物、教材、學術研究團體及主持其事的中大眾多的教授們，在戰火紛飛、艱苦異常的八年抗戰中保持了中國文化教育不因抗戰的爆發、內遷的艱辛及戰時物質生活環境的艱難而中斷，並得到繼承、發揚和光大，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西部地區的開發，改變了西部地區落後的思想文

化和社會經濟面貌，縮小了中國東西部之間的差距，有利於整個中國歷史的進步。¹

然而，就在羅家倫為中央大學的保存和發展嘔心瀝血十載後，他在一九四一年黯然去職。有論者嘆言：「如果說羅家倫在清華卓有建樹卻不見容於當時校內師生的詭異現象，與他在（原）中央大學擔任校長十年獲致好評所形成的明顯反差的話，那麼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羅家倫執掌中央大學『功成名就』之後辭離這所最高學府的情形，也是充滿了內心落寞和帶有幾分悲情色彩！」²羅久芳曾回憶：「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秋季，父親辭去中央大學校長職務，有一段時間經常在家，這時母親卻因國民參政會開會和其它公務，常在城內忙碌終日，夜間來不及回家時，我和妹妹，就由父親來照料。記得早晨起床後，他為我梳小辮子，費了好一番事才把毛線結緊，但是還沒有走到學校，辮子往往已經鬆散了。」³在女兒這段回憶中，難得賦閑的羅氏雖然也得以稍事休息，然而不難想見一場「大戰」突然落寞時那種清冷。羅氏一生行事，常給人轟轟烈烈的印象，然而，即使是中大十年，當他功成名就之後，他的離開也是如此清冷落寞。羅氏的行事風格一向是激情、投入、轟轟烈烈，他立起志來，不曉得要「謙虛」，做起事來，不知道要見好就收，每每把事情做到「無以復加」了，別人卻未必領會到他的盡心竭力。昔日一位中大學生多年後不無歉疚地說：「這樣一個好校長，就在民國三十年暑假黯然離校，十載校長，將他一生最好的時間貢獻給中大，且是在中

1 唐潤明：《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內遷及其影響》。

2 張曉唯：《喟嘆一聲羅家倫》，《書屋》二〇〇五年第三期。

3 羅久芳：《追念我的父親》，臺灣，《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一期。轉引自《羅家倫傳記資料》。

大最艱難的時候，離去竟是冷冷清清，中大師生連盛大的惜別會都沒舉行一個。而羅校長也一去不返，以後未再回到中大來。於今墓木早拱，偶爾一唱他的玉門出塞歌：『左公柳拂玉門曉，塞上春光好……』，回想他在中大的種種，總是難過不已。¹而對於羅氏的這種際遇，他這位學生進而總結說：「像他這樣帶有詩人氣質與具有士大夫教養的人，宦海浮沉，注定失敗。」此話怎講呢？

對於羅家倫的去職，有論者綜合各種原因後認為：「羅家倫一九四一年暑假辭離中央大學，正規的校史記述說，羅做了近十年的校長，已感身心疲憊，加之戰時辦學經費難以落實，無力再維持下去，於是請辭。而羅家倫的知交方東美教授則更進一步指出，羅為了嚴格聘任中央大學的教師，不降格以求，往往無視一些黨政上層人士的情面，推卻和婉拒了不少內部介紹，以致得罪了一些人。處在和平時期尚能相安無事，而到了戰時便不免要尋找藉口為難羅氏，其中主要是在經費方面施壓，羅無奈只得掛冠求去了。有人進而具體說明，是由於羅遷校動用了原本擬建新校址（南京石子崗）的經費而政府方面不予核銷，使促羅去職。這一時期在校的中央大學學生的回憶中有人認為，羅的去職是由於CC系的勢力向學校滲透所致，當時的教育部部長乃陳立夫。不過，當年作為陳的副手的教育部次長顧毓琇則披露，由於顧孟餘未追隨汪精衛出走叛國，蔣介石特意安排顧氏做蔡元培去世後空缺出來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因院內人士反對，於是轉而考慮請顧做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遂『欣然讓賢』云云。綜合上述各種說法不難看出，羅的『上層人緣』出了問題，得罪了權貴，在

1 王作榮：《沙坪之戀》，臺灣，《中外雜誌》第十九卷，第二期。

2 王作榮：《沙坪之戀》，臺灣，《中外雜誌》第十九卷，第三期。

經費方面受到掣肘，以致無法運轉校政；同時派系勢力有乘機而入的跡象，而蔣介石的刻意「禮遇」顧孟余，則可能是促使羅家倫將校長職位讓於這位昔日北大老教務長的直接動因。」¹看來宦海沉浮一語，淵源有自。

前面已講到羅家倫在清華時的遭遇，至於羅家倫在中央大學的際遇，張曉唯在《羅家倫在中央大學》中這樣說道：「羅家倫在中央大學的際遇，要遠遠好於在清華，可是即使經歷了戰時患難的中央大學的學生們，步入晚境反躬自省也覺得對羅校長『虧欠實在太多』。」²學生們所感到的「虧欠實在太多」，見王作榮的回憶：「羅校長是中大的功臣，我們對他的虧欠實在太多。我們總是稱羅校長為羅大鼻子。中大的助教須熬十幾年才能升講師，於是遷怒於羅校長，中大系那些德高望重的助教便專門寫打油詩來罵。形容羅校長鼻子大的一首詩是：『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沙坪打噴嚏，盤溪雨濛濛。』再形容羅校長的為人是：『一身豬狗形，兩眼勢利全，三技吹拍騙，四維（羅）禮義廉（無恥）。』其實，羅校長是典型的中國的士：有救世濟人的熱忱與抱負，有服膺真理與知識的勇氣與精神，有尊敬前輩愛護後進的德性。他知識淵博，識見遠大，生活平淡，是標準的中國讀書人、士大夫。因為有救世濟人的熱忱與抱負，於是便極求入世，求進身，以一展抱負。但不解他的人或故意歪曲他的人便說他是熱衷做官。其實，即使是熱衷做官也不是罪過呀。民主政治之下，還要用錢競選，到處拜託人去求個一官半職哩。因為有服膺真理與知識的勇氣及精神，便講氣節，

1 張曉唯：《喟嘆一聲羅家倫》，《書屋》二〇〇五年第三期。

2 張曉唯：《羅家倫在中央大學》。

講是非，有所不為。這二種性格合起來便注定了他的一生的悲劇。因為有尊敬前輩，愛護後進的德性，行之過度便是諂事前輩，苛待後進了。」¹

但不管怎樣，和執掌清華時學生們的回憶不同，羅氏在中大畢竟留給學生們太多值得尊重，值得懷念的故事。王作榮就曾非常動情地回憶說：「羅校長還有兩件事使我們終身不忘，一是以沙啞的喉嚨對我們作學術演講及教我們的三民主義課，他那淵博的學問，優美的修詞，與洋溢的熱情，實在令人欽佩與感動，這些講詞有一部分後來編入了《新人生觀》一書中。另一件事是三十年春夏之交，已快到他去職的時候，一天下午敵機來襲，緊急警報已發出，大群的同學們仍在人行道上遊來遊去。羅校長身著夏布長衫，兩臂伸張，不顧自身的危險，跟在同學們的後面追趕大家趕入防空洞，像個牧羊人要保護他的羊群不受傷害一樣，那景象感動人極了，也美極了。愛，是聯結中大師生的鎖鏈。羅校長不輕言開除學生，但學生打架，特別是與工友打架，則一定開除，因為太沒有大學生的氣質了。大學生只能動口，動筆，但不能動手。」²這的確是羅家倫氣質本色的自然流露，他富有激情，也善於表現激情，然而他又常常於誠懇、樸實中顯現光輝。

在羅家倫任中央大學校長期間，他的兩個女兒先後出世。長女久芳生於一九三四年，歲月荏苒，此時羅家倫和張維楨已經結婚六年多，羅氏也三十八歲了，女兒的出世讓羅氏倍感欣喜，他賦詩一首，表達他初為人父的喜悅和體味生命的感動：

1 王作榮：《沙坪之戀》，臺灣，《中外雜誌》第十九卷，第二期，第三期。

2 王作榮：《沙坪之戀》，臺灣，《中外雜誌》第十九卷，第二期，第三期。

春到江南挾大風，
遠天凝靄紫薇紅；
會知生命奇葩萼，
吐自呻吟疾苦中。

久芳曾度過幾年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待到一九三七年次女久華出生後不久，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南京成為空襲者的目標，羅氏一家短暫的安適生活也告結束。羅氏把家人送上去漢口的輪船，自己則留在南京全力指揮中大的內遷。遷到重慶之後，由於妻子和女兒住的地方和中大有一定距離，而羅氏公務又極繁忙，一家人還是聚少離多。但只要羅氏有時間，總是不忘對兩個女兒耳提面命，督促她們學習。在羅氏的影響下，他的兩個女兒久芳、久華後來都成為了歷史學學者。